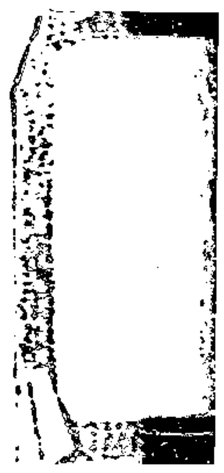
民生史觀

范任宇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92384

自序

任何一個民族的復興，如若沒有自己獨立的學術思想，爲其靈魂，則頗難以達到再生的目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建設，如若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基礎，爲其指導，則頗難以完成建國的大業。中華民族正在復興之際，中華民國正在建設之中，我們雖然有了三民主義爲自己獨立的靈魂，爲自己建設的指導；可是國人對此祇有粗疏的觀念，而沒有系統的深切瞭解；所以直到如今，舉國業已一致信從；而國事蜩螗，依然如舊。且於抗戰結束之後，國難愈益嚴重，民族愈趨危機，是以當前，凡我國人，不獨對於三民主義須有眞知灼見，進且於其歷史哲學的民生史觀，更應洞悉，用以奠定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精神基礎，從而完成民族復興，國家建設，並以樹立世界大同的初基。本書根據　中山先生全部遺教，釐訂其民生史觀的法則，構成系統，國經數載，方始脫稿。際茲國事治絲益棼之時，特予付印，以饗國人，幸甚幸甚。

民國三十五年春初　任宇序於重慶國立中央大學

目錄

自序

第一法則　人類本位的進化觀……一

第二法則　人類生存的三大要素——技術、組織、知識——及其主導作用（附表一）……八七

第三法則　人類生存鬥的兩個主要方式——互助與鬥爭——及其主導方式（附表二）……一九五

人類生存鬥的對象及其進化時期與發展

人類生存活動的三大要素

時期 / 要素	第一時期	第二時期	第三時期	第四時期	未來的時期
技術(經濟)(工具)	漁獵	遊(畜)牧	農業	工業	新工業
	←以手工為生產勞動的中心→			←以機器為生產勞動的中心→	
	石器→	→銅器→	→鐵器→	煤鐵→	電氣(原子能)
組織(政治)(權)	原始共產社會(氏族)		私有財產社會		新共產社會
			奴隸(部落)封建	資本主義(民族)社會	民生(人類大同)社會
	氣力	神權	君權	民權(階級的)	全民政治
鬥爭的對象	與獸爭	人與人爭			人與人互助
		與天爭			與自然環境新的鬥爭
知識(文字)	神學		玄學	科學	(科學的哲學)
	不知而行		行而後知	知而後行	

(民生史觀第一)

古今第一法則

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中山先生語

541.3
538
2

民生史觀

第一法則　人類本位的進化觀

民生史觀一詞是近二十年來由國人根據　中山先生批判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而創立的。這一概念雖已普遍的流行，逐漸的侵入學術範圍之內，但其具體而有系統的內容，固曾有人研究，然並未周詳的確立其體系。有人以比較法羅列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同異；也有人以綜合法敍明民生史觀與其兩者的差別。可是，畢竟沒有將民生史觀的基本法則很清楚的釐然指出；就是有人注意到研究其基本法則，也祇偏重於某一立場或觀點而加以強調：如就知行觀點而言，其重要者在於知識，或如概括的運用一些原則的公式，而加以一般性與特殊性的說明等類。所以時至今日，我們尚不能使人明白的根據民生史觀的重要法則來解釋，來瞭然於歷史的基本演變和發展，猶如唯物史觀有其生產關係與生產諸力的矛盾，以及唯心史觀有其個性自由的發展之律則的一樣。是以民生史觀的基本法則尚有待於我們努力的研究，求出其根本觀念以

解釋歷史的演變和發展。這一努力自須根據　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和由其所倡的言論爲主要材料，構成一個體系，作爲解釋歷史的中心觀念。然而構成佈在其全部遺教文獻的言論，顯非易事，必須以歷史哲學本身發展的經過爲其研究的主要步驟。換言之，就是必須瞭解民生史觀是由唯物史觀發展而來，唯物史觀是由唯心史觀發展而來的。這個發展的歷程，有人則以辯證程序的正，反，合來說明民生史觀是不必要的，因爲民生史觀自有其歷史哲學的價值。如要這一個值被人欣然承認，那就理應將民生史觀的基本法則說明出來，又何必借重於歲界那套醉人的神秘公式呢？

試問民生史觀的基本法則是什麼呢？如果要解答這個問題，由於從　中山先生全部遺教作綜合的研討，我們可以說民生史觀依然的陷入於唯物或唯心的那種以本體哲學的觀念而引爲立說的張本，則不能將民生史觀從現象哲學之內，才可澈底的立於大地之上。如必須將其救出於這一不可拔的深淵之中，放置於現象哲學之內，才可澈底的立於大地之上。如就歷史哲學發展的過程而言，民生史觀是從批判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而來，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演講裏曾經明白的說過：

「世界上各種人事的動作，凡是文字記載下來，今後人看見的，都可以作爲歷史。他（指馬克斯）在這種歷史中所發明的最重要之一點，就是說：世界一切歷史都是集中於物質，物質

有變動，世界也隨之變動。並說：人類行爲，就是由物質的境遇所決定，故人類文明史，祇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

「馬克斯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到底這種道理是對不對呢？經過歐戰後幾年的試驗以來，便有許多人說是不對。到底什麼東西才是歷史的重心呢？……就是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民生主義第一講）

這一個批判的說明，非常重要，一方面否認了歷史的重心在於物質，一方面則指出了歷史的重心在於民生，而創立了民生史觀。於此，欲使民生史觀更澈底的明白，那末對於唯物史觀的詳細內容，自有充分說明的必要。馬克斯唯物史觀的重要概念，要言之，約有三個：第一是將唯物哲學的觀點推用到歷史的範疇，認爲歷史祇是物質發展的歷程；第二是生產關係與生產諸力的矛盾；第三是階級對立的鬥爭。這三個又是用辯證法一以貫之的。

就第一點言，馬克斯將物質變動的發展引伸爲人類活動的範疇，所以人類歷史的基礎是物質。他以爲人類當利用其周遭的自然和其自身內在的生理上智力上的特質，造成他們生活上物質的營養資料，以滿足生命的必需。因是而生產，而交換，依據這種經濟生活，轉又發生風俗，宗教，國家，哲學，以及土地佔領和商業種種的文化現象。至於人類不斷的競爭，戰鬥，和遷徙，則都是事物現象的變化和發展，而不是人類活動的根源。人類生活上物質狀況的變遷

才是人類文明變遷的根源，祇有物質生活的進步，才是眞的進步。他的名言，就是：

「人類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並非那樣自如的在由於他們所選擇的情況之中。」（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十）

這些意思就是說人類社會的變遷，其初原非從思想，觀念，世界理性或世界精神而來的，乃由於生活的物質情況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生產生活上必需品的生產方法便構成了唯物史觀的基本觀念。唯物史觀之「物」的意義，就是指此而言。所以人類的生命是受着物質情況所控制，所主宰。換言之，人是受其所加入的社會之生產方法所決定，而不能夠自然的如願以償，想怎樣就怎樣的。這樣，故凡人類所有的法律關係和國家形式，既不能由於他們自身而可瞭解，亦不能由於所謂人類心靈的一般發展而可說明，僅有從生活的物質情況之根源上才得眞正的明白。馬克斯這一觀念的名言，就是：「不是人類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却反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Marx: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這一「社會存在」的意義，據馬克斯所指就是由於生產方法所構成的社會之經濟結構。這一經濟結構便是人類社會的眞正基礎，至於法律，政治，都是這個基礎的上層結構，而且又有一個定型的社會意識如宗教和哲學等相與一致。可是人類這個龐大社會的經濟結構也是變動不居的，祇要經濟的基礎一變動，那末，整個的上層結構，便隨之或快或慢的轉變，那就是說法律，政治，宗教和哲學。總而言之，一切意識形態，都隨着

經濟的轉變而改換，這些意識形態也必定的要與之相符合。至於這一經濟基礎變動的原因，就是生產諸力的擴大。惟生產諸力的擴張原因頗多，或由於工人的技巧，或由於新原料和新市場的發現，或由於新工作程序和工具或機器的發明，或由於商業和交換的組織改善。總之，如果人類的經濟或物質基礎一變遷，那舊的生產關係便逐漸停止增進其生產事業。同時，這些適合於舊社會階級的法律，國家的各種制度，以及智識的體系，就皆發生動搖而消滅。當這社會的，文化的上層結構不再符合於其經濟基礎，則即生產關係與生產諸力彼此發生了矛盾之時，也就是新的實在與發的形式之衝突。在這衝突的矛盾環境之中，便逐漸的影響人類的思想，而人類叫感到新的時代開始了。於是，努力創造新的法律，國家的制度和宗教，哲學的體系，以求適合於這一新的經濟基礎。總而言之，人類的社會和文化皆發生滋長和繁榮於其物質的經濟根基之上。從此便又引出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第二個重要概念，那就是生產關係與生產諸力的矛盾。

其次，就第二點言　我們如要對於社會的經濟基礎之變遷由於生產關係與生產諸力的矛盾，馬克斯所謂的含義，須有說明的必要。第一，關於其兩者的關係有同一的意義。人類在其經營的社會生產之中，加入於一定的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必需的，且又獨立於人類的意志之外。而這生產關係則規定着財產，決定着人類的互相關係，由於生產諸力的影響作用，在心靈上人類又創造了一定的社會，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宗教道德和哲學的體系。換言之，在生產工作影響之下，和其點要，人們建造他們的社會

形式，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宗教和科學，這些就是人們生活在彼此當中，這社會關係就是生產關係，也就是財產關係。第二，所謂生產諸力，則分無生命的及人的兩種，前者包括土壤，水，空氣，原料，工具和機器；後者包括勞動者，發明者，發現者，工程師，和種族的素質，亦即熟練工人的社會之遺傳力。但扼要言之，一個是物的一個是人的因素。至於生產關係與生產諸力的矛盾之意義，則在於生產力的變遷，影響了生產關係的改動。因爲生產力是經濟結構的根基，祇要他一有了新的發展，那末，原有的經濟結構就要崩潰，乃至使得生產關係也由破裂而瓦解。這種舊生產關係不得不破壞的原因，就在他已成了新生產力發展的極梏。馬克斯曾清楚的說明過：

「社會裏物質的生產諸力，當其發展到某一階段，便與其既存的生產關係相衝突，生產力一向是工作着的。這些生產關係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形態而轉成生產力的極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期到來了。因爲在社會的經濟基礎裏有了變遷，這整個龐大的上層結構便或快或慢的急劇轉變。」（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這裏所說的整個龐大的上層結構是指社會的法律，政治，和文化的宗教與哲學而言的。總之，當人們一感到有了這種矛盾的存在，便要奮鬥，以求其消解，而期調協成一種新的高級的生產關係。不過，這時人們的新意識形態，祇是從物質生活上的矛盾而發生的，換言之，就是

從生產關係與生產諸力的矛盾裏產生的。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可以從兩種事實裏去瞭解，去體驗。一則由剩餘價值所從出；二則由技術進步所從出。就第一個事實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種矛盾的動力是剩餘價值。其事實則發生於擴張再生產之中。資本家若欲擴張生產，必須多用貨幣資本購買勞動力，亦即必先多付工資僱傭工人，而後始得擴張生產，以求剩餘價值的更多獲得。惟此又須仰藉於剩餘價值之轉化，然當剩餘價值尚固着於商品形態之中，則不能變作貨幣，而資本家又不願從事工資的預付。其結果，擴張再生產一事，便成爲不可能了。據此，資本主義的擴張再生產之內部，已含藏着矛盾，這就是社會的生產諸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也就是勞動的生產力之發展，受着私有財產關係的限制。然這矛盾則是推動新社會的樞紐，同時，也是刺激着生產工具進步的動力，以及擴張新的市場，改良交通，和要求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冶金術等等發達的動力。由於這些的進展，實業的規模便擴大了。總之，資本家因此則又以相對的剩餘價值來從事擴張再生產的活動了，那就是以改進生產工具爲主題。其次，再就第二個事實說，資本主義的擴張再生產既以相對的剩餘價值來進行，來實現。換言之，就是資本家以改良技術來增加生產力，但這終久還是發生物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之事實，因爲生產工具不斷的改良與進步，其結果，生產規模不斷的擴張和集中，於是工廠擴大，工人也隨之大規模的集中了，而其組織逐漸健全，階級意識油然增強，這一發展的過程，從前消滅了封建社會，同樣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也將因其生產工

具不斷的發展而毀滅。這最由於資本家以自由競爭的方法，從事大規模的生產活動，卒致造成生產過剩，商業恐慌，暴露了無秩序的生產之危險，而且這一危險又是週期循環的發現，實業和商業的毀壞，以及由於工人失業階級的存在，最嚴重的，是饑荒和戰爭

就是工人開始團結，以謀反對資本家，到處發生階級衝突。「但是每個階級鬥爭，就是政治鬥爭。」（共產宣言）這種階級鬥爭是由於社會階級的對立，而爲展開歷史的進步之必要。依照這種辯證程序的公式，資本主義制度是正反，由其生產力的發展，招致了工人的組織而爲其反，是即資本主義的社會階級，業已構成。當資本主義桎梏着其生產力的發展，工人便預備創造一個無階級的高級社會。由於工人創造出新的高級的生產關係，這就是合的階段之實現。不過，資本家則又非無鬥爭的放棄其社會的統治，於是階級鬥爭便必然的發生，同時，也是歷史進步的必要步驟。馬克斯證以歷史的發展歷程，是經過一串的階級鬥爭而實現的，所以他在一八四八年發表的共產宣言上說：

「一切直到而今的社會史，就是階級鬥爭史。」

接着又說：

「自由人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會主與職工，簡而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彼此處於經常的對立，從事一種不間斷的明爭暗鬥，每一時代鬥爭的結束，不是全體社會的革命改組，就是競爭階級的共同毀滅。」

他進而又詳細的說明：古代羅馬有貴族武士平民奴隸，中古時代有封建地主諸侯行會主職工徒弟農奴，現代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而資產階級是從封建社會的廢墟上生長出來的，那就是由於生產和交換方式和組織革命的結果。同時，也隨伴着政治的進步，而造成現代國家以管

關其全階級的事務。換句話說，國家就是一個行政委員會以管理其全體統治階級的事務。因爲現代國家的組織即置基於現代社會階級權力的工具。現代社會祇不過也就是階級的分野單純化，依然是階級對立的時代。資產階級祇不過代替了以前一些古老的壓迫最將階級的分野單純化，依然是階級對立的時代。資產階級祇不過代替了以前一些古老的壓迫物，重建一種新的壓迫情勢，新的鬥爭形式。至於無產階級鬥爭的發展，其初是由個別勞動者的行動，繼而一個工廠的全體工人行動，最後才是廣大的團結，組織政黨，成爲眞正的革命階級，進而聯合各國工人，以暴力推翻現在的社會和政權，利用無產階級的專政，而自爲統治階級，取消私有財產，廢除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以結束歷史上的階級對立，使人類眞正的歷史開始。

馬克斯爲使資產階級所統治的社會早日崩潰，除其以唯物史觀的理論說明而外，又在經濟學方面，強調勞動價值說爲無產階級的產業工人（即依工廠工資爲生的勞動者）製造理論的武器；培養階級意識，作爲思想的炸彈，加強階級鬥爭的力量，務期無產階級得到最後勝利。不過，馬克斯的理論武器，經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試用已暴生了許多的缺點：尤其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更爲黯然無光。他的遺教不論後人在行動上抑思想上，都引起了很多的糾紛，要瞭解這些糾紛的癥結，而去消除他，則必須研究馬克斯思想的體系，可分三部份：第一是唯物論的哲學，第二是唯物的歷史哲學，第三是經濟學。這三部在其思想邏輯上是有其一貫的治學方法和理論

系統。而這一理論的體系可說是歐洲十九世紀文化的象徵。當時，歐洲適值新舊潮流激盪之際，矛盾衝突，錯綜複雜，極盡詭譎變幻之能事，而馬克斯學說的內容，正復如是。他既主張物質環境決定人類的命運，而又倡導人類自己去改變世界。他既認爲新生產力尚有發展餘地的時候，舊社會不致消滅，而又鼓動產業工人積極革命。他既說明階級鬥爭是歷史進化的動力，而又承認鬥爭的結果可以共同毀滅，試問大家都毀滅了，那裏還有什麼進步呢？他既主張物質決定意識，而又認爲意識可以發覺新的時代，試問，這一意識又如何能感到新的時代來臨呢？他既說明工人無國家，而又勸導其須爲祖國作戰。（註）總之，馬克斯學說的內容不勝其矛盾錯綜。其中凡如唯物論，唯物史觀的階級對立的爭鬥，以及經濟學方面生產重心和剩餘價值種種重要的思想，幾爲近數十年來世人批評的中心對象。而 中山先生於民生主義第一講，亦以批判馬克斯學說爲主題。惟馬克斯思想卒致影響後人之社會的文化的變遷者，正由於此，其中缺點，乃復甚多。此刻我們僅就其唯物史觀一論。關於唯物史觀的內容，前面已曾詳細說明

註：前者在共產黨宣言上說：They have no country.
後者在法蘭西內戰演講說：The French work must do their duty as citizens; but they must not let themselves be overcome by the national reminisce-ces of 1792——: Civil war in France.

過，而其獨到的貢獻則在將歷史，社會，和經濟治爲一爐，融化一片，構成新的體系。然其中要點又不出於以上所說的三個概念，姑卽就此予以批判。第一，就人類生活的基礎。這點不獨可從現代人類生活環境分自然的，社會的，和意識的三種而見其偏缺。就在人類原始時代，生活的環境也就具備了三個因素。爲人類爲求滿足其生活上必需消費的物質資料，其初，就有羣體的方式，以從事生產的活動，而創智慧則爲推動這兩者進步的主要力量。智慧使人知道利用木棍，石頭，作爲克服自然環境的工具，增進生產的力量。不論由於物質的工具進步，抑由於社會組織的改良，都可以改變勞動歷程，促進生產方法，增加生產力，轉而使得歷史發生變遷。可見，馬克斯將人類社會分爲上下層的結構，又視承認單純技術的工具生產力爲其下層經濟結構的基礎，而經濟結構又爲法律，政治。換言之，就是社會國家的眞正基礎，甚且是宗教哲學的眞正基礎，這是何等的難以美滿的說明人類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我們試問生產工具又怎樣能以自覺自動的進步，使得生產向前發展？甚而形成新的生產關係，以改變社會的結構？倘若生產工具無此自覺，無此主動，那末，此自覺，此主動又何從而來？何況人類社會組織根本上就不能以立體化的看法來說明，而宜於平面化的看法來瞭解。例如，卽就宗教的形成而論，與其說是其基礎在經濟，毋寧說其在求

人之生死現象的說明，甚而是以宗教的力量爲求生存的手段發展。甚而經濟活動的形成，其根源亦復在於生存的關要，所以宗教與經濟的關係，與其說是立體的上下，不若看成平面的鳥瞰。馬克斯強調物質環境，生產方法，生產關係爲歷史的基礎，這一缺點反使其忘却了他所已知的人類智力的存在，反使其難以圓通的說明法律，政治，和經濟的相互關係。何況人之異於禽獸者，卽在其有改造自己及其環境的知能，非非純粹的受制於環境。我們人類既自己有了改造自己和環境的知能，那也就不是完全受其一社會存在所決定，相反的，人類意識依然的可以決定社會的動向和發展。這裏的事實和理論，容在以後詳細的說明。第二，就生產關係與生產方法而言，馬克斯曾說過：

「沒有社會側度常行消失，直到一切生產力尚有發展餘地於其中的時候；而且也沒有新的較高的生產關係可以出現，直到其存在的物質條件正在舊社會中發展着的時候。」（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據此而言，生產力是生產關係存在的基本條件，而生產關係總是束縛着生產力的發展。倘若這個基本條件變更了，那末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也就轉變了。馬克斯這一推論，不獨蘇聯十月革命的事實將其否認了，卽其理論本身也有缺點。他的話如就社會組織的現象說，尤有可言，因爲自實業革命後，地主與農奴的關係，逐漸轉成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可是如就社會組織的本質說，還是私有財產存在呀！這以中國人的看法，不過是以暴易暴分，試問這算得是人類新

的較高的生產關係之出現嗎？其實資本主義社會與封建社會比較，就生產力（工具）說固可謂爲進步，但就財產關係說，可謂爲惡化。因爲辯證法所謂新的較高的之合的階段，乃指其本質的高級發展之實現，而非指其現象以言，這表明了馬克斯是何等的誤解黑格爾！何況西洋社會這一現象的轉化，溯其源頭，乃出自人類社會範圍的擴大。今日人類的文明，遠自十一世紀末葉已開其端。當時，十字軍運動綿延一二百年，如一大狂潮，決堤於歐西，氾濫於東部，波及西亞，震撼整個社會，動員各色人等，封建組織，由此裂弛，土地關係，發生劇變。於是城市發達，商業繁盛，轉又促成文藝復興，而有人的自覺和世界的發現。自後自然科學，新航路新大陸的發現，接踵而起，由此奠立了近代工商業發展的根基，從而刺激了生產工具的改良和創造。根據這段歷史進化的程序而觀，生產力的發展，乃爲人類社會的和智識的變化之結果。復又由此結果，轉而推動其兩者的進步。設若我們承認現代社會爲新而較高的階段，則這一階段的出現，可說是十字軍運動的結果。而十字軍運動則在求精神上的解放，當時經濟的環境祇不過是其背景而非其動力。即就經濟觀點而言，因十字軍影響以致歐洲經濟發達的，則在獲得財富的利慾衝動，且是個人的利慾衝動。歐洲人獲得這些意外的財富，增加其資產，更促其商業興隆；於是乃有擴大生產的要求。這一私有財產關係的因素，隨使生產工具能夠發展到新而較高的階段。緻此，則生產關係反是生產力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他既推動着生產力進步，當非完全爲其束縛的桎梏了。事實勝於雄辯，這事實當亦不致爲人所否認。最後第三，就社會階級對立

的展開是歷史進化的動力而言，歷史上階級鬥爭的事實，不獨馬克斯承認，凡有歷史知識的人，亦所週知，惟其鬥爭的事實，非非如馬克斯所說，祇是每一時代有兩個對立的階級，嚴分陣線，互相敵對。這在古代，固置不論。即就由市民發展的資產階級來說，也就經濟立場說，固可謂爲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鬥爭，但就政治立場說，非非有產者與無產者的絕對鬥爭。且是有產者與有產者的絕對鬥爭。英國近代階級鬥爭的運動，遠在十三世紀已開其端。一二一五年大憲章就是貴族僧侶與君主鬥爭的具體結果，自後一向是貴族領導着各階級，才轉而又對貴族鬥爭，著名的一八三二年改革案，就是這些史實的紀念碑。英國歷史固然昭示了我們階級矛盾的鬥爭，同時也說明了階級妥協的互助。至於法國的情況，則又不同。十七十八兩世紀英國貴族驟合陣線共同敵對資產階級，所以當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初是君主和貴族聯合君主敵對貴族，消滅封建特權。第三階級又利用着無產階級以爲己助，卒致反對君主。這一鬥爭直到一八七一年後第三共和成立而止。此中八十餘年幾爲各階級的互鬥時期，彼此極盡縱橫捭闔之樞局。所以有這種階級的混戰，就是緣於階級的分界，極不清楚。再如意大利，其貴族沒有健全的政治社團組織，因此在革命時期，第三階級的興起，就沒有發生如英法兩國那樣的內部鬥爭。可是，貴族之中也有一些進步而開明的個人，成爲新時代的推進者，而倡着自由主義的口號。歐洲初期的

市民階級之形成，就有封建地主和暴發農人兩個因素，以後始逐漸的發展成爲現代的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之後，新興資產階級的產生，大都由貴族和地主商人轉化而來。所以階級鬥爭，正如中山先生所說，是社會病態的現象，不是社會生理的常態。階級鬥爭果爲歷史進化的動力，試問在人類原始社會既無階級，何從鬥爭？既無鬥爭，歷史又何從進化？在今後無產階級如已結束階級的歷史，眞正的歷史又何從演進？雖然有人以爲馬克斯對於歷史進化，截頭去尾，祇作中斷的解剖，而爲其辯護，以圓通其理論，但階級鬥爭，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眞是戲弄着歷史的進化，哭笑不得！查社會階級的構成，乃由於私有財產的發生。私有財律發生的原因雖多，而其主要的決定原因，則在於人類自馴服禽獸而有家畜起。及至農業生產的進步，這些財產由節省而保存，由公有而私有，其中人口繁殖和生產量有限制，以致生產與分配，人類不克使之調協，要爲其主因。自是乃發生人與人爭的事實，逐漸演成貧富階級的分野，形成階級的對立。是以消滅社會階級的存在，首應如何妥謀生產與分配的調協，而階級鬥爭祇是社會病態的現象。假使階級鬥爭爲歷史進化的唯一方法。試問當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共產主義實行之際，生產量不敷人口的分配，那又將怎樣？這時是否復以階級鬥爭爲求歷史問題的解決？據馬克斯說，無產階級實現共產社會之後，就是消解了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同時也結束了階級的對立。試問將來發生了財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則又怎樣消解？是否又將以新的私有財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再造成階級鬥爭，而解決這一問題？果爾，則又非人類文明進化

的眞正前途。馬克斯意識中的眞正歷史的開始，克斯理論以推，英美與德日意軸心集團結合，又非這樣，眞的成爲帝國主義集團與國際主義集團的兩個階級相戰；而是組關年的。但事實却不可。既知今英美與蘇聯同盟，造成對德意日鬥爭的局勢。所以這次戰爭認爲是壓迫階級與無產階級是必爭，同對蘇聯作戰，因爲資產階級是由民族構成的，若言若日世界間題，其癥結在於民族的分野，所以這次世界大戰的基本原因，乃在於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的鬥爭，雖然這是由於資本的帝國主義所造成的現象。溯此次大戰的開端，在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事變，經過七七事變，中國抗起全面對日抗戰，是火燃原，歐戰爆發，蘇聯終亦捲入漩渦。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號日本發動軍事，進攻珍珠港，佔領香港，牽致英美參入戰場，形成世界大戰。蘇聯爲求爭取生存，不惜離開階級鬥爭的立場，放棄英美非屑作戰。依此而言，蘇聯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將來果有成就，然已非馬克斯主義可使其實現，而是史太林主義的力量了。階級對立是展開歷史進化的動力，果眞何解？

馬克斯唯物史觀爲什麼有這麼多的矛盾呢？這原因固在於他將歷史劑的說明，同時，也在他的理論是從純哲學的思想體系裏推論出來的。馬克斯辯證唯物史觀是從黑格爾的理性哲學及其辯證法頭去尾，祇作中斷解當經然不着鐵的事實試煉。

心史觀轉化出來的，而這些思想之精華，則是第二版序言上，自己明確的說過：

「我的辯證法根本上不僅有異於黑格爾的，而且簡直相反的，因爲黑格爾的思想歷程變爲一個獨立的名目，成爲現實的造物主，製造他的外象。依我，理念是腦被倒置之內，而莫過於轉到和變到人類頭腦之中的物質。」（德文版）

×　×　×

「……依他（指黑格爾），理念在於頭腦之內，我們必須倒轉他，且去揭穿在這神秘外衣裏的理性核心。」（德文版）

黑格爾是十九世紀有名的唯心哲學家，根據他的哲學上理性觀念，引用到歷史的範疇，主張一部歷史不過是理性的自由發展的過程。黑格爾曾講著歷史哲學一書，說明其思想的體系。該書緒論上就說：「歷史在一般上說來，便是『精神』在時間裏的發展。」所以要瞭解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必須先要明白其哲學的基本觀念有二：一是理念，二是辯證法。凡理性，精神，合理，和自由思想諸詞，皆自理念轉化而來。理念變成意識的自由，而實現其自由，宇宙間一切成爲理性，而一切又由理性以演出，原始的單純的理性觀念，是從抽象到具體。而這具體是內含的實在，這一具體的實在，就是理性發展的結果。其發展的規律，是由正

（或肯定）與反（或否定）相繼推演的。這一矛盾是內在的，即一具體的內在的消解，便是合的產生，也就是新的創立以代替舊的毀滅。毀滅的意思是廢除其內在的本性。這一新的創立就是合的實現。合是相對的統一，包含着正及其反的觀念，變成了存在。不過，這現已形成的觀念既包含着以前的觀念，即成了一個大的全體。由於明瞭聯合正反兩觀念，便得到一個變的觀念。變是一方存在和一方不存在的境界。因爲從這個情境轉到另一情境，所以變的觀念，亦即生長和毀滅。不過，觀念的體系在一個不間斷的純粹的進步的裏面，必須形成其自身，和完成其自身，而解脫於外在的生長。因而「反」在某種意義上祇是取消其被否定的（即正）觀念，而再發生一較高的統一。總而言之，向前奮鬥的辯證程序，就是理念存在的自身發展的表現。而這存在的胚胎搏在思想裏，一如在事物裏，以同一辯證的韻律，在那兒自己擊動着每一確定的現象。在其限制的性質裏便即指示出超越其自身，而這在一個偉大的全部現象裏，祇不過是一個開頭（Keime，或譯契機）。由此可知早期發展的結果，決定其晚期的發展，這因爲「正」轉入於另一情境確以其「反」的關係。例如，對比心的結果，生死的韻律，光明與黑暗，以及人類社會眞理的矯枉過正，皆是。這樣，正反相生，繼續不已，一直發展到絕對的階段，是即爲精神的自由之追求。宇宙間無處不被這正反律所決定，所支配。這一律不但存在，而且貫澈於每一思想，每一事物之中。任何事物，皆有其自相反對處，故有其正，即有其反。反就是否認其自身，但非毀滅

其自身，同時，祇是肅清，建造，與消失，而轉入於存在。因正反兩方，復又調和於一新的具體思想或事物。而這新思想，新事物，比前一「反」者，則較豐富，較複雜，較高級，這樣自強不息的相正相反，一往如前，直到一切知識與存在的眞理，完全繹出。所以精神是與其自身相搏鬥，且其自身就是自己發展的最可怕的障礙，是以不得不戰勝其自己，以求向前發展，以求其理想的存在之實現。黑格爾對於理性發展的這種說明，就是而今衆所週知的辯證法，其公式是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成爲一個新的三段論法。這一辯證法，簡言之，就是理性發展的程序。理性經過辯證的經營，聯係，佈置與說明，是卽一切思想存在的表現。所以心靈存在於現象之中，歷史在其階段之中，卽政治，藝術，宗教和科學種種文化，亦復如是，蓋皆理性的事物或思想的表象而已。由此推論，理性在物質之先，物質僅是理性的思想歷程之階段的表現。而且精神與物質是相反的，精神的本素是自由，猶如物質的本素是重力。正因爲精神有自由，所以宇宙間一切思想，一切事物的發展與演變，其最後的原因，就是自由的開發，而達到其絕對的實現。換言之，就是精神的活動，在謀達到他自己的「絕對理念」的目的。這精神就是理性，就是理念，也就是上帝。黑格爾根據這個基本觀念便說明了宇宙的起源和演化。他以爲宇宙生長歷程之起源與本質，是由邏輯的理念而理性，而普遍精神，而絕對精神，如以宗教的說法或是上帝。這一發展的歷程是比照着物質世界的發展，由無機的而有機的，而到人類。世界創造之前是理念，其自身包含着存在的一切形式，而以辯證的程序發展出

來。這理念自身創造一個物質的具體。其初表現在無機的自然物之中，繼而表現在植物有機物之中，到這個階段則有了生命的覺醒。復次，表現在動物之中，到這個階段則有了理性的曙光。最後，表現在人類之中。這時，理性升入於心靈之中，成功於自我意識和自由。自我意識的心靈則表現於人類史，宗教，藝術與哲學，以及社會制度，家庭，法律，直待實現於國家之中，而且這也是其最後的最高的目的。總之，黑格爾的宇宙觀是從最簡單的存在觀念到絕對的理念，且這是由於純粹邏輯的觀念轉到自然的和精神的具體存在。至於自然世界和人類精神生命的演化，則有一定的自然的偶發之規則。於是，他就以客觀的理念及其辯證程序建立自己的自然哲學和歷史哲學。關於這一思想的體系，可分三部份說明：第一部份由邏輯構成，這不僅是人類思想形式的學說，且是於存在之下的永存思想的表現。自然世界與精神世界是一樣的，受治於這一般的法則與思想，邏輯則顯示他們純粹抽象的形式，而表出一個觀念，是怎樣由於別的觀念發展出來的。第二部份由自然哲學顯示着存在的思想之內容，不在於邏輯的抽象，而在於時間空間的外在形式。從邏輯到自然哲學必須依着辯證程序。自然自身一步一步的發展，由其外在的而到精神的內部，其中最重要的階段，即機械功能，物理，有機體，而自然亦必須視爲有其階段的體系。惟在其階段的體系之中，這一階段必須由別一階段前進，而不是這個，由另一個自然的產生，乃是由於構成自然基礎的內在觀念。所以由這一自然形式到另一自然形式就是觀念的演化。據此，黑格爾啓示着後人，發生了一個觀念論的演化說。第三部分精神哲學，

自然哲學是觀念表現於自然界，精神哲學則是內在而獨立於時間空間，外化與擴大。在於自然界之下，意識生命的根源是觀念，是精神，而這些才是最內在的本質眞正的存在。每一事物卽是精神，精神卽是每一事物。黑格爾對於精神哲學又分三部：一是主觀的，卽是個人主觀的精神生命，凡如靈魂，意識，和個性，皆屬之。二是客觀的精神生命，凡如法律，道德，以及家庭的公民的社會，和國家的倫理生活，這就是絕對的精神，存在的精神，生命的全體。凡如藝術，宗教，和思辯哲學，都是絕對心靈的形式，亦卽世界精神的生命之形式。這其中包括了文化史哲學，而國家最重要。精神在國家裏較在自然界得着了充分實現，更加完全。總之，黑格爾哲學，從始到終，就是一種精神哲學，他努力使心靈成爲絕對的科學。一如唯物論者努力使物質成爲絕對的科學。這從他視國家爲上帝在世界上的進步，且必須被看爲半神聖半世俗的，卽可窺知。黑格爾的理念論究到極至，幾乎就是上帝一詞的烟幕，他自己就曾這樣的說過：

「按「世界歷史」以其最豪萬千，事態紛紜，而只是「精神」之這種發現乃歷史上眞正的神統紀。眞正證實了上帝。只有這一種發展與實現過程，「世界歷史」相關和——換句話說，以往發生的種種，和現在每天發生的種種，不僅不是「上帝之創作」。（王造時、謝詰譯歷史哲學）

黑格爾將其哲學上理性和辯證程序的二個觀念，引伸到歷史的範疇，構成其歷史哲學的體系。其歷史哲學的重要概念可以歸納成三個：第一是發展的，第二是客觀的，第三是有主導的動力。

一、就發展的說　人類對於歷史的看法，在神權優勢的文化階段之中，凡史載的事實，大都認爲神意的主宰。每一事物的盛衰消長，生死存亡，無非是神意一次一次的顯象或啓示。這不獨在西洋如是，在我國又何嘗不然。一部封神榜新舊約全書，以歷史哲學的看法，本質上又有多少差異呢？可是自黑格爾將理性的自由發展這一觀念引用到歷史上，解說事物的變動，那歷史的事實，已不是神意的表現，或循環的演變，而是精神的發展，向前不斷的演進。精神是歷史的基石，是歷史的實體。精神發展的程序是本着辯證法的規律。所以歷史的發展也是根據辯證法的規律向前開展的。精神的發展是自由的展開，所以歷史的演變也就是自由的實現過程，於是黑格爾曾認爲東方的歷史是一人的自由，希臘羅馬的歷史是某些人的自由，現代精神臨到了日耳曼的歷史階段，便是全體人的自由，猶如太陽升自東方而向西轉，各民族的盛衰，宛若自由的傳遞者之更替，自東方到西方的各民族祇是理性的自由這一過客的旅舍。這個旅舍的形象就是國家。所以黑格爾說：

「在世界歷史上唯有形成了一個國家的那些民族，才能引起我們的注意。要知道國家乃自由，亦即絕對的最終的目的之實現，而且牠是爲牠自己而存在的，又要知道人類具有之……

的價值。——一切精神的實在性，都是由國家而有的。」（歷史哲學王謝同譯本）

這個自由的過客，現代既經到了日耳曼的旅舍駐蹕，這個旅舍的形象將是日耳曼國家的建立和形成。日耳曼民族就代表了世界精神。其精神的發展可分三個階段：第一是從日耳曼人而遞至查理曼帝國止；第二是從法蘭克帝國分成各民族至精神的教會與世俗的國家之分離；第三是精神變成世俗而實現，世俗則又由精神所從出。但這一日耳曼精神就是現代的世界精神。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與其國家哲學，由此以觀，是不可分的了。他視國家為歷史的目的，國家的基礎，亦即世界史的目的，這就原於精神是以世界歷史做他的舞台，他的財產和他的實現之場合，而世界歷史也是表示精神的自由意識之發展，以及那種自由以後實現的經過。由此，黑格爾給予了我們對於歷史有一個發展的新觀念。

二、就客觀的說　黑格爾曾說：「理性統治了世界，而結果又統治了世界歷史」。我們要知道這個統治世界轉又統治歷史的理性是獨立於萬有現象之外的，他是一個超然的，普遍的，而有其自己的實體之存在。宇宙間一切萬有現象，皆為其從屬，供其驅使，而是他的工具達到其絕對自由發展的手段。假此，可以知道世界歷史是精神的領域。世界分為物理的與心理的，物理的自然界雖包括在世界歷史之內，但祇是精神的舞台，藉此以表現其自身的最具體的實在，所以自然自身不能被思考成為一個合理的系統。所以黑格爾說：「自然加於歷史發展的影響，

不應估價得太高或太低」，因爲自然祇是精神自身的發展的一種工具。這裏，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瞭解，黑格爾所說精神是內在於人的。如就黑氏看來，人也是精神的表現。因爲精神的本質是自由，所以人也是自由的。但是一切個人之心的深處，所潛伏着的精神，原在無意識狀態之中，要使一切個人曉得自由，須先喚醒了，那個人便有了主觀，有了意志。這主觀的意志當形成一個有意的對象的普遍原則，那也就構成了一國文化的萬有現象的全體。這一全體的實體，便是民族精神。於是每個人民就是其民族的驕子。民族精神是客觀的存在，歷史上各種特殊的民族精神，就是表現着「精神」在各種最高形式裏的神聖而絕對的發展，經過了這種發展或階段的演變，以取得其眞理與自己的意識。這個合理的自由之寄托物，就是國家，而國家便是在人類意志及其自由之外部的表現上之精神的觀念。因此，歷史形態的演變是不可能離開國家的。所以國家也是一個客觀的存在，而且凡如人民，河山，以及一切的物質財產，皆爲國家所有，國家形成了這一切的生存和實在。個人是須要爲這個客觀存在的國家而生存。於此，我們要深切的記得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幾乎是打成一片的，所以歷史的演化是以國家爲中心，且有其客觀存在的動力在。

三、就主導的動力說　對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我們瞭解其發展的和客觀的三個基本觀念，

之後，就可知道一部歷史既不是走馬燈式的循環，也不是神意及時的啓示，而有一個客觀存在的理性，循着辯證程序的規律，在那裏自強不息的繼續發展，且向着其自由的終極去發展。這自由的追求，更是一切發展的主導動力。凡物質的和道德的世界，自然與歷史，甚及科學，藝術與宗教，皆祇是這種理性的自由發展的階段和實現，離開這一自由的發展，這些便都不能存在了。惟這些又是思想的自由之各部份。這個思想是獨自存在的，他自己根據一個內在的規律運動着，從絕對的原始存在，一直轉入到每一事物。其演進的階段，主要的分爲三個：第一是邏輯，第二是自然，第三是精神哲學。當第一階段時，這個思想通過於自然與心靈的觀念。繼而當第二階段，這個思想於是特殊化，計劃化，而通過於自然，數學，物理，以及有機學的各種範圍。最後當第三階段，這個思想便解脫於自然之外，另有一種情態，而到自由精神，成爲意識的理性。此時，精神哲學所熟知的一切，則在經過其生命的全部階段，而實現於許多外形之前。但無論如何，這一思想的自由或精神尚未完成其全部的解放，而到圓滿的境界，所以歷史依然向前發展，以達到世界歷史的終極。由此可知，不論自然的抑或心靈的世界，總是瞬息不停的發生着變化。這些變化皆有其主導的動力推演着。至於發展到精神哲學階段，計有主觀的，客觀的，和絕對的三種心靈。從主觀的心靈表現的，有人類學，現象學，和心理學等。從客觀的心靈表現的，有立法權，道德和道德的服務等。從絕對的心靈表現的，有藝術，宗教，和哲學等。而歷史哲學就是哲學的一部份。這一理性演進的踪跡，則可於國家之中追

義，因爲國家是精神的自知自由的形式，而將達到思想的自由之目的。所以思想的自由便成了歷史演進的主導動力，也就是歷史的最後原因了。思想既是世界秩序最後的推進力，則思想的價值當然頗大。因爲如果思想不能預見新的，則辯證法就不能發現眞理。所謂眞理固不是死的存在（存在意即實體），也非僅是主觀的，而是這兩者的活的統一。因爲存在不是被動的死的統一，祇是程序，祇是生命精神的發展。個人意識愈能達到的知識，這知識則愈容易。須知從普通意識發展到思辯意識，是經過不同的程度和形式的。一切思想的特質，就是每一特殊的思想必須轉入另一思想，猶如事物的特質，每一特殊的事物必須屬於同一的別的事物。世界精神在時間上已經耐着很久了，曾經過一長串的許多形式，且有耐性，擔當着世界歷史的巨大工作。換言之，世界精神在每一時代，就形成其全部內容所可能的工作，而此工作則由思想以預見其眞理，思想達到眞理，也就是存在最內在的生命之直接的表現。當我們思及存在，而存在即在思想之內，所以思想是存在的主動，那末，歷史發展的主導動力也就是思想的自由。思想就是人之異於禽獸者的特質，人類之所以能實現自由的理想，而成爲思想的存在的，即以其有實行的因素，而實行的活動便是意志。有了意志的活動，思想乃得實現，才能實行。惟此又須有感情，有了感情，才能集中意志於其努力的對象，人類一切偉大的事業，就是由理想和感情織成的。換言之，思想有了意志和感情，便能實現自由的理想，而寫出了一部世界歷史。

我們對於黑格爾的哲學和歷史哲學既已扼要的說明，由此可知，馬克斯的辯證唯物論和其

辯證的唯物史觀，正是黑格爾的反面文章，也正如馬克斯自己所說，他將黑格爾的方法引用到社會範圍內，以辯證法爲社會發展的規律，構成自己創造轉過來了。他以黑格爾的方法引用到社會範圍內，以辯證法爲社會發展的規律，構成自己創造世界歷史的理論系統，樹立了辯證唯物論及辯證的唯物史觀的基石。但馬克斯爲什麼要與黑格爾的學說恰巧相反呢？如要深切的瞭解這點，自須從形成他們思想的時代背景去研究。因爲他們時代環境的不同，所以他們各人創造的學說自然也就有異了。

黑格爾生於一七七〇年，死於一八三一年(George William Frederich Hegel Aug.27,1770-Nov.14,1831)享壽六十一歲，德人。這六十年正是歐洲歷史劇激轉變的初頭，一八三一年是歐洲大陸正是這一時代匯流的地方。西歐新興工業社會的民主革命的中興。在這新舊狂潮激盪的時代，而日耳曼尚停滯於封建的制度的農業社會的情況之中，這一落後的漸離抵不住歐西三大潮流的衝擊。這三大潮流：第一是十八世紀的理性思潮，第二是由工業革命所激成的民族統一，與第三是民主自由的政潮。黑氏幼年研究神學，自然科學與哲學，頗受康德與盧騷的影響。對於政治，尤具興趣，且仰慕古典，所以他在思想上徘徊於宗教與理性之間，又因研讀政治史與宗教史，而領悟偉大的思想對於許多民族和時代存在的關係，故當時主觀的，批判的，理性的，和革命的傾向，總之，在浪漫主義的狂潮之中，使其感覺到生活上客觀力量，消失了自己。但

他有再度使其生活豐富的要求，且將這一要求轉入於思想的形式。由是，黑格爾對於觀念與存在發生了思想，進而欲以此構成其思想的體系，這就是他創立辯證法的背景。適於此時，當一八〇六年法國拿破崙第一進佔耶拿（Jana），黑格爾身感國破家亡，處境困窘。這種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遭遇，便又爲形成其國家哲學和歷史哲學的背景。不論其純粹哲學抑歷史哲學，要知黑格爾立言的用心，乃在拯救祖國，挽回日耳曼的刼運。這一個破碎的山河怎樣完整？這一羣落後的同胞怎樣喚醒？皆是黑格爾欲圖復興德國的中心思念。處於這樣的情境之下，祇有以理性的自由，作爲精神的號召，鼓鑄日耳曼人的心靈，努力壓迫的解放，創造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所以第一他說：現代世界的精神已經臨到了日耳曼精神的時代。在這時代精神開始意識着自己的自由，這一精神的意識的自由反映成民族精神，寄託於國家的形式，而每個人民皆屬於國家的。當國家正在發展形成之際，每一個人民能以主觀的意志與合理的自由相和諧，這個人便是時代的驕子，便是這時存在的精神之代表，便是一個特殊的民族天才，也就是歷史上創造國家的偉大人物，這是給予了每一個日耳曼人以何等的新希望，新信心！而且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原與其政治哲學是不可分的，他視國家爲歷史的目的。「一個民族當從事於實現牠的宏大的目標之際，並且當牠以客觀的生存賦予他的各項宗旨的過程期中，抵抗外部暴力，保護自己工作之際——這一個民族是道德的善良的強有力的。」（歷史哲學王謝同譯本）這在精神上又是何等的鼓舞着每一個偉大人物去奮鬥！這些偉大人物既職司着爲世界精神的代

理人，他們的生活和命運就沒有快樂的幸福，祇有辛勞的困苦，努力喚醒羣衆，喚醒每一個人心底深處所藏着無意識的精神，使之自由，而完成其偉大的使命，適應時代的需要。這正如孟子所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黑格爾既體經到個人與時代的關係，有這樣的密切，所以他認爲國家與個人，祇有國家得以存在，能夠實現，個人的痛苦抑快樂並不足重，這便構成了個人爲國家而生存，國家不爲個人而存在的名言。每一個人的生存既屬於國家的，所以各個人在其自由限度之內，對於道德的破壞是應該負責的。這責任就是主觀的意志力。主觀的自由之結合，便是道德的全體，便是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之中，才得享受自己的自由，但又以承認法律和政府是完成其自由的絕對而最終的目的之實現，且是爲其自己而存在的。凡人類所具有的一切價值，一切精神的實在性，都是由國家而有的。所以在國家裏，歷史的對象有其確定的形式。因在國家裏，自由獲得了客觀的存在，而法律即是精神的客觀性的，亦即眞正的意志力。是故祇有服從法律的自由的意志。這不啻成爲呼籲日耳曼人創造現代的民族國家既予以理論的基礎，和精神的鼓舞，又不能不考慮到當時實力的憑藉。他環顧情勢，雖有普魯士邦可以作爲根據，然無物質的實力以運用。是又不得不以精神爲重心，強調精神力量。所以他雖然承認自然

環境的物質力量，却以精神力量來支配，來控制，來運用，使其發揮作用。他除以理性的自由，喚醒人民的道德心，推動各個人參與政事，改造國家；而以法律構成國民的權利之外，又以天然的形態，河山風雲，以及一切的物質，甚至祖先所存留的一切遺物，都是國民所有的財產，而鼓動人民去愛慕。因爲這些物質，也是構成國家的必要因素，實現國家的基本憑藉。所以他說：「我們不應該把自然估量得太高或太低」。其次，黑格爾也知道欲使魯普士邦爲建造德意志國家的根據地，那便不能摧毀普魯士中心勢力的地主和王室。所以他從前攻擊德國封建制度的那種政治理想的革命情緒，一轉承認「一個國家民族能夠遭遇性格高尚的君主，固然是一件非常的幸事，但對於一個偉大的國家，其實力在於其賦有的「理性」，那末，國君之賢不肖也就成爲平淡無奇了。」他這種轉變完全因爲法蘭西的大軍，踏遍了日耳曼的領土，分解了日耳曼帝國，所有各種的封建義務都已消失；同時，日耳曼人已接受了拿破崙所撤下的自由。不論財產抑生命的自由，俱已普泛的被人承認而接受了。此時德國祇是需要一個現代的國家之出現。憑藉什麼力量使得這個國家出現呢？黑格爾刼後餘生，行年垂暮，已無勇氣再繼續着少年的雄心，而想另有所圖。於是不得不承認普魯士王室和地主的中心勢力，企謀憑藉這種現存的實力以完成這個正在發展的德國。乃主張「既有了確實規定的法律，與有條不紊的國家組織，那末留待君主親自獨裁的事件，在實質上也就無足重輕的了。」簡言之，這不啻就是承認君主立憲制的論調。在這個立場上，從前咀咒的，後來讚賞了。從前讚賞的，後來咀咒了。所以他

說的：「所有合理的就是實在的，所有實在的就是合理的」。這一句名言，也就發生了推動時代的作用。明瞭這個矛盾，便知道黑格爾何以既欽慕拿破崙第一於前，又重視霍亨索倫朝於後的道理了。這一位偉大的時代哲人，他所創立的辯證法之眞理，便從其自己的生活上說明了。

黑格爾的辯證唯心哲學及其唯心史觀，後來馬克斯針對着這些，恰巧轉成了他的辯證唯物論及其辯證的唯物史觀。要知道這一個旋轉乾坤的奧妙，則須從馬克斯思想的背景去瞭解。馬克斯德籍猶太人，小於黑格爾四十八歲，生於一八一八年，卒於一八八三年（Karl Marx, Mag. 1818—March 14, 1883），享壽六十五歲。這六十五年正是十九世紀的年代，歐洲的社會情況較諸黑格爾時代已有了很大的不同。當此之際，政治上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已經完成，封建勢力大體消滅。經濟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亦至盛世，而且弊端業已百出。社會上不平的現象也隨之暴露無遺，益趨尖銳。資本家與勞工生活的對照，不啻天堂與地獄的寫實。社會主義運動因勞工問題而興起。思想上理性哲學與機械唯物論亦以自然科學的發達而動搖。所以馬克斯雖係德籍猶太人，但其時代問題固然既非建設一個現代的日耳曼民族國家，也不是要求資產階級的平等自由了。相反的，新興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盤據要津以後，祇見其利用政治的力量，助進資本主義的生長，造成勞工生活的悲慘。況其親見一八三〇年之後，以法國爲中心的歷次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以及德意志帝國的形成，而看出國家組織的流弊，祇是爲資產階級歷榨產業工人的工具，認爲這一工具將要被第四階級去消滅的。所以這時的問題在怎樣解決勞工羣

衆的生活，使其得着最低限度的物質資料，而免凍餒之虞。當時直接工人生活的情況，極其痛苦。居在陋室，衣不蔽體，食不及飽，受着生計的勢力，可得賤價出售，維持一己生命的苟延殘喘，於是工人生活深度的墮落，即婦女童工的遭受，亦復如是。此實物質的勢力之下，耳目見，無非物質力量的活動。這力量轉變了生產方法，粉碎了政治制度，摧毀了社會特權，在這時代，人民凡如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都已悉改舊觀，產生了新的文明。政治社會的組織形式也樹立了新猷，確定了新的機器的輪子展開了新的時代。

馬克斯初習法律，哲學，經濟，從此領悟法律的內容乃由經濟生活所規定；不如黑格爾所言，法律是由客觀的理念與主觀的人格所結合而成的國家。同時他爲求德國精神的解放而研究態度，討論德國政治經濟問題，進而探討人類整個社會，全部文化，便從現實的社會尋求其經濟的基礎。根據這樣是說明宇宙萬象之以辯證法。因爲辯證程序是說明宇宙萬象之以辯證法。因爲辯證程序是說明宇宙萬象之以辯證法。因爲辯證程序

方的觀念，則卽轉入於前一觀念的反，所謂反，就是正的不確定的內容，也就是成爲有力量的新觀念了，且卽將有較豐富的階段。馬克斯利用這一套公式，便說明了當時經濟的發展，鼓舞着舊門的途將會消失的。這便給予每一個處於惡劣境遇之下的人有可以推翻現實的信念，精神。所以恩格斯說：「馬克斯發明人類史的進化律，正如達爾文發明有機物的進化律」。根據這一思想的程序，馬克斯對於第四階級則寄與冀大的希望，而推許其爲歷史的推動者。因此，他一則以共產黨宣言鼓動階級鬥爭，務使產業工人深信將取資本家而代之，再則以資本論說明剩餘價值的泉源在於剝削工人的勞力。他既指示了階級鬥爭的具體方法，又給予了無產階級的理論知識。他這種對於無產者的誠懇和熱情迥異於理想派的社會主義者空洞同情。馬克斯以號召各國工人聯合起來，從事革命，奪取政權，創造新的秩序，新的世界。由此可知，馬克斯與黑格爾兩者理論雖殊，而其推動時代之用心則一。黑格爾重視普魯士封建勢力的王室地主，雖有異於馬克斯剛結合世界第四階級的產業工人，然其要把握實際的力量則一。所以馬克斯的思想。

黑格爾的理性哲學和辯證法，因其自身卽含有矛盾性，一方承認現實，一方又否認現實，所以頗受人批評。在他死後，其門徒就分左右兩派，而青年派中的馬克斯尤爲激烈，而乎以無情的批判。可是馬克斯自己的唯物論及其階級鬥爭說亦復遭人不恕的攻擊。他們的學說皆以其本身不純，故於死後，派別四起，亦期其支離破碎。但事實上，黑格爾與馬克斯在歷史上都有

很高的地位。這地說由於他們學術上的理論成功，毋寧說由於他們事功的影響。黑格爾的國家哲學，以後果眞的被普王威廉第一及俾斯麥作爲統一日耳曼民族，建設德意志帝國的精神源泉。馬克斯的階級鬥爭，以後也果眞的被列寧運用着推翻了俄皇，而實現勞農革命。可是，爲什麼他們對於歷史哲學的眞正理論，並沒有完美的成就呢？這因爲他們共同的失敗都在引用純粹哲學的理論以解釋歷史上的哲學問題。現象哲學的範圍。現象的事實不能全證本體哲學的觀念以說明。本體與現象的關係，是一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一）的。本體論的要素在於探求普遍的，共同的，和抽象的原理，而現象論的要素則在說明特殊的，個別的和具體的事例。所以本體論的觀念固可包容萬有現象本質上的共同，但却不能說明萬有現象事實上的差異。例如哲學上時間空間的觀念在哲學方面與歷史方面就不妨有各別的差異。現代自然科學的進步，對於時間和空間的觀解，今昔相較，大有不同。最近哲學上的「時空」觀念來解說歷史，那還有什麼歷史可以存在呢？歷史必須仍以時間和空間兩觀念爲其經緯。哲學上「時空統一」的觀念是由物體運動表現出來的。物體運動的展開則是空間。物體運動的展開是由物體動態展開的，時間是由物體靜態顯現的。關於這點，　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演講裏曾經有極的啓示過。他說：

「我從前在上海的時候，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着急起來，找着汽車夫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分鐘之內，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夫答應說，一定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夫自由去駕駛，向目的地出發。……至於那個車夫選擇那一條路走，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夫說，為甚麼要這樣彎彎曲曲的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夫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車，來往是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馬路和外擺渡橋是從空間上着想，那個車夫甚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很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彎一點，多走幾里路，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在所限定的鐘點以內，可以趕到的，他的這樣，是從時間上着想。那個車夫不是哲學家，本不知道用甚麼時間空間去打算，不過他是專門家，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彎路，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

這個汽車夫，中山先生比喻的用意，是說明他是政治的專門家，可是，我們此刻如果認為這個政治專家的車夫兼為哲學家，那他是懂得時間與空間是物體運動的形式。物體停止的形式是時間，物體運動的形式是空間。根據這個瞭解，對於所謂爭取時間的活動，那就是將物體的

形式，不論對象的抑工具的，祇是使得他頓住的機會少於展開的機會就夠了。合併起來，所經過的時間愈短。譬如人之步行慢於汽車，汽車的活動慢於飛機而不取汽車，或算用汽車而不以步行，這其中的速率快於汽車，汽車快於人行，也就是他們彼此在運動的歷程之中，各自頓住的機會不同。

由南京到上海的火車，一種是特快車，途中祇停一下，所需時間僅有五小時二十分鐘左右。另一種是慢車，沿途逢站必停，則需九個小時之。兩者相較，幾達一倍時間。這就在於慢車運動頓住的機會多，所以表現於時間上的差數也就大了。鳥龜所以能夠趕上兔子的，就因兔子睡着，睡着也就是沒有了動態，而在那裏頓住。其結果祇表顯了時間，沒有展開了空間，所以展開空間，而致勝利了。一九四四年冬，日本進攻貴州，中國爲爭取時間保衛貴陽起見，就會以飛機調兵增防，（註）而今在軍事

（註）日本犯黔境時，中國軍由空運調動，爲美空運總隊中國分部之偉績。據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部訊：中國境內美國空中運輸總隊基地二十一日電，關於中國歷史中一次規模最大與最困難之空中調動部隊之消息，刻已可予宣佈。此一調動開始於去年十二月一日，當時日軍已向貴州省推進，威脅重慶或雲南境內中國空中供應線之終點，中美將領經一度會議之後，乃規定將若干中國軍隊由北部運至雲南境內之多處機場，以便由該處

開赴殿場，應付日軍之威脅。欲調動此等部隊，如有卡車可用，尚需數月。蓋公路缺乏，且經過蟠岩之山地區域，於是美國空中運輸糊隊部印度中國分部之中國大隊，乃立即開始準備以飛機運輸若干部隊及其裝備。印度中國分部司令藤納乃作試驗飛行，結果表明，全部設備必須運往北方之機場，然後軍隊始可由該處起飛。駐在中國之空中運輸部飛機，乃立即行動，將營帳燈光設備，無線電，及飛航設備，以及必要之人員運往北方。是時天氣雖極嚴寒，但仍支設營帳供人員辦公及住宿之用。機場周圍遍裝電話線，跑道上佈設燈光，協助飛行之裝備，亦一一建立。運兵工作，進展極慢。其後逐日增快，達到最高峯時，每日遠超出千人以上。中國大隊之大隊長蘆尼少校，曾有數次親作十小時之往返飛行，並讚揚各駕駛員曰：「此舉實需要利用儀器飛行，即迅速轉向避免危險之高度能力，以衝過所遭遇之惡劣氣候。」此等飛行員所飛過之地面，乃全世界最險峻者。且其飛行路線，亦為前此所未利用者。決定航線之能力，亦須超乎常人。蓋即令加裝無線電發報機及其他補助工具，仍有廣大距離無法利用無線電也。各駕駛員晝夜飛行，且須利用儀器穿過極厚之雲層，進入北方機場所在地之山谷地帶。距離該山谷不及三十英里之地，僅有一萬四千英尺以上之

山峯在焉。在北方機場備任指揮工作者，乃萬衛哥里少校，為基地指揮官，其部下有經其親手挑選之工作益感困難，蓋彼等須在室外於遠在凍結以下之溫度下修理飛機須自油桶中將汽油吸入油箱。每一飛機均須裝最高載量，機內軍隊擁擠，裝備均置於艙面上。此一工作，不過為一切設備均極完全。舉凡飛機之修理零件，人員之用膳設備，以及管理薪給之人員，均無所不備。彼等們亦從事於若干小時內運輸軍隊至千英里外之工作。桂林柳州南寧等地之撤退中，此等飛機曾為中美軍隊挽回以千鈞計之有價值裝備。彼等曾直接運軍火與大砲至前線攻擊敵人，在戰術情勢必要時，此等飛機亦運送人員來往於中國各地。

上為求行軍的速度增快，大都以空運了。其實，一切為爭取時間的效率，而祇有加強物體運動的速度。這一知識的應用，就是根據這種「時空」的觀念。不過這個時間和空間的觀念是與一般人所意識着的不同，甚且相反。他們因為時間是動的，空間是靜的，而且認為是客觀的先驗

的存在。但事實上，空間和時間的觀念都是主觀的意識。我們普通所說的時間，其計算是以地球繞日運轉的動態爲標準，而空間則是以物彼此相對的靜態爲標準。可是，這些觀念現在用之於哲學上，則不能成立「時空」觀念，而用之於歷史裏又仍屬必要。據此，可知歷史哲學是現象的知識，我們不能將哲學上本體的觀念，完全推論到歷史的範圍，以構成歷史哲學的體系。黑格爾的唯心史觀固失之於此，馬克斯以物質代理性，企圖糾正，然又何嘗不失之於重蹈覆轍，而自陷入於這個深淵之中呢？

其次，再就人類本身而言，黑格爾將理念引入歷史裏，而認人爲精神的，人類的活動即理性的實現，故主張理性決定人的前途，以人爲思想的動物，故有自由。馬克斯將物質引入歷史而認人爲物質的。人類的活動即物質的趨避，故主張物質決定人的境遇，產生人的意識，故沒有人的自由。但人之爲人乃一現象的事實，至人之本質如何，則係哲學本體問題，而非歷史哲學所可論究。對於人之本質問題，自來各家解答不一。如認人類本質爲精神的，不論以任何一種佛語，若理性若心靈以表示，推其極要自宗教上神的觀念轉化而來。基督教舊約一說，足資代表。創世紀曾載：

「上帝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上帝將人造成，又將地球上一切其他的動植物全期給人類作爲食物。這是創世紀的第六日。耶和華上帝既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人的鼻孔裏，於是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又取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女人，世界上的人類其生也來自上帝，其死也則歸塵土。至於人有智慧，能知善惡，享幸福，受勞苦，那全是上帝的造作。就此而言，人的本質是神靈的，就是一種物質的，且是暫時的寄寓。相反的，認爲人的來源，並非如此，人的本質，就是一種物質的演化。這一觀念自達爾文人類原始一書出世，乃有科學的基礎。不論其爲猿類，人之最接近的進化階段則人，要知其本質則係自動物進化而來，而動物又是物質進化的結果。人之生死現象，純是一種物質變化的過程。關於物質進化的階段，中山先生曾分三期：

一、而作者則以爲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爲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爲人類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爲人類進化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諸天體多尚在此期進化之中，而物質之進化，以成地球爲目的。吾人之地球，其進化歷二千萬年矣。由生元之得而知也。地球成後以至於今，按科學家據地層之變動而推算，已有二千萬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爲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歷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

學，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於是乎起源。」（知難行易第四章）

據此以言，人是由物質進化而來的，其本質也就是自然人的態狀。不過要維持這自然人的存在，還是要靠門的，要人養生關係的，由此則又入於社會人的境界了。所以中山先生接着又說：

「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種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之進化，實尚遠，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知難行易第四章）

可見　中山先生對於純粹哲學與歷史哲學，截然分開了。歷史的形成乃係這一段遺教事，人類活動的結果。歷史的範圍乃係記載社會國家演進的事迹。歷史哲學乃係探討這些演進的基本原因或根本動力，而社會國家則是人類由於生存的互助而進化的結果。至於人的本質是否物質的，抑精神的，那是哲學上本體論的問題，而人之爲人則是事實。因這一事實的活動，乃有社會國家的發生，乃有歷史，所以解釋歷

史構成的最後原因，而是現象哲學的範圍。中山先生說：「民生爲社會歷史的中心」。這表明了他的觀點既不如黑格爾認爲歷史只是理性偉大的發展歷程的一個階段，也不同於馬克斯認爲物質的變遷——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生產方法的轉換，是歷史的中心。如就黑格爾所說，歷史哲學的空虛，正如弗林特（Robert Flint）的批評，他說依照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的結果，不是男女史，也非人民史。就玄學說來，祇是觀念的自我意識史；或者就宗教說來，只是上帝的自我意識史。」（R. Flin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874, p. 525）同樣的，如就馬克斯所說，歷史不是男女史，也非人民史，只是物質變遷史，經濟發展史，藝術進化史，甚或工具改良史。似此而言，人類自身反居於歷史之外，作爲歷史演變的客體，毫無主體的功用，這眞是何等的反客爲主，因果倒置呢？因爲他們在思想系統上有了這個缺點，不獨黑格爾要鼓動偉大人物去建設國家，創造歷史，即馬克斯也強調人在歷史上的主動作用，一則說人類創造歷史，再則說「哲學家直到而今，只是說明世界，無論如何，哲學家須要改變世界」（Marx: Theses to Feuerbach）。但這反而都表示了他們自己學說的矛盾和思想不周密。中山先生矯正缺點，消解矛盾，乃主張民生爲歷史演進的中心，而民生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民生主義第一講）。換言之，這就是以人，以人羣爲歷史的主體，爲歷史演變的中心，而人類自身又是進化的。其進化可分兩種事實，一是人類數量的繁衍，二是人類性質的改善，亦即量與質而已。這兩種進化的動因，則在人類生命的發展和生存

的追求。所以民生史觀的第一個基本觀念是人類自身進化。由於人類自身進化的結果，造成一部歷史，所以人類本位的進化觀，就是民生史觀的第一個法則。根據這個法則說明歷史變動的最後原因和主導力量，都在於人類自身，在於人類自身的求生存。這樣，人成了歷史的主體，而不再是客體的，受動的了。歷史演變的中心力量，既是人類求生存的活動，那末，人類不間斷的向前演變。這一演變，就人類全體而言，是進化的。所以中山先生說：

「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民生主義演講）

這就告訴我們，人類為着生存的活動，才有社會組織的形成。社會的野蠻與文明，則隨着人類求生存的活動愈複雜，愈進步，那社會亦愈文明。社會的進化過程便是歷史演變的內容。所以人類求生存才是歷史演進的最後原因。這樣，不僅對於唯心史觀認為理性的自由發展，或唯物史觀認為生產關係的階級鬥爭，是歷史進化的動力，加以糾正，揭穿他們玄學的神秘外衣，而且也將歷史哲學的研究，引到了科學的哲學領域之中。今後歷史哲學的發展，將也不再依然的循着思辯哲學的古道前進了。這是歷史哲學發展的界碑，這是　中山先生創造的勞績。

中山先生曾說：

「兄弟所主張徹底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底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

而民生史觀是三民主義的歷史哲學之理論根據，所以民生史觀的創立，不重也是集合古今中外歷史哲學的結晶品。試問　中山先生對於學術爲什麼有這樣大的貢獻呢？那正如他自己所說：「凡爲需要所迫，……人類能聰運而出，創造發明。」（心理建設知行總論）人類的需要，就是生活上的缺乏。他又由於生活上什麼的缺乏，而需要被迫着去創造知識呢？這就、得不去瞭解他的時代背景了。

中山先生生於一八六六年，享壽六十。在這六十年，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狂潮急流東方之時，而廣東一隅，首當其衝，故得濡染薰陶，感召於其間。就國際環境言，適值滿清衰勢，政治腐敗，民生憔悴之秋。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之後，我國門戶洞開，各國相繼侵略，滿人朝政昏庸，暴露益甚。自此，太平天國起義於內，帝國主義兵連於外，全國民生日苦，人心鼎沸，感時憂憤，政治的澈底改造，則已必然的涉及民族革命的一環。而中法戰爭一役，尤爲　中山先生立志革命的直接刺激。這一刺激實已包含着三民主義革命的胚種。他生於廣東，深得西方文化的先聲，幼年肄業教會學校，習聞及長從事革命，每當失敗之後，流亡海角，走

遍天涯，既洞悉世界問題的癥結，復高瞻國家建設的前途，本乃創立三民主義爲其革命標的，而民生史觀亦由是蘊育以成。換言之，他所欲解決的時代問題乃在建設一個爲人民　　的現代民族國家，以此爲基礎，進於世界大同，而冀立人類的永久和平之基石。所以他既不能承受馬克斯階級工具觀的國家論，也不能傅薪黑格爾理念自在觀的國家論，而另有自己創立的國家學說。這就由於中國情境，既相似於黑格爾時期的德意志，而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國家，以抵禦外侮，安定國內；故不能襲取馬克斯對於國家毀滅論的消極態度，且須進而反對之。然又須殷鑑於國家對於人民痛苦，無從解決，未克善盡其功能，故也不能苟同黑格爾國家絕對論的積極態度，乃參酌我國固有文化，構成其工具觀的國家建設論，以爲建國的理論基礎，以全民族的革命力量爲實現建國的源耕，因爲中國是一個工業落後的社會，既無現代階級陣線可以源耕，所以祇好聯合一切被壓迫的人民作爲革命的主導力量，以推動歷史進化的法則，既不同於黑格爾的辯證史觀的國家建設論，而以生物進化論爲其思想的核心，對於歷史，形成其人類本位的進化論。其進化律的基本理論，既吸取達爾文生存競爭說及克魯泡特金生存互助論，又承受我國易經上傳統的變化觀念。這些觀念與辯證法頗相似，然較請黑格爾馬克斯所說的，則又縝密而豐富。　中山先生以西方的科學成果充實了東方哲學的內容，固融會了東西文化，然亦創造了人類新的文明。易經變化的程序，是

有其終極的，每一變化的終極，就是陰陽相對的統一。每一相對的統一，就是生的局勢，生的狀態。故「天地之大德曰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六十四卦首列乾坤兩卦，以代表一陰一陽，昭示萬物的生存。「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陽爲正，陰爲反，是即有正反，乃有生。所以陰陽俱而始生，故屯卦次之。屯卦者生也，生之發展必長，故蒙卦次之。蒙卦者穉也，穉必有養，故需卦次之。需卦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爭，故訟卦次之。訟卦者爭也，爭必動衆，故師卦次之。師卦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比卦次之。比卦者對敵也，對敵必有準備，故畜卦次之。畜卦者儲藏物資也，物資既有準備，是則可以遵守禮節，故履卦次之。履卦者遵守秩序也，秩序既可遵守，兩方當能相安而往來，故泰卦次之。泰卦者通也（據序卦）。這十一卦是說明生物發展的經過，由鬥爭而到合作的階段。泰之一卦就是一陽卦合一陰卦（乾下坤上䷊）成爲相對的統一局勢，即是生命暢遂的狀態。然同時也就是矛盾的開始，生命不遂的樞機，故否卦遂之。否之一卦由一陰卦合一陽卦（坤下乾上䷋）而成，正象徵着與泰卦是相反的。如此推演着，其歷程經過剝復，損益，革鼎各階段，終至既濟與未濟，而結局於火水之對立，相尅相生，演化不已，極於無窮。其演化的情狀就是變的歷程。「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即含有陰陽消長之意。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由「陽勢增」到「陰勢減」謂之闔，即從太陰坤卦䷁之後一陽，增至六陽；由「陰勢長」到「陽勢消」謂之闢，即從太陽乾卦（䷀）之後一陰，增至六

陰；一闔一闢，卽一動一靜，動靜相推不已，而生變化。這一種的情狀，卽以爻象表示。「爻也者，效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這就說明萬物內在的情況一有變動，則其得失消長，便表現於外了。易經這種相對的演化，用之於自然現象，構成其宇宙論。用之於人事現象，構成其社會哲學。從而宇宙與人事，亦以此而貫通。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繫辭上傳第五）又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文言傳第七）復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說卦傳第一）總之，不論自然現象抑人事活動，以易經思想的看法，是變動不居的向前向進着。這演進則從對立的內在展開，在這開展的歷程，其中消長得失，盈虛進退，雖有矛盾的衝突和鬥爭，但這祇是生命發展的條件，發展的過程，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在求相對的統一與和諧。譬如「立人之道曰仁義」，仁義就是使得人類達到相對的和諧局勢。如果不能達到相對的統一，成爲和諧的局勢，則歸於滅亡，滅亡卽是無成，無成則不變不動，是卽爲死的境界，故死

而謂之窮。但是，不論自然界抑人事界，其最大的需要在求生，生即有成，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到窮的境界，又起了變化。故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通即動，動而謂之生。故曰：「生生之謂易」，就是這個意思。這一思想傳到西方，黑格爾雖略知大概，（註）馬克斯則祇知一半，而 中山先生身為先哲後民，淵源有自，故能全然瞭解本國的傳統文化的精華，加以會通西方科學文明的成果，對於人類社會組織，個人與羣體的關係，既予以相對的統一之觀點而說明，對於演化的規律，又以互助為首要原則，以修正絕對的矛盾，及階級鬥爭的理論，而打開人類「真正歷史」的初頁，撒播其進化的種子。馬克斯對於歷史哲學體系構成的貢獻，在將歷史，社會，和經濟打成一片，而 中山先生的貢獻，且將歷史、社會、經濟、和政治冶為一爐。馬克斯祇看到技術的價值， 中山先生且看到組織的重要，而以生命的發展來統一這兩個要素。推進這兩個要素的演化，則又有知識的智力，由於這三者的圓滿配合，益使生命進化的前途無量。

中山先生對於歷史哲學的貢獻固在以生物進化觀，而將人類自身置於歷史的主體之地位，

（註）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書中曾說明：「蓋易經—那部命書—使論及生與滅的。……中國人承認的基本原則為理性——叫做道。」（王謝譯本p.217）

以民生爲歷史進化的中心。可是人類求生存爲歷史演變的中心動力，這不僅在歐美近代思想的發展上，已啓其端，卽在我國古代傳統的文化裏，也早有了胚種。我國歷史哲學至今雖未發達，然一部史實紀載的開頭，便是以生活知能的進化爲起點。凡如衣食住行以及火與醫藥，婚喪樂器和文字的制作與發明，莫非由於人的生死之需要，和其奮鬥的結果所從出，這些都是初史的重要記載。「記載洪水以前之制作者，莫詳於世本。世本有作篇，專記歷代之制作，今據高郵茆泮林所輯世本佚文錄之於左：

一、燧人：燧人出火，造火者燧人。

二、庖羲：伏羲以儷皮制嫁娶之禮，作瑟，作琴；伏羲臣芒氏作羅，芒作罔。

三、神農：神農和藥濟人。

四、蚩尤：蚩尤作兵，以金作兵器，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

五、黃帝：黃帝見百物始穿井，作樂名咸池，造火食旃冕，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后益作占歲，更區占星氣，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容成造歷，蒼頡作書，史皇作圖，伯余作衣裳，胡曹作衣，於則作扉履，雍父作舂杵臼，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馬，腒作駕，共鼓貨狄作舟，女媧作笙簧，隨作竽，夷作鼓，揮作弓，夷牟作矢，巫彭作醫。

六、顓頊：祝融作市。

右皆唐虞洪水以前之制作也，其唐虞時之制作，未能確定爲洪水前後者，如：

堯：巫咸初作醫，作鼓，無句作聲，化益作井。

舜：舜始陶，鯔作規矩準繩，垂作耒耜，作耒耨，伯夷作五刑，舜作簫，垂作鐘，夔作樂，烏曹作簿。

夏：鯀作城郭，禹作宮室，奚仲作車，夏作贖刑，儀狄造酒。

亦見於作篇，皆可爲研究古代社會開化之資料者也。」（節引柳翼謀中國文化史）此外，散見於古代典籍如諸子諸經一類書籍之中，記載古代制作的發明頗多，傳說亦甚，如有巢氏教民構巢以居，神農氏教民稼穡以食，大禹治水以安生，而現代我國考古者對於發掘工作的成績，亦有可觀，以古物證古事。殷代古物出土，予以古代歷史的佐證不少，裨益匪淺。雖然，對於古代記載，現今國人尚有疑其屬於神話的傳說，加以誹議。但其象徵着我國先民文物的進化，皆由於適應人類生命的發展，滿足求生存的需要，則又不可厚非。人類的求生存，爲什麼可以成爲歷史的中心，而能去推動其進化呢？這就在於人類生命的發展，有滿足內在的衝動和外在的刺激這兩種的需要。舉如衣食住行和婚姻各事，皆爲滿足這些衝動和刺激的需要而產生。現代生物學的進步，說明人由高級動物進化而來，那末，人的本質已不是上帝用塵土造成，由鼻孔吹入靈氣才能活動的了。換言之，人已非上帝的後裔，耶和華的子女，或如任何宗教所說的神話了。人是由物質而物種進化來的。故人之爲人可有兩種意義，一是自然的，一是社會的。根

據科學的研究，關於自然的人既非由神創造，亦非精神的靈物，乃是由單細胞演化而成的。細胞一詞，中山先生譯爲生元，而其活動又極複雜。他說：

「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爲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爲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原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爲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爲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爲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爲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人之生活以溫飽爲先，而生元亦然。故其需要以燃料爲最急，而材料次之。吾人所食之物，八九成爲用之於燃料，一二成乃用之於材料。燃料之用有二：其一爲煖體，……二爲工作。……材料乃生元之供養料，及身體之建築料。……食物之用，分爲兩種：一爲燃料，素食爲多；一爲材料，肉食爲多。……食物之重要種類有三：即淡氣類，炭輕類，脂肪類，此外更有水，鹽，鐵，燐，鹼，錳各質，並生機質，皆爲人生所不可少也。……所有動物皆順其自然之性，即純聽生元之節制；故於飲食之量，一足其度，則斷不多食。……飲食入口之後，其消化工夫，收吸工夫，淘汰工夫，建築工夫，燃燒工夫，種種作爲，誰實爲之？……乃身內之生元爲之司理者也。」（知難行易一章）

食物入口之後，凡如消化，吸收，淘汰，建築，和燃燒種種變化的歷程，就是生活現象上

的新陳代謝作用。所謂新陳代謝，簡要言之，就是物質的分解與綜合。分解是破壞，綜合是統一的和諧。在生活細胞中，這分解和綜合的兩種作用不停，生命的活動不止。這種現象的和諧，便是生物的生長，和生殖的發展，也就停止了。關於構成生命的原素之生元，其本質，其活動，中山先生根據科學的成果而予以說明了。如再就哲學的辯證觀點以言，生命的本質，無非是生命物質矛盾發展的歷程，生命的現象乃是這一矛盾相對的統一狀態，和諧局勢。所以人類的一切生存的活動，也祇有在統一狀態，和諧局勢，才是生命的表現，這也就是歷史進化的最後原因。不僅人類的生活如是，即動植物的生命現象，也是物質的分解和綜合的總表現。換言之，即是在統一狀態，和諧局勢，破壞了統一狀態，擾亂了和諧局勢，那就沒有生命的意義可言了。生物的個體不僅是這樣的生長和發展，即進而以正反矛盾發展的觀點，探討全體生物進化的經過，還是這樣。何定傑氏以此觀點研究生物的進化而說：「由細胞循環推論到個體循環，這長期個體循環的結果，便有種的新生和死滅，即種的循環。這三種循環不能

分開。」（何定傑：生物進化論序）而這進化的原因和法則，便是根據「陰陽生剋，化生萬物」的辯證程序的法則。不過人是動物進化到最高的一種，其異於別種動物者，除了四肢的雙手，直立的身體，碩大而能思的頭腦之外，就生理上自然特徵的分別，就很難有其他的不同了。這一自然的人生命過程也是與其他動物相差無幾，祇不過是一種有機化學的變化，人無疑的是一種物質的有機循環，人的身體恰似一個極完備的工廠。一個有機化學的工廠，一個新陳代謝的循環歷程。人類一切悲歡苦樂，憂愁喜悅的活動，也無非是循環歷程中和諧與不和諧的現象之表示。鼓動這循環歷程不到衰亡而不停止的動力，祇不過是內在的與外在的兩種刺激。內外刺激的交互反應，使人不得不努力於代謝作用，繼續不斷綿延這種活動生存的表現。一切生存活動的基本動力，一個是胃的，一個是性的，也就是食和性的兩個刺激的資料，那便是引人與人的互助合作，亦即社會的人之所從出，也就是人類創造文化的基本原因。生元有聰明，有知覺，所以人類也有聰明和知覺。人類便憑藉這良知良能以創造其繁複的社會生活，使得自然的人進化爲社會的人，更滿足其生命的和諧發展，生存的統一狀態。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其間差別，不在生理上自然的特徵與其他動物的比擬，而在發揮其知慧，利用身手的技能，克服生命發展的障礙，創造適應生存的環境。羣策羣力以集團的力量，發揮知慧，創造技能，嚴密組織，戰勝一切。故凡人類的進化，祇是從生存鬥爭而來的。所以中山先生說：「人類要圖生存，便要去

鬥。」這鬥就是去同周遭的生存障礙作戰。可是他項動物也有生命發展的要求，其保全生存的方法是同人一樣的，所以「人食獸，獸亦食人。」惟人類終能勝利而統治世界的，則在人類能以集團的力量，發揮知慧，創造工具。人類既如此，其他動物，而有生命的養育和保衛的活動，故亦必鬥，以求這二個基本問題的圓滿解決。

中山先生說：「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對於生命的養育，事實上不獨個人本身生命要維持，且有種族生命的綿延。前者是人類社會結合的根源，後者是家庭組織的基礎。人類在原始時代，社會與家庭，常相打成一片的，以血統爲結合的中心力量而營共同的生活。原始人羣以其血統的關係結合，生活於共產方法之下。當時，宗教，道德，和法律，雖有萌芽，然亦以增進社會生活及氏族紀律爲主要的功用。自後，封建社會即從氏族社會演出，但其結合的關係除了血統之外，則建築在土地的基礎上，貴族佔有土地者却無所有權，轉成農奴。至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雖由封建社會擴大而來，然其基礎則建築在個人財產的關係上。易經序卦傳第九說：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

這一段，就是說人類社會組織，其根源在由於以血統結合的家庭發展出來，擴大出來的。

至於由氏族擴大到部族階段，則又有生活技術的進化，又由部族擴大到

現代民族的階段。今而後人類社會生活將由民族範圍擴展而成全體人類的共同生活，其重要的條件，則在實行各民族的交互結婚，而消失彼此的血統觀念。惟現代民族的集團生活，初亦由封建社會蛻變而成，人類社會這一組織的擴大，展開，其基本動力則仍是求生存奮鬥的結果。但不論家族的，封建的，抑現代社會的任何份子，換言之，即人類自身與其後代，都要維持其生命的發展和生存，是即要滿足其生活上的必需品。人類生活上的必需品是些什麼呢？那就是衣食住行的資料。

「我們人類究竟是吃一些甚麼東西才可以生存呢？人類所吃的東西有許多是很重要的材料，我們每每是忽略了。其實我們每天所靠來養生活的糧食，分類說起來，最重要的有四種。第一種是吃空氣，淺白言之，就是吃風。……第二種是吃水。第三種是吃動物，就是吃肉。第四種是吃植物，就是吃五穀果蔬。……這個風水動植四種東西，就是人類的四種重要糧食。」（民生主義第三講）

人類生命的發展，除了吃飯之外，還進化到穿衣和住行。

「在民生主義裏頭，第一個頂要問題是穿衣。……我們試拿進化的眼光來觀察宇宙間的萬物，便見得無論甚麼動物植物，都是要吃飯的，都是要靠養料才能夠生存，沒有養料便要死亡。所以吃飯問題，不但在動物方面是很重要，就是在植物那方面也是一樣的重要。至於穿衣問題，宇宙萬物之中，祇是人類才有衣穿，而且祇是文明的人類才

是有衣穿，他種動物植物都沒有衣穿，就是野蠻人類也是沒有衣穿；所以吃飯是民生的第一個重要問題；穿衣是民生的第二個重要問題。……穿衣的材料，和吃飯的材料，是同一來源的。吃飯材料要靠動物和植物，穿衣材料也是一樣的要靠動物和植物。除了動物和植物之外，吃飯穿衣便沒有別的大來源。」（民生主義第四講）

此外，關於住行的生活材料，除了動物和植物，還有礦物可以利用。人類生活進化之後，住和行的方式也很重要。

「居室爲文明一因素，人類由是所得之快樂，較之衣食更多。」（實業計劃）

至於行也是人生四大需要之一，故主張「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建國大綱）對於養育生命這些材料的獲得，人類其初是依據着自己的自然環境而奮鬥。原始人類採取果實，從事漁獵以覓食，築巢構穴以安居，冬皮夏葉以蔽體，胼手胝足以利行。進而才利用各種工具以獲取生活資料，這已到了以技術的方法去覓取資料，來滿足生活上物質的需要。關於衣食住行的進化，轉到利用工具的階段，淮南子氾論訓說得頗爲簡明。

「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蜃蛋，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縱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杼機，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

樺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叢木方版，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靰蹻，而起千里，肩荷負擔之勤也，而作爲之楺牛建輿，駕車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

這些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和其生產工具，直到而今，尚留存着爲我們中國人物質生活的主要方式。但在工業社會，這一生產方法現在已經進化到極大的規模，和極進步的工具了。不過，這種爲滿足消耗而生產的活動，即在人類原始時代，也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而是一羣人共同的活動。所以生產的目的既在消費，消費的手續則須經過分配的程序。人羣對於既經獲得的物質資料，不僅發生分配的程序，且有保護的必要。這一活動便逐漸的加強人類組織的密切，因爲要保護既得的物資，那就要求有一種強力能夠抵禦外敵的劫掠。由於適應這個要求，便更推進了人類的合作，加強社會組織的嚴密。所以　中山先生說：

「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民權主義第一講）

由此可見，人類在養育生命的要求上，發生了社會內部的分配問題；在保衛生命的要求上，發生了社會外部的抗敵問題。那時，外敵有二種：一是自然的，一是人事的。前者如毒蛇野獸和風雨雷火的災害。後者如外族侵略和疫癘疾病等。所以保衛的作用有二，一是人類自身的生命安全，二是獲得的生活物質的安全。在太古之時，野獸曾幾爲人類奮鬥的唯一對象。野獸被

戰勝了，而後才進到人與人爭的階段，發生人類自相殘殺的事實。總之，人類要圖生存，必須將保和養的工作，努力解決。換言之，人類爲着生存的必然需要，則有用什麼方法去獲得食物的活動。這一活動是工具的，是技術的生產，研求生產方法的進步，而今屬於經濟學的範圍。同時，當獲得或生產了物質資料之後，又有怎樣分配和保衛的要求，這一活動是權屬的，是組織的社會關係，而今屬於政治學的範圍。我們現在所研究經濟的或政治的問題，也就是討論人類生存上這些基本的問題，怎樣妥善的合理的解決。這些問題如果得不着妥善的解決，那就很容易的由於競爭狀態演化到用武力的決勝。其中，領土的佔據爲決勝的目標，這因爲一方面要保衛其領土，一方面要侵佔其領土。領土是生產食物的基地，人類生存的寄托所。正是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倘若土地一喪失，那生存便沒有了憑藉。惟各種人羣所有的生存憑藉不同，那生存便沒有了演進的程度也有異。

人類因彼此的居住環境不同，生活方式有別，這種關係，不獨馬克斯認爲是重要，即黑格爾亦不否認其應有的地位，而說：「助成民族精神之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繫，就是地理的基礎。」

中山先生對此更有精確的解釋，他認爲人類生活方式的進步，是隨着地理環境的。由於地理的自然環境不同，人羣生存的活動也發生了變化。當人類棲止在風調雨順的境界，土地肥沃，如歷史上著名的尼羅河，揚斯波他米亞流域，以及黃河流域的地方，都因有水利之便，容易生提動植物，既可以漁獵和畜牧，又可以耕種。人類獲得食物既容易，生活自然安定，人口亦昌

繁昌。人口財富兩旺之後，人類文化也就容易發達了。中山先生曾這樣說明過：

「像埃及的尼羅河兩旁和亞洲馬斯波他米亞地方，土地極其肥美，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尼羅河水每年漲一次，水退之後，把河水所帶的肥泥，都散布到沿河兩旁的土地，便容易生長植物，多產穀米。……所以普通都說尼羅河和馬斯波他米亞，是世界文化發源的地方。因爲那兩岸的土地肥美，常年沒有風雨，既可以耕種，又可以畜牧，河中的水族動物又豐富，所以人類便很容易生活，不必勞心勞力，便可以優遊度日，子子孫孫便容易蕃盛。」（民權主義第一講）

人類文化發源地是在優美的河流之區，已成爲共認的事實。即現代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有的已自漁獵時期進至農業時期；有的却依然的停滯在畜牧時期；有的即已進化到工業時期。這一差異，地理環境因素的不同，是很大的原因。至於由農業時期入於工業階段，這一經過，緊然視之，以爲與地理環境無關係，若加深究，還是地理因素的影響自以致之。現代工業發源於西歐，歐洲所以能使工業發達的原因，則在其地理環境不宜於農業發達，乘合各民族不得不從事於商業的活動。而且遠在古代，西亞文明已奠其基。腓尼基開其端，希臘繼起，工商業愈益發展。再由羅馬帝國，歷中古而南歐意大利各城市和北歐波羅的海沿岸各城，而伊比利半島西班牙葡萄牙興盛，卒由荷蘭，英吉利承其緒，而啓其後。近代工業革命的發生，就是商業擴張的結果，所以其發源地在英國。且追溯近代工商業興盛的淵源，亦自中古末期，西方人不能經過

巴爾幹半島，與東方通，乃有新大陸新航線的發現。尤其新大陸發現之後，更增加歐洲人的財富，而助進其商業的發達。商務範圍擴大了，轉又刺激着工業的改進，乃逐漸形成現代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造成了國際的貿易，於是人類社會，發生急劇的變化。就西歐文化發展的路線以言，由愛琴海，而地中海，而大西洋，由大西洋而太平洋。這個系統的擴張，固是商業進步的結果，同時，就是地理的放大。如就中國以言，文化區域的開展，由黃河流域而長江流域，由長江而珠江流域，轉而黑龍江流域。這一文化發展的路線，也是地理因素決定的。總之，地理是人類活動的舞台，舞台的地位不同，方向不同，自然的影響着演員的動作，聲音，語言，步伐，以及姿勢和表情各種活動的不同，這正如地理之於各民族生活方式的差異。瞭解這一事理，對於我國現在人口分佈的狀態，西北少於東南。文化發達的情況，東南高於西北。西北大體尚在遊牧階段，而東南已入農業階段，且因西洋工業文明的影響，亦有一部份入於工業階段。從我國西方至東方，其旅程恰似遊覽了一個活的歷史博物館，自原始的游牧社會，經過農業社會，而到現代工業社會。其所以如此，則地理環境的影響，已爲事實所說明。其次，再就四川省考證，每一著名的繁盛城市，大都臨於兩江交匯之處，自重慶溯流而上，如瀘州，宜賓，與嘉定各地皆是。至若其他支河繁盛的市鎮，亦均介於二水之間。自然的世界對於人類生活方式差異的影響，和其關係於人類文化的進步，其重要尤如空氣之於人的呼吸，而已成爲習焉不察了。尤其人類文化進步到而今，固尚有人重視這一點，但也有人

幾乎忘了這一點。其所以使人輕忽的原因，要在現代人類社會自身的演進較之自然界變遷的影響爲快爲大。所謂人定勝天，即人類知識力的進化，已可超越地理環境的限制了。所以地理環境對於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乃不成爲重要的因素了。不過，地理方面，尚有許多急劇的變化，如地震，海嘯，以及火山爆發等猛烈的變動，仍可影響人類社會發生變化，雖然人類社會僅管可以獨自的演進，但在某種意義上還須受着地理環境的限制。

於此，我們當進一步研究人類社會自身演進的原因了。人類社會自身演進的要素，可分二個基點：一是人的數量，二是人的素質。　中山先生曾說過，人類數量過於蕃衍之後，就自然的發生了變化。如他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裏所說：

「到了人類過於蕃盛之後，　那些好地方便不夠住了，　就是在尼羅河與馬斯波他米亞之外，稍爲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有風雨的天災。……遇到天災，人類要免去那種災害，便要與天爭。因爲要避風雨，就要做房屋。因爲要禦防寒冷，就要做衣服。人類到了能夠做房屋衣服，便進化到很文明。」

這就啓示了我們人口增加的結果，　使得人類生存的奮鬥愈加緊張，　由此便創造了文化。人類數量的增加，可以影響到人類生存活動的變遷，　由這地方遷往另一地方，　去覓食物以求生，　以遷徙方法來解決因人口增多而食物缺乏的問題，這幾乎是古時人類共同遵循的。　人口與食糧增加的情形，經馬爾色斯（Malthus）研究的結論，認爲兩者比例是不同的，人口增加

循環何級數，食料增加則循算學級數，且以二十五年爲一期。這兩者的增加率不同，結果人口多於食料，途造成爭奪的慘局。他這一說，自現代科學知識發達和生產力變遷的情況，予以批判，雖然不盡如是，但在往昔，人口增加超過食料的生活力，確可發生人類生存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或以墮胎，或以殺嬰，這都是歷史上班班可考的事實。人類在漁獵時代，每一部落或以人口發達，自相慘殺，或與游牧人民，互相鬥爭，皆是史不絕書的。中國自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遼金而元清。歐洲著名的日耳曼種族南遷，其勢如江河橫決，衝毀了羅馬帝國，建立了封建社會。這些都可就人口與食料的關係上說明了其重要的理由。不過，在人口多於食物的時候，除以擴大地理境界，尋獲食物之外，尚有以改良生產方法，增加生產力，多造食料的一法。然而做到這一點，則是人的素質的進化了，因爲以改良技術，增加生產量，這是須要知識的，要使知識發達，又須社會組織分工的進化。所以生產力的改進有兩方面：一是社會勞動的生產方法，就是以人種社會的分工合作，即以人的勞動分工，而增加生產力。二是工具勞動的改進，且因此更促進了人類社會的分工合作，而增加生產力。不過，以社會勞動或工具勞動的方法進步，增加食料的製造，滿足人口衆多的需要，這種使得人類生存的進化，是需要人類的智慧爲基礎的。換言之，這不是量的演變，而是質的進化。惟當質的進步不能適應數量的增加，以妥善的方法，解決人羣生活上物質資料的問題，亦即人不能使得知識進化，改良生產技術，加強社會組

織，以調協人口與食料的矛盾，那便入於自相殘殺的命途之中。於是，在這過程裏，則強化了私有財產的確立，造成階級集團的互相戰爭，這一局勢直到現前，愈益變本加厲。私有財產的起源，遠在畜牧時期，漁獵時代，人類戰勝了野獸，因死傷的肉體，容易腐化，頗難保存，所以那時的人類生活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吃不完的食物祇有拋棄的一法，既不知道節用，也不能夠儲蓄。因此人類社會原始時代是共產的，中山先生也曾說過：

「人類最先成的社會，就是一個共產社會。所以原人時代，已經是共產時代。那個原人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我們可以考察現在非洲和南洋羣島的土人生蕃，毫未有受過文明感化的社會，是甚麼制度呢？那些土人生蕃的社會制度，通通是共產。由於那些沒有受過文明感化的社會都是共產，可見我們祖先的社會，一定也是共產的。」（民生主義第六講）

這共產社會怎樣破壞的呢？其初是到了馴服禽獸的開始，禽獸一旦馴服，那就可以飼養，可以保存了。這樣，也就有財產的發生。中國家之一字，就象徵着私有財產的起源，因爲這時豬已可以畜之於屋內了（柳翼謀著中國文化史）。不過，這時財產　公共性的，我國大家的財產，直到現今還具有公共性的特質。一般而論，私有財產當進化到農業時期，更爲確定，而逐漸轉爲個別性的了。那時穀物的省用和保藏，甚爲必要。農業社會，人之所以要省用，要保藏。換言之，就是發生了節儲行爲，這完全因爲人類對於農產物的收穫，毫無把握，祇有依着天然氣候的變化，風調雨順，便是豐年。風雨失調，便是荒年。人類自己對於天災既不能控制，而靠天吃飯，

由於經驗的結果，所以就在豐收之年，也不敢盡量浪用，從而節儲，以備荒歉。因此，財產的積累既多，權勢的轉移，也就發生了變化。於是由集團公共性的財產，逐漸演爲個人私有性的了。至於加強個人私有財產制度深化的原因，則在交換的商業高度發展之後。由此亦有說明：

「非產這種制度，在原人時代，已經是實行了。究竟到甚麼時代才打破呢？依我的觀察，是在金錢發生之後。大家有了金錢，便可以自由買賣，不必以貨易貨，由交易變成買賣，逐漸生出大商家。當時工業還沒有發達，商人便是資本家。後來工業發達，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便成爲資本家的呢？他說：

商人的金錢又怎樣累積起來，而成爲資本家。……所以由於金錢發生，便打破了共產。」（民生主義第一講）

人類自發明了金錢，有了買賣制度以後，一切日常消耗貨物，多是由商人間接買來的。商人用極低的價錢，從出產者買得貨物，再賣到消耗者，一轉手之勞，便賺許多佣錢。這種貨物分配制度，可以說是買賣制度，也可說是商人分配制度。消耗者在這種商人分配制度之下，無形之中，受很大的損失。」（民生主義第一講）

消耗者的損失，就是商人的金錢就是由於這樣的獲得而累積起來的，擴大了商業發達了，商人更有錢，於是私有財產制度更加確立。由於生產工具的進步，商人轉又成爲有機器的資本家了。那就是商人不但可以買賣商品，而且可以壟斷製造商

品的工具，使生產者同生產工具脫離所有權的關係，使得勞動生產者的勞動也變成商品化了，從而社會的貧富則難相平，而其結構愈益顯其階級的尖銳對立。

「所以從前的資本家是有金錢，現在的資本家是有機器。由此可見，古代以貨易貨，所謂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時候，還沒有金錢，一切交換，都不是買賣制度，彼此有無相通，還是非產時代。後來有了貨幣，金錢發生，便以金錢易貨，便生出買賣制度，當時有金錢的商人，便成爲資本家，到近世發明了機器，一切貨物，都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更超乎有金錢的人之上。所以由於金錢發生，便打破了非產；由於機器發明，便打破了商家。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掠奪工人的血汗錢，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衝突，便發生階級戰爭。」（民生主義第二講）

從此，我們瞭解人類社會階級性的構成，其基礎在於私有財產制度的發展與深化。惟私有財產之所以確立，要之，亦由於人類求生存的動力推演出來的。社會勞動的分工，固展開了生產力的擴大，同時，也招致了生產品的交易，從此轉又擴大了社會組織的範圍。由於有無相通的交易，從而發明了貨幣。錢幣的發明固可節省勞力，而便從事文化的創製和發明，同時，也深化了財產的私有權。

「自有錢幣以易貨物，通有無，則凡以有餘而求不足者，祇就專業之商賈以買賣而已，不必人人爲商矣。是錢幣之出世，更減少人之勞力，而增益人之生產，較之日中爲市之利，

更大百十倍矣。人類自得錢幣之利用，則通步加速，文明發達，物質繁昌，財里之勢矣。」（知識行易二章）

人類既由漁獵時代進於農業時代，生活上物質資料的權屬，亦由共產形態轉入於私產制度。由農業時代進入於商工業時代，益加深化了私有制度，於是，階級對立也愈顯著而尖銳化。當私產制度發生之後，人類歷史的演進，其量與質便起了互相影響的作用。換言之，個人與羣衆對於歷史進化的作用，彼此究有什麼不同的地位呢？偏重個人作用的結果，常將歷史視爲英雄凝傑的創造；偏重羣衆作用的結果，則又將歷史視爲一般人羣的活動。其實，兩方的分庭抗禮，殷陣相對，是不必的。我們很可以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話來解釋。當一個人羣生存的情勢發生着變化的時候，這是時勢的醞釀。醞釀將成，一旦要爆發的時會，那便要有組織的行動。他便成爲羣衆的代表，羣衆就承認他是領袖，他是英雄的人物是適應羣衆所需要的，也就是由於時勢所造成的，一個人倘若不參與這種組織的行動，不獨不能成爲時勢所造成的英雄，且亦不能發生任何的力量。但是一個參加了組織的行動，又爲組織的領導人物，那末他個人的行爲，不論感情的，道德的，意志的，或智慧的，轉又可以影響着事態的演變。古今來，人類文化的進步，大抵都是這些英雄的勞績，他們也許是無名的英雄。總之，他們是眞的立了功，立了言，和立了德的。曾國藩曾說過：「天下之風氣，視乎一二人心之所嚮」，便是

這種陳移情勢變化的領導人物行爲的說明。也就如　中山先生所說的：

>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知難行易八章）

所謂天理，人情，潮流，和需要，皆是時勢的含義，亦即是客觀環境的境界。所謂先知先覺，決志行之，就是英雄的活動，亦即是個人主觀的努力。總之，歷史事蹟，社會功業，皆是羣衆的力量與個人的努力合作的結果。但是，個人的言行如果沒有被時勢造成英雄的力量，那他也就不能轉移時勢造成英雄了。換言之，個人的言行起了決定的作用，是以羣衆能夠接受而不反對爲條件的。倘若羣衆的心理不能反應，羣衆的力量不能憑藉，那還是不能夠影響天下風氣的轉移，也就不能成功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的事業，所以就是一個領袖人物的英雄，如果失了天下羣衆組織的擁護，或者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那也是對於時代的前進，沒有什麼偉大的創造和決定的作用。這點，　中山先生自己的革命事實就昭示得很清楚：

> 「文奔走國事，……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的襄贊，乃得推翻專制，創建共和。……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崇尚破壞，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爲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爲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知難行易自序）

中山先生對於英雄與時勢的關係，不獨從其自己革命的經過裏，體驗得很透澈，而且從歷史的事蹟裏，也研究得很清楚：

「說者多稱華盛頓有仁讓之風，所以開國之初，有黃袍之拒；而拿破崙野心勃勃，有鯨吞天下之志，所以起共和而終帝制，而不知一國之趨勢，爲萬衆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勢已成，則斷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轉移者也。夫華拿兩人之於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動者，美之十三州既發難抗英而後，乃延華盛頓出爲之指揮，法則革命起後，乃拔拿破崙於偏裨之間，苟使二人易地而處，想亦皆然。是故革命之異趣，不關乎個人之賢否，而在其全國之習尚也。」（知難行易六章）

個人在歷史的地位上，是可以推進歷史的演化，但是有其條件的。這條件就在他能以代表羣衆的利益，代表羣衆的意見，代表羣衆的時代要求。也正如黑格爾所說，世界史上的個人，時時表現着時代的精神。不過，這一時代精神的意義，不在於理性，而在於羣衆的生存要求。而且當社會發生了問題，歷史上有偉大事業的發生，那一定就是羣衆生存發生了嚴重的問題。所以 中山先生認爲個人的生存問題， 並不是歷史轉變的時期。 一定是羣衆的生存發生了問題，那才是歷史的變動關頭。他說：

「是工業革命之結果，其施福惠於人羣者，爲極少之數，而加痛苦於人羣者，爲極大多數也。所以一經工業革命之後，則社會革命之風潮，因之大作矣。蓋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

能長爲極少數人之犧牲，公理之自然也。」（知難行易一章）

這指出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大多數的工人生存發生了問題。試以中國而言，他也分析的研究了。

弱小民族的貧窮，也形成了時代的羣衆生活問題；一家人沒有飯吃，也很容易解決；一個人沒有飯吃，便容易解決。至於要全國人民都有飯吃，像要中國四萬萬人都是足食，提到這個問題，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決。」（民生主義第三講）

此外，東方

力，反與其自己生存發生利害的操縱，這時他一旦感覺到，那就失了信心，沒有堅強的意志再

當人類發生了羣衆生存的問題，那也不是每一個人可以獨自解決得了的。甚至個人的

奪門下去。中山先生曾就經濟生活的實例說明過：

「洋布便宜過土布，無論是國民怎麼樣的愛國，也不能夠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國民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那便是和個人經濟原則相反，那便行不通。……或者一時爲愛國心所激動，尊可願意犧牲；但是這樣感情衝動，是和經濟原則相反的，決計不能持久。我們要合乎經濟原則可以持久，便要先打破不平等的條約，自己能夠管理海關，可以自由增減稅率，令中國貨和外國貨價錢平等。」（民生主義第四講）

這一理論，可以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對日經濟絕交不能持久，而日本人譏笑中國人祇有五分鐘的熱度之事實，將他印證了。這也就啓示了我們解決羣衆的生存問題，須以組織的集體

力量，才可收效。同時，這也說明了「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都是指集團的社會問題以言，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又須依着大家組織的力量來推動時勢，解決問題。這時勢便成了混亂的局面，這問題也是不得解決的，那祇是一羣烏合之衆的盲動與騷亂。個人的行動，更不能發揮出什麼推進時代，創造歷史的作用了。所以中山先生對於沒有組織力量源泉的個人行動，認爲是很少效果的。他說：

「中國人的人格，祇知道陞官發財，自私自利，甚麼國事都不管，人格是墮落呢？我們要救國，必先要除去他們，要除去他們，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們不可專靠個人去救國，必先要大多數同心協力去做。」（人格救國）

這就指明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在社會裏的功能，必須配合到團體裏面去，一旦參與了團體的組織，那個人的能力道德以及意志和智慧去發揮到能夠代表團體的力量，他便可以轉而決定歷史的演變了。否則，祇一、二三人可爲改革國事之實行家，眞謬誤之甚也。」但事實上，每當歷史上動亂的時代，又必須有一二出類拔萃的英雄豪傑，引天下事爲己任，而後才有新的時代來臨。「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由此可知，這一二個偉大人物，能以在歷史上建立豐功偉業的，必先憑藉羣衆的組織力量，而後根據人類進化的客觀法則，民族文化的心理基礎，配合世界大勢，滿足羣衆要求，適應時代需要，這樣，才能轉

換時勢，發生歷史演變的決定作用。惟這一歷史的演變的意義，凡如衣食住行的方式，典章制度，以及學術文化，都在其內。簡而言之，技術的，組織的，和知識的一切文明的進化，皆是。因此　中山先生認爲歷史的變化是羣衆有組織的力量，而且是三個人合作的組織行動創造的，亦就是時勢造英雄同英雄造時勢配合而成的。試看他怎麼分析合作的：

「夫人羣之進化，……而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覺者，爲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爲做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爲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爲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所謂文明之進化，成於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覺者即發明家，其二後知後覺者即鼓吹家，其三不知不覺者即實行家也。」（知難行易五章）

他對於人類有了這三系的分別，而且認爲每一個偉大的時代演變，每一件人類的文明建樹，都是先有一二人認識之後，以組織力量，發起推行；繼而由少數人贊成倡導，終至大多數人接受實行。由此乃說明了人類的合作在歷史演進過程上的作用。所以他既無黑格爾偏重偉大人物的缺點，也不若馬克斯祇歌頌羣衆力量的缺憾。既因爲歷史的事實，社會的文明是倾和羣衆共同推演出來的，所以人類文化的成果，應由人類全體來享受，而這又是　中山先生革命民權思想的理論根據。革命民權的含義，是不同於自然權利或天賦人權的。天賦人權主張人生而自由。革命民權則主張自由乎等是由生命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財產也有私佔的自由。革命民權則主張自由乎等是由

革命而造成的，不是天生的。尤其關於各人的智力，如果受到社會的不平而遭壓迫，不能自由發展，更應當革命。但這種發展智力的革命，一旦成功，那智力高的人却必須瞭解他在整個社會應有的地位，而不能壓迫人，剝削人，因爲他知道了人類是合作的，那他的服務道德心，才能油然而生，去造福人羣。歷史的事迹常是由小及大，從簡到繁，就是由於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也就是人類生存有了進步，創造了新的文明。這進步表現於社會組織，則爲政治的興革；表現於生產技術，則爲工具的改造。表現於一般文化，則爲思想和制度的演進。人類生活上有了不斷的需要，人類文明便有不斷的創造，那末，就是歷史不斷的進化。如就政治革命而言，一定是羣衆生活上發生了痛苦　痛苦就是不能滿足生命的需要，尤其是物質生活的需要，人類無法解決。這時羣衆便有了革命的要求，也便是之矛盾的表現，到了創造歷史的時會。關於人類生存的進步，是由於滿足生活上的需要而創造的，生活需要除衣食住行的物質資料之外，還有典章制度，宗教技術，以及科學哲學的需要。而且這些需要的由無意中得來，或由有意中得來，但其逐漸進化的，則必有其社會的和技術的程度，在文明進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

，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滿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說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級需要生活之外，更進一步，便是第二級。

這一級叫做安適。人類在這一級的生活，不是爲求生活上的需要，是於需要之外，更求安樂，更求舒服。所以在這一級的生活程度，可以說是安適。再更進一步，便想奢侈。

他分析了生活程度的進化是由於需要而安適，由安適而奢侈。接着就衣食爲例，以印證他的話。

「比方拿穿衣來講：古代時候的衣服所謂是夏葛冬裘，便算了滿足需要。但是到了安適程度，不祇是夏葛冬裘，當求需要，更要適體，穿到很舒服。安適程度達到了之後，於適體之外，還更進一步，又求美術的雅觀。夏葛要得到輕紈幼綃，冬裘要得到海虎貂鼠。這樣，穿衣由需要一進而求安適，由安適再進而求雅觀，便好像是吃飯問題，最初祇求清菜淡飯的由他食便進而求有酒有肉，有肥甘美味，更進而求山珍海味。」（民生主義第四講）

其實，人類衣食之外，即住行方面的物質生活，其進化程度也是經過這樣的歷程。住的方面，由穴居野處，構木爲巢，而茅舍陋室，而高樓大廈。行的方面，由體力步行，而舟車馬轎，而輪船火車，而飛機。這些進化的發展，皆是由需要而安適，而奢侈以來的。不過，這一進化的原因，固然由於心理上慾望之所致，但又怎樣能夠滿足這一慾望的追求呢？實現其目

的呢？這便從推進生產技術的改造和生產方法的變更了。所以物質生活的進化是技術的。這點　中山先生則說得很清楚：

「至於要全國人都有飯吃，像要中國四萬萬人都是足食。提到這個問題，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決。……

「現在我們講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非有很便宜的飯吃；要全國的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吃，那才是解決了民生問題。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究竟是從甚麼地方來研究呢？……

「我們對於農業生產，除了上說之農民解放問題之外，還有七個加增生產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民生主義第三講）

就目前中國農業生產情況而言，如要滿足全國人的吃飯需要，自須從技術方面去研究，去改進。這七個改良生產方法，增加生產數量的辦法，能夠完滿的做到，糧食問題自然的解決了。不獨食料問題的解決，在從機械的工具和科學的方法下手，以求技術的進化，而滿足生存的需要。卽衣料的滿足，也在求生產方法的改良和工具的進步。

「至於講到絲的工業，從前發明的生產和製造方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一成不易，總不知道改良，後來外國學了去，加以近來科學昌明，更用科學方法來改良，所以製出絲，便

總乎中國之上，便侵佔中國蠶絲的工業。我們考究中國絲業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是在乎生產方法的不好。……中國要改良絲業來增加生產，便要一般養蠶家都學外國的科學方法，把蠶種和桑葉都來改良。蠶種桑葉改良之後，更要把紡絲的方法過細考究，把絲質和色澤都分別改良，中國的絲業便可以逐漸進步，才可以和外國絲競爭。」（民生主義第四講）

關於生產方法的含義有二：一指社會勞動的分工合作，二指工具勞動的技術製造，而且這二者都是在動態的情況之中。惟其改進則須知識相合纂爲必備條件。人之異於禽獸而能進化的主要原因，也就在能知與合羣。淮南子修務訓說：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蜚鷹搏肆，蚊行蝡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鬥，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

據此而論，禽獸不如人的，第一是「才力不能相一」。換言之，就是知識既不能因彼此交換而發達，才力又不能以社會的分工合作而統一。可是，人類則不然，才力既能由分工合作而統一，知識又能交換而相通。人類有了這二個特點，不獨可以發揮這二生產方法，增加生產力，以滿足物質生活的需要。就是在生存危險的時候，也可以發揮這二點，以圖改良社會組織，力求進化，達到生存的目的。　中山先生對於中華民族的危機，就是

根據這些認識而予以挽救的，他以民族主義，爲團結組織的原則，而加強政治力的奮鬥，以求中華民族生存的解放。他在民族主義演講裏，這樣的說：

「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我們要想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甚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能知與合羣，便是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民族主義第六講）

其實，他根據這些觀點，也說明了人類生存的發展，和人類　史的演進。

「古時人同獸鬥，只有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在別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這兩個地方的人類，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和猛獸是不同的，於是同類的就互相集合起來，和不同類的去奮鬥，決沒有和不同類的動物集合，共同來食人的，來戕害同類的。當時同類的集合，不約而同去打那些毒蛇猛獸，那種集合是天然的，不是人爲的。」（民權主義第一講）

這就說明了人類之所以能同象蛇猛獸奮鬥而戰勝的，在於人能合羣，以羣體的力量去克服生存的障礙，換言之，亦即人類的才力可以統一的合作。其次，則是知識的力量可以促進人類戰勝環境，得以發展生存了。

「在人同獸爭的時代，……所有的自衛力，只有雙手雙足，不過那個時候，人要比獸聰明些，所以同獸奮鬥，不是專用雙手雙足，還曉得用木根和石頭，故最後的結果，人類戰勝。」（民權主義第一講）

人類之所以能夠戰勝禽獸，馴服禽獸，飼畜禽獸，就在比禽獸聰明些，也就是智力高些，知道利用工具。發明了工具之後，不獨可以增加自衛的能力，而且也增加了生產的力量。試想將禽獸戰勝了，食其肉，寢其皮，那不是也增加了生產嗎？所以在原始人類的時候，武器同生產工具是不可分的。直到而今，生產工具與武器還有很深的相通應用的關係。不過，聰明也是進化的，由其進化，而經驗豐富，而知識發達。知識發達之後，更推動了人類組織的和技術的生活進化。知識的進化，中山先生分爲三個時期：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爲三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爲知而後行之時期。……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眞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眞知識也。」（知難行易五章）

科學知識的進化，又是由於研究學問方法的進步：

「近來大科學家考察萬事萬物，……他們考察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

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人類進化的道理，都是由此兩種學問得來的。

觀察就是使人有稟受於外，從觀察得到經驗，有經驗才能發明，所謂熟能生巧。譬如我國的文字，據傳就是這樣進化而來的。伏羲「仰則觀象於天，附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八卦爲我國象形文字之初軔。觀察既能促進知識，由於知識的發達，轉又促進人類技術文明的進化，社會組織的擴大。伏羲仰俯天地，領悟物理，不但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且「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易經繫辭下第六）這就說明了生產工具的發明和創製，也是有賴明的根基。可是，一旦發明了和創製了新的文化，這文化不論技術的木棍和石頭，或組織的典章制度，那就會彼此交流，成爲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這知識可以互通，而今尤爲顯著的事實。現代一切新知識，任何國人的發明，都會逐漸的成爲全人類的了。所謂學術有國際性的，就是這個道理。然而，這又推進歷史是怎樣的前進呵！　中山先生既根據能知與合羣，說明了歷史的進化，說明了文化的起源。

「古時人同獸鬥，只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殺完了，人類所處的環境較好，所住的地方極適於人類的生存，人羣就住在一處，把馴伏的禽獸養起來，供人類的使用。故人類把毒蛇猛獸殺完了之後，便成畜牧時代，

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在人同獸爭的時代，……人要比獸聰明些，……還曉得用木棍和石頭。……把獸類殺滅淨盡，人類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計算。……人類才逐漸推廣，好地方都被人佔滿了。」（民權主義第一講）

由於才力的統一，以組織的力量，合羣的力量，克服了環境；以知識的相通，利用技術的力量，戰勝了禽獸，剿伏了禽獸。到了這個時代，人類組織生活比較的進於緻密了，文明也開始加速的發達了。因此，歷史進化了。文字發生之後，轉又影響於經驗的積累，知識的進步之後，復又影響於文字的發明和利用爲最重大

是神性。當前則在人性與獸性的過渡階段。

「就人類的來源講，基督教說世界人類是由極單簡的動物，以至於獨獨，更進而成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不至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研做的事情當然是向軌道而行，日日求進步，所謂人爲萬物之靈。……依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進化而入於神聖，是故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纔算是人類進步到了極點。」（人格救國）

這裏，我們要瞭解的，什麼是獸性？什麼是人性？什麼是神性？清楚的明白這些意義，才不致誤解中山先生所說的人性論。現在有些人曲解他的人性論，是以獸性和人性比較而言，並不如傳統所說的善行抑惡行，是以獸性的演變，也不若傳統人性善惡論那樣的先驗說，固定；而且獸性和人性的善惡之分是可以進化的界石。獸性的狀態對於生存的奮鬪方法的，人性的狀態則以互助爲方法的。所以他說：「物種以求生存的奮鬪爲原則，人類以互助爲原則」。至於進化到神性的階段，亦即人類進化的目的，則在於

以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爲極樂之天堂者是也。」（知難行易四章）人類到了剛個人的人格都是進化得很高尚的，而能爲全體人類的幸福去奮鬥，爲實現自己的極高理想去犧牲。當要努力這種崇高的行爲，雖是捐棄了自己的生命也所不惜，那就是爲人羣立功，爲人羣立德，爲人羣立言。實踐這些偉大事業，以求達到人類進化的目的。在這種奮鬥的生活之中，個人生命與崇高理想，就是生命的歸宿。這樣勇敢的去努力，即是不能成功，亦當成仁。眞的做到寧殺身以成仁，不害仁以求生，那自然的表現出人是有幾分超越的，而不同於禽獸，而不同於獸性的人。這樣人格的表現，便是神性的表現，人類進化到神性的時代，那才是世界大同的精神基礎確立了。那時物質的生產，亦將還原爲生存的條件，而不如現在都是誤會着，曲解着，是人類一切生存活動的基礎了，正如人是爲生存而工作，不是爲工作而生存的！

總之，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人類生存奮鬥經過的記載。人類原始時代，其結合是以血統爲中心，而形成羣體的生活。惟生活的表現，就是生命物質的新陳代謝，新陳代謝的結果，便表現了生命的生死現象，而人類一切的活動，則在求生命的發展，生存的進步，生的和諧，所以生命發展的衝動，乃是人類生存奮鬥的動力。爲滿足這一發展的和諧，首在物質資料的消費，因爲：

「無論甚麼動物植物，都是要吃飯的，沒有糧料，便要死亡。」（民生主義第四講）

所以人類要求生存，也須糧料來消費。因爲要滿足這個消費的需要，才與自然環境奮鬥，以覓取食物。從而又與其他動物鬥爭，由於人類結合，日趨嚴密，卒以社會的力量去奮鬥。因爲用社會的羣體力去奮鬥，所以一方生產，一方就須分配。不過，人類的數量是繁殖的，所以尋獲食物的活動，就向各方面發展。譬如，生產技術的發明，改良，和進化，皆由此而推演的，同時，分配的組織形態，也隨之而變化。由於生產的技術和分配的組織交互影響，轉使知識愈益發達和進化。於是，人類生存的進步。知識進化之後，則又促進了技術的和組織的演也構成了一部偉大的人類歷史，過去這樣，現在這樣，將來還是這樣。所以我們說民生史觀的第一個法則，是人類本位的進化觀。

歷史既是人類自身活動爲求生存而進化間斷的求生存。人類能以戰勝自然，克服環來的最高級動物，所謂萬物之靈。靈就是聰明智慧，人有了聰明智慧，才能有語言文字，而語言文字則是知識的基礎，知識又是人類進化的重要因素。所以　中山先生說：「但一切人類（包括科學計劃）爲基礎，（實業計劃）。」如就人類與其他動物比較，其不

同者，則在人類有變遷和進化，有進化。惟人類一切的變遷和進化，則在善於利用經驗，利用知識。經驗與知識之所以足爲人用的，要在有文字，而文字即爲構成歷史的基本因素。因爲「歷史是用文字記載來的，所以人類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後，才有歷史。」（中山先生語）就此而言，可以說人是文字的動物了。人類有了文字，有了歷史，換言之，有了文化，那又影響了人性的演變。這些知識的，技術的，和組織的演變，就全體人類而視，都是進化的，所以中山先生以進化的觀點，說明其各自的發展階段，而充實其民生史觀的內容，完成其民生史觀的法則。

第一就生活程度言：由需要進爲安適，再進而爲奢侈。

第二就生產技術言：由石器進爲銅鐵，再進而爲鋼鐵，而電氣。

第三就分配組織言：由血緣的氏族，進爲新建的部落，再進而爲民族，而人類的世界大同。

第四就智慧知識言：由不知而行，進爲行而後知，再進而爲知而後行。

第五就人的本性言：由獸性進爲人性，再進而爲神性。

人類就根據這些進化，創造了自己的歷史。這些進化的動力則在人類求生存，不間斷的求生存。中山先生說：

>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星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我們現在要解

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中的政治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爲社會歷史的中心。」（民生主義第一講）

總要言之，「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存，所以社會才有進化。」（中山先生語）而歷史才有進化的紀載，以顯示着歷史的進化。然而這一切的進化皆由於人類自身的活動和需要。歸根結底，一言而蔽，就是人類本位的進化觀。這便是民生史觀的第一個法則。

第二法則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誤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我們現要解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爲社會歷史的中心。——中山先生語

第二法則——技術組織和知識——及其主導作用

人類生存的三大要素

根據前面的分析，人類進化的因素，計有五種：一是人類的生活程度，二是生產技術，三是分配組織，四是知識，五是人性。第一個因素是要求生存發展的自然活動。前者是永恆的經常的，後者是變動的演化的。不過，這種變動第五個人性進步的開展。所以我們祇須討論人類生存的這三大要素的關係和其各自的主導作用。關於這些能明瞭，那末就知道歷史進化的動力了。歷史進化的動力，有人以為是分配組織為歷史進化的基礎，且為其分期的標準。這樣雖也承認組織和知識因素的重要，但却僅是次要的，亦即以生產方法為動力而已。也有人以分配組織為歷史進化的主導，而以其進化的事實作為歷史分期的路碑，然此則強調技術與知識為其附庸的關係。此外，又有人以知識的演

變爲歷史進化的動力，非爲其分期的燈塔，而化觀來說明歷史的發展，乃至彼此奚詆，各執進化的基本動力，而爲其萬千現象所迷誤。進結果便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寫實。人類進化的動力在求生存，在求生存，還是要靠技術與組織於其下。甚至近來有人以有機的文發展。所以這些進化的要素都是統一於求生存展而決定。惟人類生的表現，生的基本活動，的活動；因有生產的結果，而有分配的活動。慧的調適關係，遂發生演變。由此演變，積成經驗，構成知識，知識轉又推動着技術與組織的三個生存的要素，彼此息息相通，互相影響，祇以時代不同，故其主導作用，則中山先生則認歷史的進化是由於人類自身求生存的動力，至其各自的主導作用則又在於各自的時代發展。所以這些進化的要素都是統一於求生存人類生的表現，生的基本活動，而有生產生產的結果，而有分配的活動。

備和製造工具了。美國人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說：「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工具與人關係的深切，由此可見。祇要生產工具有了進步，那末，生產方法就有改變。因此，人類社會便有了進步，也就是歷史有了進化。生產方法的不同，便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差異，於是文化也就不同了。那末，歷史的進化與否，便可從這生產方法上斷定了。馬克斯曾特別強調這種意見。他說：

「各樣的經濟時期，彼此的區別，不在於實際上所製的差異，而且是實施勞動的社會關係之指示器。」（資本論一卷三編五章）

據此，工具由於什麼物質製成的，那就形成了某種的生產方法，以此可以分別歷史進化的時期，則有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以及電氣時代。這種物質工具的進化，就是一切社會文化的基礎，且是一切歷史發展的眞正基礎。是卽歷史進化的動力是物質的變遷，尤其是製成了工具。這種物的工具一進化，那末人類勞動歷程，生產方法都改變了，影響所及，整個文明都發生了進化。這種說法，就是世所週知的唯物史觀，經濟史觀，甚或技術史觀。然則　中山先生對此意見怎麼樣呢？他對於生產工具的進步，促成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人類文明發達和歷史的進化，曾就衣食的進化而加以說明。

「植物是人類養生之最要緊的糧食。人類謀生的方法很進步之後，才知道吃植物，中國

是文化很老的國家，所以中國人多是吃植物。至於野蠻人多是吃動物，一種糧食。……原始時代的人類和現代的野蠻人都是在漁獵時代，就獸，捉水陸的動物做食料。後來文明進步到了農業時代，便知道種五穀，便靠植物來養生。物雖然是靠土地來生長，但是更要費許多工夫，經過許多生產方法，才可以得到。」（民生主義第三講）

「民生主義第二講，由於生產方法的進步，已由漁獵時代到農業時代，而今動植物不是都爲人獲得食的資料，由於穿衣也是因生產方法而進化的。

「穿衣是由文明進化而來，文明愈進步，穿衣問題就愈複雜。原始時代的人類所穿的衣服是天衣，……後來人類的文明進化，到了遊牧時代，曉得打魚獵獸，便拿獸皮做衣，……後來人類的文明進化，獸類減少，單用獸皮便不夠衣穿，便要想出別的材料來做衣服，便發明了別種的衣服材料。」（民生主義第四講）

關於穿衣的材料，而今不也是以動物的毛皮革和植物的麻爲主嗎？就此可知人類生活的進化，是由於從勞動發展到工具的。當「洪荒時代，是人和獸相鬥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人類要圖生存，獸類也要圖生存。……人食獸，獸亦食人。」（民權主義第一講）但人卒能戰勝獸類，的，就在知道利用木棍和石頭。亦即發明了技術的生產方法，因爲有了石頭，才能克服獸類，並且剝服了獸皮，而成爲畜牧時代。畜牧時代，人類的食衣資料，皆以獸的肉和皮爲主。這就

是說明了人類由原始的單純氣力的勞動，進化到石器時代，同時就是由原始社會的生產技術呀！且以此戰勝了禽獸。打下了人的天下。到了沒有禽獸的狀態，人類一方可以安全的生活，一方也有了更大的地盤，可以住在好的地方。一旦到了這種境界，人類的進化便又由游牧時代入於農業的階段，更以種植五穀來增加生活的資料了。古代農業文化所以發源於尼羅河及馬斯波他米亞，就因爲那兩個流域，土地肥沃，可以耕種。人類進化到不獨生產工具的進步，卽社會的組織和知識的內容，也都複雜了。試看，古代尼羅河的埃及，和馬斯波他米亞的巴比倫各國，是怎樣結成了人類最顯的文明果實。

埃及人在石器時代，經過長期的奮鬥，才慢慢的走進了農業的階段。農業時代分爲三期：一是曙石器，二是舊石器，三是新石器。人類所拾得的天然石頭，以後才製成如己所欲的石器。將石塊造成適於自己把持的形狀，磨成銳邊，便利割切和挖掘。或修成尖端，便利劈裂樹木和硬殼。進而就尖端的石器，再磨鈍端，以便把握，這樣就成了斧形，而發明了石斧。石斧發明了，那便推動文化一大進步。人所製成的石器，一方用作生產的工具，同時也用作自衛的武器。當由粗製的石器進步到精製的時候，那更表現了人類敏巧的手腦對於文化的貢獻。

粗石器時代都爲曙石器時期。精石器時代利爲舊石器時期。這個時代的特點，有燧石工具的變遷，骨角效用的增加，以及繪圖，縫針，與弓箭

的發明。弓箭爲人類克服動物和自然的更好武器。舊石器之後，便是新石器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人類製成的工具更多，同時也就踏入了農業時代的初期。總之，人類在原始時代，大都依賴漁獵爲生，重要的糧食，則是獸類，魚類，以及可吃的植物根和果實。那時尚不知道家畜和耕種植物，可以用作食物的資料。所以農業時代以前，我們稱爲漁獵時代，以獵取一切野生的動物和魚類，其武器與工具全是石製的，故又稱爲石器時代。當石器進步能夠用之以克服禽獸和魚類，人類的生活便進步了。尤其克服了獸類，馴伏了獸類，到畜牧時代，在這時期，人如遇着好的地方，便定居而成了農業時代的開端。如遇着不好的地方，便須逐水草而居，成了游牧生活，所以畜牧時代有時又稱游牧時代。人類在這悠長的石器時代，生活上技術的發明最重要的，第一是石器的工具，第二是火。工具雖是石製的，可是有了他就可以克服環境，戰勝猛獸。而火不獨可以使人熟食獸肉，且可禦寒。此外，火還可以製造工具，使人便利，且可大放光明，克勝黑暗，益增人類安全的保障，而使之進步。於是，生活安閒了，愛美的心理也就逐漸發達，所以那時也有了藝術的表現。

古代埃及人當進化到克服獸類，入於畜牧時期，憑藉尼羅河的好地方，他們就向農業的文化方面去發展了，不像許多沙漠地帶如亞拉伯地方的人，長期的停滯在游牧的階段。古代埃及文化的發達到農業時代，埃及人發明了技術以促進之，固然有功，而尼羅河尤有功。埃及古代的光榮實爲尼羅河的賜與。尼羅河是非洲一條最長的大河，全長約四千一百哩。其源出於遠自

南方赤道的現名維多利亞湖。自諾湖而下至喀士穆稱白尼羅河。在此會由阿比西尼亞入貫的青尼羅河，復從此至海，始簡稱尼羅河。其間北下二百哩又會合一條最大的支流，發源於阿比西尼亞高地的黑尼羅河。這三條幹河將阿比西尼亞及中非經過熱帶風雨剝蝕的沙土，冲積成爲下游的平原，和埃及的三角洲。水量由此分道，貫入地中海。全部主流計分上下兩游，自諾湖以北爲下游。沿河水流激湍，兩岸皆係石崖，此外，平沙無垠，是以可耕沃土，祇有兩旁各約八哩一帶狹窄邊岸的低地。自海上溯至五百餘哩，全屬埃及境內。埃及自孟非司劃分上下兩部。由阿斯溫至開羅是其本部的一帶狹地，寬約自十哩至三十哩。這一片的肥沃黑土，極利農業，埃及古有倉庫之稱，可知其豐收的盛況。該河每年六月至十月，定期汛濫，利於耕種，雖其氣候乾燥少雨，然亦無害。且其下部，支流四達，水利灌溉，交通方便，是又不僅宜於農業，而亦宜於商業的發達。古代埃及人居住其中，生活優越，時間暇娛，可以從事各種文化的創造。初當每年洪水之際，全部流域，被水淹沒，幾有二三月之久，人民生活，頗遭困厄。後乃利用兩岸的池沼湖澤，以運河疏導洪水，圍地以居。在圈地的低濕處所，捕捉水產，從事農耕，以利生活的發展與安全。又以運河劃區爲界，由此逐漸演成圖騰式的部落生活。原居此地的人民，早即能製優美的工藝用品，凡如火石用具，陶器磚石，皆有發明。後又造船行駛河中，藉此運入牛羊動物，用以載物和耕種，並且發明鑄銅以及便於書寫的有聲符號。凡此都是現代人類冶金術和聲音文字的最早起源。埃及人因爲技藝的經濟生活如此演進，組織生活因而改變，從前

的部落，漸進化到城邦式的生活，成了三國的組織。此時期且發展成了帝國境：東至地中海東岸敍利亞，北至塞普魯斯及克里特諸島，南及蘇丹彭特等地帶。北文化固遠播四方，同時也吸收了別族的文化，兩相交流，益使生活內容達。埃及古代文化最重要者：有文字與文具，曆法與數學，宗教與建築，耕具他金屬的用品和工具，要知這些文化都充分的含着農業文明的因素。

至於馬斯波他米亞也是人類文化發祥最早的地區。這個流域由於蒂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構成的。河水貫注波斯灣，位於亞洲西南，其與地中海東岸一帶沃土相接，形地。兩河流域的三角洲，宜於農耕。惟因北方山地，海南邊草野，故爲游獵與畜牧兩種部落出入之所。比間居民時遭敵人入寇，而有古代民族疆場之稱。蘇美人（Sumerians）爲該地最先的居民，漸習農耕。因平原便利灌溉，從事播種麥類，甚而飼養乳牛，紡紗織布，製造陶器，發明文字，且亦早知用銅。當其進化到各自獨立的城邦生活，受着王侯統治之時，塞密人（Semites）率其部下，自亞拉伯北部來犯，克服草原，統一流域，建立帝國。至紀元前二千三百年，有哈模拉比王出，勵精圖治，造成巴比倫帝國的黃金時代。之後，經過喜泰人（Kassites）亞述帝國及加爾底亞帝國，終而結束於波斯的興起。惟馬斯波他米亞流域，地利優越，農業容易發達，古時亦有倉庫之稱，因而文化頗易發明和創造，祇因種族複雜，所以其文化是混合的產品。除文治以外，尚有武事。那時，帝國四圍，西接沙漠地，文明發

有楔形文字，圖書法典，建築科學，科學如動植物，天文地理，和數學各門，均俱發達。當時亦知製造金銀銅鐵各類的金屬工具和器皿。武事方面：弓箭劍戟之外，並用馬力，製成戰車。用馬以後，信息傳遞，軍隊運送，皆較便捷。對於政治組織的嚴密化，裨益匪淺。車輪和馬蹄，傳播了陸上的商業和藝術。勝利和法律，使得龐大的帝國能以建立和統治。凱喜人貢獻了馬和戰車，亞述人貢獻了密陣和鐵屬武器。這些文化的發展，又將人類向前推進了一步。

埃及尼羅河同馬斯波他米亞兩個流域的文化支配了人類幾千年的生活。這些技術的文化再進一步，重新創造，將人類從農業時代推到工業時代，那是最近二百年的事了。他們的技術文化經過古代的小亞細亞及地中海東部各民族的傳播和交流，而遺傳後世。正因爲小亞細亞和地中海東岸，地區貧瘠，不利農業，轉入商業。其中，呂底亞（Lydia）人應用鑄幣，敍利亞人發展商業，而腓尼基人貢獻獨多。商業依賴交通和移民，水上交通，尤需舟船工具的進化，而腓尼基即以殖民和航海著稱。文字也是商業發達的主要工具之一，腓尼基人根據埃及的文字改成拼音字母，發明音標文字。這種文字幾經演變，一直流傳至今，成爲歐美各國文字的根源。當時其殖民地遠拓四境，本部以悉頓（Sidon），泰爾（Tyre），及巴比羅斯（Byblos）爲主要口岸。非洲北岸的突尼斯和加太基，歐洲南岸的希臘，以及地中海的塞普魯斯和西西里各島，悉皆爲其勢力範圍。西方文化從尼羅河及兩河流域的農業技術之發明和進步，轉到小亞細亞及地中海東岸，因爲地理的因素，便入了商業的技術時代。從腓尼基經愛琴海時期，而入希臘。愛琴

海時代要以克里特島的文化爲主流。該島居民，初於埃及建造金字塔之前，已知應用銅鐵，製造陶器。惟埃及陶器，火藥，與金屬品類的製造，多因克里特島工匠的學習而北移。埃及和馬斯波他米亞爲古代商業文化的發源地，愛琴海則爲古代農業文化的搖籃，且是東方農業文化和商業文化匯合的連鎖。當愛琴海文化極盛之時，埃及希臘兩地商業的往來，克里特島卽爲集散的中心。希臘南端各地土著，由此獲得埃及陶器及各種金屬的工藝品，以改善生活，促進文化，而克里特王國米諾安時代（Minoan Age），以紀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四百年之間的六百載，爲諾蘇（Cnossos）的光榮時期，殖民地遠播，傳入鐵器時代之端。當時，樹匠，寶石匠，藝人，以及各種金屬工匠，而開歐洲鐵器時代之端。當時，樹匠，寶石匠，藝人，以及各種金屬工匠，以製造工具和武器，而有商業。因其商業發達，而又須有商權以保護，所無不俱有。惟克里特島文化因工藝發達，而有商業。因其商業發達，而又須有商權以保護，所以諾蘇時期，海軍之強，雄名一世。島人既用銅錫鐵爲工藝的原料，西方技術卽已進化到銅鐵時代。至此，不論農業的抑商業的文化，就是現了長期的停滯。在這一階段，古代希臘，羅馬帝國，以及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凡此所有文化要皆是心靈的精神的多於技術的物質的貢獻。人類生活的演變也表現着長期的緩慢。直到十八世紀技術才有劃時代的進步，人類文化才表現着劃時代的發展。歐洲近代技術的特別進步，可以說仍是歐洲商業文化膨脹的結果。自十字軍以後，商業有了新的發達，乃需要多量商品，因需要多量商品，乃須要改進生產工具，近代技術的進步，便從此應運而生。在中古末期，商業中心的城市，北方有漢

堡，不萊梅，與盧伯克。南方有威尼斯，熱內亞，米蘭，和佛羅稜司。至於東方，則有喀爾富（Cor-fu），西方有法蘭達斯及不魯日諸城。中部以紐倫堡與奧斯堡兩城爲樞紐。當十三四五的三個世紀，威尼斯商業爲著名的國際市場，操縱商業的霸權，握着東西貿易的牛耳，亞洲物品運往歐洲，概由其轉入，散於四方。歐洲商業因君士但丁堡的衰落，和威尼斯的興起，而由愛琴海轉到了地中海時代。歐洲中古，自市鎮演爲自由的商城，爲着抵禦王侯的刼掠及苛斂，在在須要一種龐大而能合作的組織。各城之內，除工藝行會和同業公會的團體，即自由城彼此之間，亦有結合。歐洲西部各城組成南北二大同盟：一是西北的漢色同盟，以盧伯克爲首府，包辦北歐波羅的海商業。二是東南的倫巴同盟，以米蘭爲首府，包辦意大利的商業。這兩大商業同盟主要任務，固在維護會員城的貿易發展，備有海陸軍實力，保障商旅的安全。惟以會議方式抵抗君王的壓迫亦即其政治作用的發揮。當時東西的商品交換，東方以我國絲織品，磁器，及雜幔等物，印度諸地以香料，珍珠，埃及以棉花布料等項爲主。西方則以魚，酒，及呢織品爲大宗。凡此皆以威尼斯爲集散地。至於商路：西北計有三路：一路經阿爾卑斯山不倫納嶺下萊茵河至北部，或經拿不爾斯取道地中海至西方法蘭達斯各城。二路由漢堡分銷於波羅的海沿岸諸城及英格蘭等地。三路由盧伯克轉至俄國各處。西方商路即往來於現今法國南部，西班牙，及北洲突尼斯諸城之間。東亞主要商路亦有二：一由阿拉伯或地中海東岸經波斯至印度轉來我國。二從黑海經中央亞細亞由天山南北兩路入我國腹地。因貿易興盛，水陸交通，頗稱暢達，商旅往

來，不絕於途。所以十字軍一面擴大地理知識，一面促進商業繁榮。因商城興起，一面深感貨品缺乏，須圖供給相應，一面急求擴大市場，發取原料。適值土耳其人控制東西商路的巴爾幹孔道，於是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蘭英格蘭各國相率從事尋覓新航路，因而發現新大陸。自後，地中海時代一變而至於大西洋時代，商業範圍益加擴大，商品供給愈益迫切，情勢所趨，生產工具，從而改造。工具改造的結果，生活方法為之大變，是即發生了工業革命。查近代工業革命，亦名實業革命，其簡要意義，就是生產方法用機械以代手工。其始於英國，自一七五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這一世紀是其進化的重要階段。英國發明了機器，蒸汽機，和機車，煤鐵用途，隨而增廣。機器發明的歷程，最先是紡織機類，早於一七三三年約翰凱（John Kay）發明一種飛梭；紡織因而一大進步。至一七六五年哈格里甫（James Hargreaves）發明一部八錠的紡機，風靡改造，增至一百紡錠。當一七七八年已有二萬架具有八十紡錠的機器。推此種紡機，仍用手工。一七六九年亞克利特（Arkwright）另發明一種紡機，利用馬力推動，後又改用水力。亞氏即以其發明的紡機，設立工廠，經營工業。世界上以機器工廠而起家的，要以此為首了。一七七九年克朗普頓（Crompton）參酌以上兩種紡機，予以改製，另行發明一種。一七八五年卡德里特（Cartwright）發明自動織機，迭經改造，益臻完善，世隨通用。紡織原料以棉毛為主，因為用棉乃發明軋棉機。此機係美國人惠特納（Whitney）於一七九三年創製。當水力紡織發達之後，則以蒸加推動力，而發明了利用蒸汽。其次是蒸汽鍛類，瓦特因修改紐康門

蒸汽機（Newcomer's Engine）獲得成功。旋與鮑爾頓（Boulton）合作，製造出售。初用之於煤礦抽水，風爐抽氣，繼即用之於推動紗廠的機器，終而用之於刷機等各方面。因機器和引擎的發明，益增煤鐵用途。自此人類技術文明乃入煤鐵時代，開一新的紀元。因此燃料和熔鐵的方法，亦隨之進化。煤鐵時代以前，一切燃料和工具原料，大體皆以木材爲主。自一七八四年寇蒂（Cort）改良熔爐，發明滾壓純質鐵片。一七九四年孟斯萊（Mandsley）發明活導桿（Slide Rest），改進圓筒與活塞。一八〇〇年理查（Richard Trevithick）改良高壓機，蒸汽引擎益加進步。工業革命由紡織機和蒸汽機的發明與改良，生產方法因而改變，生產力大增，商業範圍更加擴大，於是影響交通的改革。當以蒸汽推動機器輪子的成功，旋即用之以推動舟車，是故運輸方法從而革命。最後是交通機類，一八〇〇年發明高壓機的理查，曾造一機車頭。一八〇一年機車運煤之事，已見於世。斯蒂芬生（Stephonsen）據此加以改進，而成蒸汽機車。一八三〇年利物浦到曼却斯德鐵路建設完成，遂開鐵道的新紀元。傅爾頓（Fulton）改良汽艇，製成明輪汽船而試行。自此英美兩國繼續努力，卒於一八三八年因希利斯（Sirius）所造大西洋號汽船橫渡大西洋，以完成汽船的革命。十九世紀中葉，水上交通工具悉已改觀。歐西十八世紀以還，自一七七〇至一七九〇年的二十年間爲機械發明的時期。一七九〇至一八三〇年的四十年間爲應用蒸汽發明的時期。一八三〇年之後爲鐵道汽船擴大市場的開創時期。從此生產技術進化，生產方法因而變換，工業革命的基礎由是奠定。所謂工業時代，其特徵一在

以煤鐵的力量增加生產力，一在以機器爲中心造成工廠制度，三在以工廠爲根源形成都會文化，四在工作動力重心的進化，初由手力，而馬力，而水力，進而蒸汽而油而電力，且今已有原子能時代的希望。動力與工具彼此影響，交互進步，益使技術進化，生產方法轉變。現代生產方法，自工廠制度興起，大家庭崩潰，生產工具脫離了生產者，機器代替了手工，工人失業了，勞動變成了商品。因此社會組織，亦有變遷。階級的分化愈益尖銳，於是人類生活，浩劫頻臨。和平的生產技術之改造，却促進了暴烈的政治革命之發生。從而社會文化，以及其他一切物質的精神的生活，都改觀了。歷史的軌道，載着機器的輪子，向前不息的輾轉。人類的生活便隨着輪子轉動，不管前途是黑暗，抑是光明，一般學者把握着歷史上這一動態，便說生產工具的進步，才是歷史的眞正進化，生產力才是文化進步的眞正基礎。現在基礎變動了，我們來看上層建築的分解和重組吧！

三、農業社會的離析　自工廠制度普遍風行以後，農業社會中心結構的大家庭，也就發生了變化。一切男女紡工，織工，染工，以及木工鐵工和其他工匠，莫不走到工廠去作工。這因爲原生工人的住屋狹小，不能容置一個水輪，一架自動織機，和一座風爐，或一部蒸汽機。所以自紗織機器發明，直接的結果，便是開設工廠。可是一個工廠的機器活動，依然的需要人力來完成物品的製造。這樣，人便從四面八方的家庭裏走出來到了工廠。工廠再也不是社會結構的基礎，再也不是工作的中心了。大家庭的

幸福和痛苦隨着工廠的機聲軋軋，而一齊消逝了。從前隨着紡織車輪匆忙的婦女，都在屋角旁邊等閒着。從前一切鬧聲不斷的手織機，也都靜寂的休息着。家庭之中，年老的人浮現着失望的愁容，青年和兒童離開了清幽的鄉村，到了煩囂的工廠。人類融融和樂的天倫之聚，從此悲離。安寧的第舍引起人們深深的感着深院靜小庭空的淒涼寂寞。工業革命之後，不僅破壞了大家庭制度，同時舊的農業技術，亦因農業機器的發明，而改良了農耕的方法。那末千百萬的農人離開了農場，流入都會，走到工廠。工廠容納不了，就又發生工人的失業現象。至於地主，傲倖的轉爲新的資本家，不幸的淪爲赤貧。這是由於工業發達，引起了土地使用的問題，而以圈地法解決的結果。小地主失去土地，不能適應新制度的演進而消滅。大地主，富商，和製造家，則購買大量田地，使土地集中，而產生了新的領主階級，成爲農業資本家，而與工業資本家合流。

二、政治組織的革命　近代民主政治的狂潮，實由工商業的資產階級而掀起。十七八世紀英美法各國的民主革命，風起雲湧。惟就英國而言，十九世紀初葉，國會實權尚操於大地主及富商之手。中葉以還，始因工業資本家與產業工人共同奮鬥，而逐漸民主化。國會選舉原爲農業資產者所控制，幾經努力，經過十九世紀中葉的奮鬥，直到二十世紀，工業資本家，工人和婦女，才俱獲得實權。至於美法兩國，自十八世紀下半葉先後革命，莫不以新興資產階級和產業工人爲主力，以爭取民主，一則獨立告成，創造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以開民主的先聲。

一則革命暴發，打破傳統封建的勢力，以掃專制的惡習。自十九世紀以後，世界各國民主政治，普遍發展，概皆無一不因受着工業革命的影響，有以使然。民主的革命，不論所採用的那一種組織形式，然其注意於勞工階級的福利問題，則是一個共同的趨勢。一般依賴工資以謀生的勞動者，含辛茹苦的拍賣勞力，甚有不能贍養家庭的，而紡織工廠，通常爲圖工資低廉，管理容易，則多招僱婦女和兒童以工作。婦女童工又與成年男工同樣工作，以致兒童一育不得健全，婦女道德每易墮落。所以保障勞工生活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各國政府亦莫不集中力量以求妥善解決，於是法律改革又爲急務。

三、社會文化的急變

農奴和地主是封建社會結構的兩大柱石。自工廠制度成立之後，農奴化成勞工，大地主換爲資本家，於是完成了資本主義的結構。資本家對於工人，處處不顧共同利益，祇以追求利潤爲能事，人類互助的感情，消盡於機聲之中，一切文化悲憫根源於商業關係而變化。以如政治、宗教，以及家庭和教育的實情，無不浸潤於商業化的精神之中。個人的人格遂從封建的附屬人生掙扎出來，而達到自由獨立。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自由對於大多數人却祇是失業的自由和饑餓的自由。這種痛苦教訓了人類，沒有組織的自由就沒有個人眞正的幸福，而認爲人類應當有合理的組織以保護這可珍貴的自由。現代許多集團的運動，如婦女運動，勞工運動等，都是在那猛烈的發展。工業革命不但變動了人類的思想，而且改換了人類的生活。凡如衣食住行的方式，自機械發明以後，由輪機而蒸汽機，而汽油機，而電動

機。自電學發達以後，由有線電而無線電，而傳真電。於今原子能的時代又將開端。總之，人類一切物質生活的方式，皆因技術文明的進化，日趨於優美和奢華。同時，當工廠制度隨生產技術的進步而變遷，範圍逐漸擴大，組織愈益複雜，影響所及，新興都會，於焉興起。工廠爲便利貿易和運輸，多半設於水陸交通的焦點或礦區之內，四方的農村人民，絡繹不絕的聚集到這工廠，形成了都市。英國許多新興都市，大抵皆由礦區發展而成。惟一般都市家庭的生活，尤其貧苦的家庭，頗不衛生。周遭環境，既無花園設備，室內空氣又不流通。因此傳染疾病和瘟疫，不時發生。家庭和工廠的生活，兩俱煩囂苦悶，於是不論男女老幼，無不嗜好強烈刺激以麻醉痛苦。借酒澆愁，成爲都市生活的普通現象。因醉滋事，罪案迭出。人類精神生活，道德文明，一落千丈，新文化建設的要求，乃爲勢所必然。都市之中，人生痛苦者多，幸福者少。精神的思想和思想的生活，均須待改造。機器輪子不息的轉動，啓示了我們動的宇宙觀，變的人生觀。由於緊張而活潑的觀念，改換了鬆弛而寧靜的態度。動的宇宙觀和變的人生觀，驅使着人類向前追求各自的理想。這理想的至善境，就是社會主義思想的表現。社會主義派別雖多，然其共同所在，則以改造社會，力求人類幸福，使得人類決定禍福的大權，不再操之於機器，而由自己來控制，以享科學文明的利益，不遭受其災難。

歐洲自十八世紀技術進化之後，生活方法改良，生活力發達，影響了整個人類文化的改觀。生產力推動了歷史前進，這一事實，誰又能以否認而去反對呢？這一歷史的軌跡，展長到

中國，也使幾千年的古國，在這很快或慢的物換星移。　中山先生不獨承認這點，並且注重這點，把這點，和要求趕上這點。試看他所說明各國的物質文明極進步，工業很發達，人的生產力忽然增加；着實言之，就是由於發明了機器，世界文明先進的人類，便逐漸不用人力來做工，而用天然力來做工，就是用火力，水力，及電力來代替人的氣力，用金屬的鋼鐵來代替人的筋骨。機器發明之後，用一個人管理一副機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所以機器的生產力和人工的生產力便有大大的分別。在沒有機器以前，一個最勤勞的人，最多不過是做兩三個人的工夫，斷不能做得十個人以上的工夫。……所以這幾十年來機器發明了之後，生產力比較從前就有很大的進步。我們拿眼前可以證明的事實來說一說，比方在廣州市街上所見最多的人，莫如運送的苦力，這種苦力就叫做挑夫。……挑夫中之體魄最強的人，最重祇可以挑二百斤東西，每日不過是走幾十里路遠，這種挑夫是很不容易得的。尋常的挑夫挑了幾十斤重，走了幾十里遠，便覺得很辛苦。如果拿挑夫和運送貨物來比較，是怎樣的情形呢？像廣州貴沙的火車，一架火車頭可以拖廿多架貨車，一架貨車可以載幾百擔重的貨物，一架火車能夠載幾百擔，廿多架車便能夠載着一萬擔。這一萬擔貨物，用一架火車頭去拉，只要一兩個人管理火車頭的機器，或者要幾個人管理貨車，一日便可以走幾百里。……單拿挑夫來及其他種種工作，也是有幾百倍或千倍的大差別。其他耕田織布做房屋以

差別。……再像廣州沒有經過鴉片戰爭以前，是中國獨一的通商口岸，中國各省的貨物，都是先運來廣州，然後再由廣州運去外洋；外國的貨物也是先運到廣州，然後再由廣州運進各省。所以中國各省的進出口貨物，都是經過湖南江面，走南雄，樂昌才到廣州。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南雄樂昌到韶關的這兩條路，在當時沿途的挑夫是很多的，兩旁的茶館店也是很熱鬧的。後來海禁大開，各省的貨物，或是由海航運到廣東，或者是由上海天津直接運送到外洋，都不經過南雄樂昌到韶關的這兩條路；所以由南雄樂昌到韶關兩條路的工人，現在都減少了，從前那兩條路的繁盛，現在都成很荒涼了。到了粵漢鐵路通了火車之後，可以替代人工，由廣州到韶關的挑夫更是絕跡。其他各地各國的情形都是一樣。……這種大變動，外國叫做實業革命。」（民生主義第一講）

這是　中山先生就廣州和粵漢路因受生產力的變遷而說明的社會演變。粵漢路之外，自津浦路通行後，南北動脈的運河不是也漸漸的淤塞了嗎？揚州的繁榮不是也從此冷落了嗎？技術是生產的工具，工具改進，生產力發達，生產方法就發生了變遷，這一變遷已是全國性的了。由此社會改變，文明更換，中國現前正處在這生產方法轉變的過渡階段，所以一切舊的在那裏崩潰，一切新的又在那裏生長，於是表現了社會新陳代謝的矛盾。

工具是生產的技術，同時也是保衛的武器，物質科學的進化，固促進了生產技術的變遷，但也推動了武器的改進……

一就物質一方面的科學講，外國忽乎中國，那是不可諱言的。……譬如兵學就是一種科學，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年以前的外國兵書，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高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鬪艦。……戰鬪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洲以前的戰鬪艦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鬪艦有這樣的大變動，就是陸軍的鎗砲也是日日進步，每一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民權主義第五講）

由於這回第二次世界大戰，人類的武器，更加突飛猛進。姑不論海軍的潛水艇，航空母艦，和戰鬥主力艦，陸軍的水陸坦克，大砲，以及其他各種武器的進步。即以飛機和炸彈一項而言，空軍在上次大戰之中，還是新奇的武器，可是這次却成普通而又居於主要的地位。超級空中堡壘的發明，航程縮短了，戰鬥力加強了。他載運着原子彈，擔致了軸心國家的作戰機構，也摧滅了集權政治的幻想。現代戰爭的勝敗，固然決定於戰鬥意志的強弱，更決定於戰鬪技術的優劣。試想這次戰爭，聯合國倘若沒有美國的民主兵工廠，集權政治的末路，果眞就這樣的嗎？戰爭的結局，或已全非。美國對於戰鬪武器所以能有這大的貢獻，那就在其工業和化學能夠超越各國，比較起來，日德　國還是落後。美國工業革命已由第一步進至第二步：是即已由煤鐵時　到了電氣時期，已由分散的自由競爭階段達到有機的

統一生產。現在將由電氣時期轉到原子能時期，也就是將由力的時代進到樞的時代一樣。現前是電氣的技術時期，而說明歷史進化的階段。

「在太古吃菓實的時候，地廣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覓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漁獵時代，人民就要打魚獵獸，才可以有魚肉吃，才可以生活，就是做工才有飯吃。到了遊牧時代，人類要從事畜牧才可以生活。當時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時常遷徙，所有的工作便是很辛苦的勤勞。至於農業時代，人類要樹藝五穀才可以生活。彼時人類的生活更是複雜，所有的工作更是辛苦勤勞。到了工商時代，遇事都是用機器，不用人力。」（民生主義第一講）

據此，是以生產方法的進化，將歷史劃爲漁獵、遊牧、農業、和工商業四個時期。他認爲人類的生產方法，除了吃菓實的採集時代之外，是由漁獵而遊牧，而農業，而工業，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工作方法，至於由農業進化到工業，其關鍵就在發明了機器應用機器做工具，從事生產的活動。當原始的漁獵時代所用的工具是一根和石器。之後，定居於氣候水利優越的環境之中，發明了應用金屬的銅和鐵，改造了工具，逐漸的進化到農業時代，經過長期的停滯，直到十八世紀，應用了物理知識改造了工具，創製機器，猛大了煤鐵的用途。又以化學知識發明了鋼的應用，製造鋼的機器，於是人類生產力突然增加，生產力進化，乃促進現代工業文明的成

生。總之，以技術觀點劃分歷史進化的階段，除太古採積時代之外，第一是漁獵時代，第二是遊牧或畜牧時代，第三是農業時代，第四是工業時代。其工具由石器而銅器，而煤鐵，而電氣。工業時代以前，工具的運用以手工勞動爲生產活動的中心動力。工業革命以後，運用工具則以機器活動爲中心。工具改變了人類的文明，劃分了史期，誰不承認呢？

總而言之，人類由於消費的需要，而有生產的活動。因此發明和製造了勞動的和工具的技術，以改進生產方法，增加生產力，擴大生產量，而求生活上的滿足。這生產工具聯結着人（勞動）與物（勞動對象），而構成了生產方法的體系，這體系就是生產關係。至於生產力即在這三種因素結合的關係之中，通過生產歷程製出的總生產量。工具技術的生產關係，現今發展成了經濟的活動，屬於經濟學研究的範圍了，所以唯物史觀又稱經濟史觀。

人類生存奮鬥的活動，除了利用技術的工具，此外，還有合羣的組織，由組織而構成社會。組織的發達，也可以改變生產方法，增加生產力，使得生存順利的發展。組織如果不進步，反之，也可使得人類生存不能發展，甚至滅亡。所以有些人看到這點，便以此爲人類進步的基本動力，最後原因，組織於人類生存的關係，在我國傳統的思想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先秦諸子，皆曾論列過。惟後以淮南子主術訓所言，比較周詳而有系統。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

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

這就說明了以組織的力量，加強生產的指導，以滿足人民生活的資料。當時雖以人君爲主導，然人君不過是代表着政治組織的象徵。祇要政治能以盡其功用，那人民生活的需要，自然的可以不致缺乏了。所以組織的力量對於人類生存的發展，有極重要的關係。古代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曾說：「人是政治的動物」，這也認爲組織生活是很重要而必須的。至於近代特別強調組織與人類歷史進化的關係，要推德人黑格爾了。他以國家爲理性具體的表現形態是歷史進化的象徵，而進化的目的在於絕對自由的追求，於是將歷史哲學同國家哲學打成一片了。這在理論上固有玄虛之嫌，然在事實上，這理性的自由即是組織的規範，因爲國家就是人類組織的形態。人類組織的核心問題，在於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彼此之間的聯繫關係。這關係構成了社會和國家，其聯繫的根基，唯物史觀者誤認只是生產方法。其實不然，同時，這根基也是權屬。個人和團體各自的聯繫關係之所以發生，如以政治觀點而言，就是人民與國家的組織關係，當一個人羣組織鬆弛的時候，威脅着全體的生存，那自然的就要強調組織的力量，以組織的力量來保衛生命和養育生命。因爲要加強組織的力量，所以必須有推行組織活動的力量，發揮組織功能的力量，人人都接受這種力量，那就是權的存在了。黑格爾洞悉了這點，把握到這點，乃強調國家是先驗的最高的整體。個人對於國家的關係只是份子對於全

體。至於個人與個人所構成的社會，也祇是國家與個人的中介。於是以國家爲最高，而統攝着一切的社會機構，不論其機構是階級性的抑社會性的集團，要皆屬於國家之下，而使政府有統一，以統一的組織力量以爲求生存的憑藉。關於人類以組織的力量，來從事生產活動，作爲生命之資，而維持人類的生存之外，還可以組織的力量，來從事安全活動，作保衛生命之謀，而維持人類的生存。中山先生對於此點，不但是同意，甚且特別強調。他固曾以合羣的組織力量，說明了人類生存的進化。他曾主張以合羣的組織力量，來改善人類生存的現狀。我們中華民族現在處於人口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文化的種種壓迫之下，換言之，就是整個生存的活動，都遭受着壓迫，甚至壓迫到不能生存。所以他說：

「我們四萬萬人有了民族的大團體，要抵抗外國人，積極上自然有辦法。現在所以沒有辦法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團體，有了團體去抵抗外國人，不是難事。……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甚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便有辦法，無論對付那一國，都可以抵抗。」（民族主義第五講）

祇要我們能將四萬萬人嚴密的組織起來，發揮政治的鬬爭力量，那中國還是能夠生存的。

八年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所以能夠最後勝利，就在能以舉國一致的組織力量，擊退了唯武器論者的失敗主義，降服了媚外求榮者的機會主

賴，而終於推翻了中華民族生存的一重壓迫。組織是人類求生存的方法，是人類求生存的力量，誰不承認呢？求生存既須組織，而組織的核心問題，就是個人與羣體的聯繫關係。所以爲使其聯繫嚴密，能有力量以發揮組織的功用，那就是權的發生和其運用。因此 中山先生對於權力便下了一個界說：

「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羣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民族主義第一講）

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以合羣的力量去奮鬪。奮鬪的具體活動，固在養，同時也在保。換言之，因須養而有生產的合羣組織，因須保而有自衛的合羣組織。這些組織又都須權來發揮作用的，所以社會和國家的組織關係，其基礎是在於權。合羣的奮鬪，在原始時代尚可以烏合之衆去同野獸奮鬪，可是，自進化到同天然環境去奮鬪，那就須要組織的強化了，至於演成到人與人爭，更須有堅強的組織力量了。否則，祇以烏合的羣衆力量，便不會戰勝敵人。這時勢須組織嚴密，行動一體，而有強制的行使命令和制服羣倫的力量以發揮權的作用。權的作用是什麼呢？ 中山光生對此亦有明確的解釋。

「環觀近世，追溯往古，權的作用，簡單的說，就是要來維持人類的生存。」（民權主義第一講）

於此可知，命令之能以使行得通，羣倫之能以制服得着，那就在這種權的力量是用來推進生產活動以養人，領導作戰行動以衛人的。人類養和保兩種生存的奮鬪，既已進化到須要組織

的力量來維持，那便發生了權。組織的權力就是政治的力量，也就是政權。人類組織的社會關係的進化，其動力就在權的演變，就在政權運用者和其運用方式的變遷，就是社會關係進化的指示器。我們瞭解這點，那便懂得技術工具的進化，只能改進生產方法，轉換生產關係，變更社會的形態，但不能決定社會關係的本質。這是　中山先生對於人類社會進化獨到的研究。試看他怎樣以維持人類生存的權力發展，而說明社會的進化和政治的變遷。

「人類由初生以至現在，天天都是在奮鬪之中。人類奮鬪，可分作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太古洪荒沒有歷史以前的時期。那個時期的長短，現在雖然不知道，但是近來地質學家由石層研究起來，考查得有人類的遺跡，不過是兩百萬年。……人類初生以後到距今二十萬年以前，人和禽獸沒有甚麼大分別，……人類雖物由二十萬年以來，逐漸進化，才成今日世界。現在是甚麼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民權主義第一講）

可是，在的民權世界，是怎樣進化而來的呢？他接着就說明了民權由君權而來，君權由神權進化而來的。

「民權之萌芽，雖在二千年以前的希臘羅馬時代，但是確立不搖，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權時代，君權之前便是神權時代，而神權之前，便是洪荒時代，是人和獸相關的時代。……但是那時的奮鬪，不能結合得大團體，所謂各自為戰。

……因爲當時民權沒有發生，人類去打那些毒蛇猛獸，各人都是各用氣力，不是用權力。所以在那個時候，人同獸爭，是用氣力時代。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類殺完了，……到了那個時代，人類生活的情形，便發生了一個大變動。所以人同獸鬬終止，便是文化初生，這個時代可以叫做太古時代。到了那個時代，人又同獸爭，甚麼東西去奪鬬呢？是用的是氣力，大家同心協力，殺完毒蛇猛獸

求雨以種種爭，簡言之，就是爲着生命的養育。這些活動，許諾於神力，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爲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君權漸盛。……君主專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既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民權主義第一講）

由神權到君權，由君權到民權，這一社會發展和政治進化的動力，就在人類的求生存。人

……人同獸爭以後，便發生神權。由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有天災，要和天爭，便發生神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爲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君權漸盛。……君主專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既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民權主義第一講）

由神權到君權，由君權到民權，這一社會發展和政治進化的動力，就在人類的求生存。人

求雨以種種爭，簡言之，就是爲着生命的養育。這些活動，許諾於神力，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爲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君權漸盛。……君主專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既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民權主義第一講）

由神權到君權，由君權到民權，這一社會發展和政治進化的動力，就在人類的求生存。人

求雨以種種爭，簡言之，就是爲着生命的養育。這些活動，許諾於神力，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爲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君權漸盛。……君主專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既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民權主義第一講）

由神權到君權，由君權到民權，這一社會發展和政治進化的動力，就在人類的求生存。人

求雨以種種爭，簡言之，就是爲着生命的養育。這些活動，許諾於神力，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爲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君權漸盛。……君主專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既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民權主義第一講）

由神權到君權，由君權到民權，這一社會發展和政治進化的動力，就在人類的求生存。人

類爲着同天爭，以神權加強團結，爲着人同人爭，以君權嚴密組織。進且以自己的權力改善組織，益使社會進化，而到了民權。爲什麼人類不斷的互相爭權呢？正因爲權是力量，這力量是用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在原始時代，人類各自用氣力同獸爭，這是以氣力保衛生命和取得生活資料，沒有組織，所以社會是很鬆弛的。後來，人類奮鬥的對象，不是獸，而是天然的環境，遭到水火風雷的天災。這天災威脅着生命的安全，破壞了生產的物資，猶如農作物的受害，和畜獸的疫癘等等。爲要同這種種的天災奮鬥，就必須以團結的組織力量。其初是以神來代表這組織力量的運用，以求生命得以保全，生活得着資料，所以發生了神權。繼而，人類生存奮鬥的對象，不能以神權來決勝敗，乃又轉爲君權。至君權時代，便是人自己成了奮鬥的對象。換言之，獸爲人類生存的障礙時，人與獸爭。天災爲人類生存的障礙時，人與天爭。代表天的神權爲人類生存障礙的時候，人與神權爭。至於君權發生而爲人民生存障礙的時候，人與君爭。現在資本家代替君主而爲人民生存障礙的時候，人與資本家爭。所以民權時代的前期是同君爭，後期是同資本家爭。各時代鬥爭的對象雖不同，由獸而天，由天而人，人與人爭，由君主而資本家；然其爭權的目的則一，就是在保衛自己的生命和取得自己的生活資料。所以要瞭解社會進化的重心，就須研究權的發展。

「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我們可以用時代來分析。再概括的說一說：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

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人民同皇帝相爭。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了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民權主義第一講）

因爲權是組織的力量，祇要組織可以維持大家各自的生存，那末，權力運用者的方式，無關大要的。但是，到了這權力不能維持人民的生存，那他就要轉變了，所以中山先生說：

「根本上討論起來，都是用來管理政治，爲衆人辦事的，不過，政治上各時代的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民權主義第一講）

依此可知，權的本質，是用來管理政治，爲衆人辦事的「力量。至於權的表象是以各時代的不同，可以變更其運用的方式。權既是爲衆人辦事的一種力量，那末，這種力量替人民辦些什麼事呢？簡括的說，就是替人民辦理養育生命和保衛生命的生存大事。從前在洪荒時代，各人的生存大事，是各以自己的氣力去奮鬥。在神權時代，各人的生存大事，則要各以自己的權力去賣，亦即以代表神權的酋長和君主以權力去奮鬥。現在各人的生存大事，是別人去負責，亦即以代表神權的酋長和君主以權力去奮鬥。現在各人的生存大事，則要各以自己的權力來奮鬥，所以是民權時代了。換言之，個人生命的養育和保衛，在烏合的社會時代是以氣力來維持的，到了有組織的社會時代則以權力來維持了。權力分神權，君權，和民權三個時代，這個民權時代正由少數資產者的民主向着全民政治發展。現代所以發生民權政治的，正因爲人類生存的社會組織，由於生產技術的發達，擴大了他的形態，所以必須以組織的權力來規範着他，

使社會關係與生產關係不再發生矛盾，以免人類生存的痛苦，而自己操握着辦理衆人之事的權力。人類當用氣力去奮鬥以獲得食物的時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始共產社會。自社會組織嚴密以後，人用權力去奮鬥以求獲得食物的時候，便有權屬的限制。權屬限制的流弊，則是盡其所能者未必取其所需，相反的，則有未盡所能者而取其所需，換言之，以權屬的關係決定社會組織的本質，而發生了私有財產。由此，我們可知生產方法或生產力的進化，只是推動着社會形式的發展，只能決定社會形式的演變。權屬的演化才是決定社會關係的本質，才是推動社會本質的進化。這就是社會關係的決定力在於權屬者的運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始共產社會，這時合羣的聯繫要素是血統形成的組織，其形態是氏族社會；由酋長象徵着神權。初期氏族社會的本質是共有財產，此後，逐漸演化，人口與食糧，不能相需相成，且又陷於天然的災害之中，須與天爭。於是發生了財產的私有。財產自有了私有權，亦即形成了人剝削人的私有社會關係。這時，也就是人與人爭的開端，其中經過神權階段，益使私有的社會關係深度化。且因人羣與人羣鬥爭的結果，勝者爲主，敗者爲奴，從而階級性的社會，逐漸完成。所以在原始共產社會消滅和私有財產初生之際，而有一個奴隸社會的階段，爲之過渡。這時，奴隸的人也變成了財產和工具，而爲構成階級社會的基石了。自階級社會成立，其社會關係的本質便是私有財產，而君權亦由酋長所代表的神權轉化以成。這時合羣的聯繫要素是土地。土地的佔領和宗姓的分封，於是形成了部落種族的封建社會，其組織形態是封建社會，以君主爲

權力的運用者。封建社會的本質，仍是私有財產。君權時代，人類組織的力量，所以又成了半神權的君權，所謂奉天承運的天子，萬世一統的天皇，以及神授君權的皇帝，皆是這種時代的象徵。自是愈益加強了私有財產的社會關係，亦即社會的成員，並不能各依自己所需，得到了生活上的物質資料。因此，權的作用，已不能維持各個人的生命發展。這便說明了社會的形式固是擴大了，然社會關係，却是私小了。至於工業革命之後，益加擴大了社會的聯繫要素，而其合羣的擴大，雖擴大了社會組織的形式，但却未能轉變社會關係。所以由農業的封建社會過到工業的資本主義社會，就社會的本質說還是私有制度。其形態雖然是民主社會，而是生產方法的但却是少數資產階級的民權時代。當由君權轉到民權時代之際，因爲私有財產愈益確定，而暴露了私有權屬的流弊，才有推翻君權，發生民權運動的革命。這一運動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眞義，固在取消君侯的特權，使得每個人都可享受到政權，以保衛和養育自己的生命。其實，是即各人收回自己生存力量，還力量原始時代是氣力，自後是權力。當十七八世紀，民主革命初期的時代，如洛克，盧騷一輩大思想家所提倡的自然權利或天賦人權，其要義即在說明各人可以收回自己所付出的權利。這不啻就說明了權力的演進是由於個人與社會的組織關係嚴密之後而發生的。但　中山先生則認爲是革命民權，以革命民權說來利正自然權利或天賦人權說，蓋自權力發生之後、個人已非如原始共產社會的一員，純爲社會的自然

人，而已受了社會的權力所支配。且這權力又如社會契約說一派思想家所虛擬的那樣各憑意志自由而構成的社會關係，可以離合自如的。祇用原在維持人類的生存，所以中國傳統的思想，認爲君必須行仁政？仁政就是人制人，人壓民的共存。可是，自權力發生了私關的流弊，君權已是暴政的標誌。暴政不論用和平抑武力的方式去迫人的政治。那末對於這強制性的暴政權力，和平等的享受到自己生命的活動，由的機會去參加生產和保衛自己生命的活動，權是由革命而來的，所以稱爲革命民權。因爲失去了工作的自由和享受的平等。換言之，人和發展生命。不過，當以革命方式去爭民權，封建勢力的王侯特權，即沒有改革權的私有之依然一無所獲。其結果，十七八世紀的民主革命只是私有財產者同私有者推倒君權的時期，一般領導人物，只注意到取消流弊，所以自己的權力，固然獲得了，但無產者農業進化到工業，雖然由於生產方法的進化；而是社會關係依舊是私有財產。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就其形式面說，固然進步多多；就其生產關係而說，仍是一脈相傳，而爲私有權的。這個得勢的私有者更利用其政權，推動生產發展，加速的改換生產關係。同時，也加強了私有財產的社會關係。所以工業革命的發展，只是

擴大了和改換了社會形式，却沒有轉變了社會關係。因此，民權運動，依然的還須繼續的發展。這因爲今而後，每一個人都須能夠自己運用生存的權力。以此權力保衞着自己的生命，使得自己得以自由而平等的快樂生存着，和諧的發展着。中山先生既獨具慧眼，看到人類組織的社會根源和其進化的重心在於權力，因而他說：

「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都是終歸失敗。」（民權主義第一講）

現代人類組織的社會關係，既已到了民權時代。不過，這只是民權時代的初期，將由現在階級性的民主，發展到無階級性的民主。換句話說，就是到了個個人都要有保衞和養育自己生存權力的時候，而不像以往將這種權力交托在神或君的手中。但是，這只是要改變社會關係的本質，却非連社會組織的形態都要去廢棄。相反的，人類的社會仍須要組織得更緊密，更完美。所以民權運動的方向，現在有三大幹流：一就各國內部而言，要由階級性的民主，發展到無階級的民主，而達到國內的全民政治之境界。二就國際而言，要由一個或幾個民族國家的民主，達到全世界各民族國家一律的民主，以實現國際的全民政治。由於這種權力的進化，而轉變了人類的社會關係，帶以達到世界大同，成爲了天下爲公」的新共產時代。因此，中山先生的政治理論，只是要去建設一個完美的中華民國，和一個安寧的世界大同的聯合國，却非徒是破壞國家，擾亂世界。他只是要以各個人的權力去保衞自己安全，世界和平，却非利用獨裁的集

團權力，以控制人類，威脅和平。這種民權的政治，是根據他自己發明的權能原理和服務道德兩個原則來完成其建設的。他對於國家的重視，是因其爲人類應有的組織形態，是決定社會關係本質的重心？是運用權力的機構和方式。至於社會關係與組織形態，亦卽社會關係不一定隨組織形態的演變而演變。人類自從原始的共產社會，轉變到階級社會以後，組織形態雖也逐漸的由簡單而完密，由無階級性的和私產的組織形態，變到有階級性的和私產的組織形態裏，也是各有不同的。在氏族社會時代，其初社會關係是共產的，後期則漸入私產的階段。這時，雖可具有國家的名義，但其組織却很簡單。所謂統治者僅不過是一個英勇善戰的酋長，和一些元老，以及安全宗教事務的祭司而已。所有的統治權完全在酋長一人之手，而其責任便在保衛本族的生命安全，尋取本族的生活資料。自後進到部落種族時代，社會關係則已確定是私有的。這時，國家的機構就複雜多多。政事分化，官吏增加，有管財政的官，有掌百工的官，以及主持戶口和兵馬的專官。統治權不世屬於君主，也屬於王室，而成爲封建的君主形態。由種族，那組織形態的國家，就更加嚴密和繁複了。其中有操立法權的國會，司理法律的法院，和行使政權的內閣，內閣分部，如教育，內政，外交，以及勞工，衞生，和殖民等部，幾有多到十個以上的，甚至如中國還有考試和監察的獨立機構。國體有君主立憲，民主共和，同階級專政。政體有內閣制，總統制，和委員制。這些都是民主的組織形態。不論君權的封建社會，抑民權的

資本主義社會，要之，其社會關係川皆是私有權的。相反的，今後人類文化進步，生活方式繁複，其社會關係，却依然須要一種更複雜而龐大的機關。由此可見，社會關係與組織形態是沒有必然的相關性。換言之，轉變社會關係的本質，只在消除國家階級性的流用者之移換，而不在組織形態的更廢。直實而言，只在消除國家階級性，廢除私有權，實行新的共產制度。現在人類組織的社會關係，必須由私有財產制轉變爲新共產制度，已是世人所追求的目的。所以民權潮流，是一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要發達。」中山先生這一指示，是非常正確的。

我們要知道世界主義是從甚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必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不能發達。由此便知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民族主義第四講）

他這個主張，不僅是承受我國傳統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和鑒於人類組織範圍的擴大是根據於人生活的地理基礎，而且是由於權力進化的必然結果。以此而言，不論任何以階級立場而

求世界主義的實現，都是緣木求魚的。人類是由部落而區域，由區域而天然疆界，而擴大到整個的全球。誰要忽略了這個地理因素對於人類社會組織的關係，而圖世界主義的成功，誰就自然的遭到失敗。同時，人類組織的權力，其運用方式的發展，也是隨着組織範圍的擴大而表現的。部落時代的組織力量是神權，區域時代的組織力量是君權。到了天然疆界時代，那就是國權了。爲甚麼叫國權呢？因爲君權之後，是民權。人民將其權力發揮組織的力量，而一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叫做國權。（此即普通所謂的國家主權或中央政府的權。因爲一般人沒有將這組織的權力研究得清楚，對於那同國家一樣大的權力之特質，總認爲是具有最高性的，不可分性的，以及不可讓性的。因此從前對於國際聯盟的成立，根據反造成了許多糾紛，各說紛紜，莫衷一是。即今對於世界聯合國的成立，根據這些權力的特性觀念，誰都不願破壞了各自國家的主權，因而世界的統一，便有了暗礁。權力的性質是組織的力量。所以權的運用，可以就其組織範圍的大小，和事務體系的鉅細而分別。

一、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集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建國大綱十七）

據此以推，世界聯合國的建立，其與各國主權的關係，亦可就事務性質和地域性質的分別而規定。即凡事務有全世界一致之性質者，劃歸聯合國；有因國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各國。不

要再以國家主權的爲觀念，固礙着世界國家的大同，利的擴大和權力的進化，以及根據中國歷史進化的經驗，其實現誠有莫大的希望與可能。中國現在所謂的省或地方，在非秋戰國時代，都是彼此獨立的國。將來世界聯合國果眞以權力的新觀念而完成，後之視今，猶如今之視昔，但此還非以階級立場，忽視民族國家之價值者，所可完成世界主義的實現。

人類爲求生命的養育和保衛，進化到有組織的活動。推動組織力量以維持人類生存，那就發生了權的作用。因爲權的運用和機的演變，而決定了社會關係，規範着組織的形態。組織形態則爲部落種族的封建社會，而爲君權時能在民族時期，權力即已發生，亦即由氣力進化到神權。其時，已是晚期的共產社會關係。自私有財產發生，形成私有財產的社會關係，其組織形態則爲部落種族的封建社會，而爲君權時期。由部落種族進化到民族，亦即由封建社會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權的演變和運用，也從君權進到民權時期了。所以 中山先生說：

「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爲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但是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民權主義第二講）

民就是「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衆人」，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民權」就是人民的政

治力量」。換言之，人類的社會，現在到了人民自己以組織的力量來保衛生命的安全　和獲得生活的資料了。這一個演變，就是權的進化，也是　中山先生對於社會關係和國家政治的偉大貢獻。以權力的進化來劃分人類組織生活的時期，計有四個階段：是卽氣力，神權，君權，和民權。大體說來，氣力時期是原始的共產社會。此外，神權時期是晚期的氏族社會，君權時期是封建社會。至於民權時期又可分作二個階段，其初期是資本主義社會，這些時期，都是私有的社會關係。其後期方始進化到新共產社會關係，是卽民生主義社會，或世界大同。其實，當人類沒有以工具尋求獲得食物的時候，是用氣力作工具的。由氣力進入於組織的權力。權力加強組織作用，發揮組織功能，也能夠獲得食物，和保衛生命。所以組織也是人類求生存的一種工具。　中山先生一則說「民族主義便是人類求生存的工具，」再則說組織的機器」。這因爲民族主義就是造成國家行政機器的機構是「行政機器。這因爲民族主義就是造成國家行政機器的原則，爲中華民族求生存的工具。且將以此通而達到以完成世界主義的行政機器，爲全世界人類求生存的工具。

總之，人類由於生存的奮鬥，而發生了合羣的組織，作爲滿足自己生活上需要的工具。這合羣的社會關係。所以社會關係則以生產物的權爲重心，是人與人之間分配生產物的聯繫。這種以分配權爲所聯繫的社會關係，是人類的組織活動範圍，而今發展成爲政治學的研究範疇了。所以政治學是研究權力運用的關係，非必如現今以研究國家爲主題的。

關於人類進化的基本動力，歷史發展的最後原因，就以前的研究，已有兩種說明，一是注重物質的觀點，說是在於工具，在於生產方法，總之即是以技術爲進化的動力。二是注重社會的觀點，說是在於國家，在於政權運用，總之，即是以組織爲進化的動力。此外，尚有以知識爲進化的動力。此派認爲人類生活的變遷，歷史的進化，其重心在於知識。倘若沒有了知識，那人類祇是黑漆一團，過去這樣，現在這樣，將來還是這樣。但人類一時代一時代的不同，前途一步一步的光明，就是知識的力量，在那裏推動着人類向文明大道前進。所謂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就是知識的鎖鑰。換言之，人就是知識的動物。人之異於禽獸最大的原因，就在能發展的變遷，記載這變遷的經過，就是歷史。是以歷史進化的基本動力是知識。歷史哲學則在深究這些變遷的原因和規則。亦即研究知識的發展，和其對於歷史進化的影響，使得人類生活的變遷，是知識的觀念。觀念一發生變遷，其他的一切情況，也就隨之而變遷了，那末，歷史也就全變了。由此，我們研究歷史的演進，祇在去追尋人類知識的發展，和其進化的過程。

當知識一種外在的事物有了大的變動，那歷史的時期，也就從而劃分了。以知識爲歷史進化的

重心，法人岳爾羅（M. Theodore Jouffroy, 1796—1842）即主此說。他認爲不論在個人，社會，或人類之中，均有二種知識的傾向，一是自然的，二是思想的。前者規範着普通的知識。哲學的思想傾向，比較普通的，當然是進步的。這兩種傾向的發展，速率不同，所以人類就有了進步與落後的差異。這兩種傾向聯合於觀念的發生和統系化，以及觀念轉化成法律，制度，和風俗，而造成人類的一切事件。所以衝動的行爲祇是各民族史的表面事象，各民族史的眞正基礎，則在於觀念。這就說明了歷史上任何事件都是知識發展的結果。總而言之，依岳爾羅的意思，人類事物的變遷，即在於人類知識的觀念之流動。這種變遷性的流動，就造成了歷史的進化。所以全部的歷史，就是觀念發展史。他根據這個觀點來分別野蠻與文明的民族之差異，就在其對於關係人類的重大問題的觀念不同。一個祇有粗疏而含糊的觀念，一個則有完備而合理的宗教。從而，宗教如各有不同，那民族也各有不同了。人類的進步與落後，民族的野蠻抑文明，這觀念就是指示器。知識的觀念同技術和組織一樣的可做歷史的指標。

以知識爲歷史進化的重心，這一研究，歐洲在十九世紀，頗爲發達。其中要以法人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貢獻獨大。其學說較有體系而周詳。氏分知識的進化爲三個階段，即神學，玄學，和科學。惟欲知其學說成立的背景，則須瞭解其生活時代的環境。孔德生於一七九八年，適值十八世紀末年，而爲法國大革命之後，一生經歷了許多革命的重要階

段，身處新舊潮流激盪之中，深深的體驗到一個新社會的秩序建立，不是一蹴而成，必須由於逐漸的發展，始可完成。這個新社會的發展，必備一個爲共同目的而合作的基本條件。這一合作便是思想與感情的共同形式。社會組織與文化的全部狀態，是息息相關的，亦即社會制度與知識發展有其密切的聯繫。這聯繫便表現在科學，藝術，與實業之中。根據這一觀點，孔德分析文化發展的階段，計有三個：一是神學的宗教，二是形而上的玄學，三是實證的科學，而社會發展的某一程度則與其相應而符合。他既將人類的知識發展，分爲三個時期，而每一期都有其特殊的科學可尋。其初是最抽象的科學，繼而是具體的科學，最後第三階段則是社會學。第一階段是神學的；此際祇以少數有限的觀察爲其基礎，且以想像爲主，解釋自然現象和聯繫既成事實，均藉神或精神爲中介觀念，始能瞭解世界與自己的關係。人類知識的發展，就由此開始。神的觀念對於實際生活影響，甚爲重要，而爲道德的社會的生活之堅固基礎。在此階段，就是權威的發展，人類生活於共同堅信而不變的權勢之中。同時，權威在政治方面，就成了君主制度的基礎。這時是以武力主義爲服從法律和紀律爲政治組織的必要條件，而戰爭也是社會發展初期的必要條件，因戰爭便發生了奴隸，由而武士可以不自做工。在神學的階段，其初爲拜物教，這時，人類精神生活是貢獻於自然物。次爲多神教，這時物體被排斥於直接的一切行動和變化的根源，皆別有存在的主宰。這些存在的主宰，則是不可見的，是形成高級的世界之過渡，而到一神教了。最後爲一神教，由此即渡到第二階段的玄學。在玄學的時期，對

於宇宙間事物的解釋，是以抽象的觀念，原理，和力量爲主。

這些力則分爲幾組，例如：化學的力，和生命的力學等，最後歸結於一個自然力，猶如神學階段而歸結到一種教者然。玄學與神學唯一不同的，就在以具體代抽象，以實，玄學時期也是一個過渡的階段，推論精神浸潤於神學範圍的觀念，表現其分解的程序，所以更削弱既存的印象，和影響於統治自然與人生之權力的威勢。玄學時期，在政治方面，初爲君主時代，社會由於契約而來之後，國家的基礎，則在人民主權的原理。這時，攻勢武力改爲守勢武力，法學書爲最高，一意即入於法治時期。至於科學階段，想像與推論，均屬於觀察之下，以尋求現象的法則。這法則就是經常存在於所觀察的現象之中。科學依賴於不變的自然法則。前二階段，將宇宙間一切事物，簡化成一個單獨的絕對的原理。上帝是神學階段的觀念，自然是玄學階段的觀念。在科學階段，則不能將許多法則，簡化成一種科學，可以爲客觀的一致。惟主觀的構成一個人意識內，而且可以在各個人的意識內產生統一體。因此，實證哲學成爲四海同胞的知識基礎，所以實證哲學的人道觀念，可以等於神學的上帝，玄學的自然。在實證階段，理論與實際的統一，比較周密。因爲現象法則的知識，可以定現象的將來發展，因預見而知，成了實證科學的格言。預知可以爲行動的指標，這指標將爲人類文化而指出光明，益使人類無誤，直趨進化的大道。在此階段，人類開發

自然，而爲工業時期，國家的法制，人們的活動，都可以知識來發明，來社會，一如純粹物理之可以控制，而爲知識所決定。孔德對於實證一字，實在之意義相同，實證哲學之目的，在改革個人與社會的存在。再次，實證哲學，其目的在努力組織的事業，而不同於第二階段的分解作用力，決定秩序的制度，和分配的權力，但義務高於權利。心靈發展和工作的機會，在政治方面，無產者與實證哲學，自然的成了諒解。

孔德一介書生，歷經大難，在他五十九年的歲月中，正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混亂時期，一切舊的封建制度崩潰，一切新的社會秩序無成。他見過舊勢力的興起，也看過新解放者工人的困苦。他體驗到法國他看過舊統治者君侯的沒落，也看過新解放者工人的困苦。他體驗到法國立，但建立新社會的精神基礎却沒有。人類社會的構成，必須有其共同的和共同的感情。沒有共同的秩序，無從安定；無從團結。法國新社會的建立，在那時正是沒有這些。所以人民祇是有新會的希望，但不能實現一個新社會出來。因此，孔德川强調混亂，認爲知協力的理性。在一個大的社會之中，知識力才是統治者。知識的一致是社解生存的法則。由於知識影響感情，才能發生新的風俗和制度。是以實證哲學的意義，即爲改造我們生活起見，而以訓練我們的知識爲急務。孔德曾說：「實證主義，

曾供給吾人以政治改造之哲學基礎。」（實證主義概觀蕭贛譯三三頁）是即以知識改造爲政治改造的基礎。其政治改造的步驟，在求自由於秩序之中，求秩序於進步之中。換言之，必須有秩序，方可獲得自由。必須求進步，方可獲得秩序。他親見因工業革命之後，所發生工人與婦女在社會的地位，日漸重要，而特別予以重視，且爲之說教。他說：

「道德力量之組織，基於哲學家與工人之團結，其完成也，則婦女之黏合爲要。三者合一，社會再生之事乃開始，而革命之局告終。」（實證主義概觀蕭譯本二九四頁）

因爲有了道德力量，則可約束物質力量的專橫，亦即社會秩序可以得到安定。總之，孔德置身於多年的階級混戰之中，浸染於勞工問題之內，以及體會到婦女的處境，其心靈已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所佔領，所統治。雖以著作消磨歲月，然究未忘情於追求一種組織的精神力量，以此而爲建立新社會的基礎，以安定法國人的生活。其所提倡人道教的格言，就是：愛爲吾人之原則（Love, the principle），秩序爲吾人之基礎（Order, the basis;），進步爲吾人之目的（Progress, the aim），而此則均有待於知識權力的發揮，始可實現，見諸行動。

人類知識文明的進化，是由神話而迷信，由迷信而科學。知識的進步，促進人類組織發達，生產增加，這些事實是不容否認的。這些道理也是衆所週知的。中山先生對此也有詳細的說明。不過，他是從求生存的行動中，說明知識對於社會發展和歷史進化的關係與影響，不

是孤獨的以知識而言知識的進化，以及其與社會歷史的關連。所以他追溯知識之推動人類社會的進化，亦從人與獸爭的時代起。人類在洪荒時代，與獸相爭，其所以能戰勝獸類，就因爲不比獸聰明的緣故。他這意思的原文，在第一法則裏已經引證過，所以不必再行引援。可是「人要比獸聰明些」，其「聰明」就是知識的根源。因聰明「一遇曉得用木棍和石頭」，這「曉得」就是知識的應用。因爲人類有知識，應用工具，故最後打敗了獸類，而且馴伏了獸類，以供使用。這時，亦卽由原始的漁獵時代，進入了畜牧時代。「一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由此可見，知識的確是人類社會進化，歷史發展的鎖鑰。人類自戰勝了獸類，便不與獸類爭，轉又同天然物力去奮鬥了。天然物力，凡如水、火、風、雷，都可隨時發生災害，予人威脅。這種種的災害，威脅「人類的生存，社會的發滅，便是所謂的天災。人類要免去這種種的天災，便要與天爭。可是，同天爭不比與獸爭，可以用木棍和石頭，專憑氣力去打得勝的。而且專講打，也是不可能的。這時，要維持人類的生存，便遇到極困難的問題。但這種困難的問題，又勢須要解決的，急能生智，那還是依賴聰明的知識，來加強組織，以發揮技術的力量，替人民謀安居樂生的幸福。或卽築居，以防風雨。這些生存的奮鬥和進化，其力量則在知識了。

「到了同天爭的時代，專講打是不可能的，……後來就有聰明的人出來，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樹上做居屋，替人民謀避風雨的災害。自此

以後，文化漸發達，人民也逐漸團結起來。又因爲當時地廣人稀，覓食很容易，他們單純的慾望，只有天災，所以要和天爭。……極聰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設教，用祈禱的方法，去避禍求福。」（民權主義第一講）

由此可知，人類之所以能夠渡過和天爭的時候，已漸表現着不足維持羣鬥的力量。因爲人同人爭，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夠維持社會的存在。必須武力強盛，增加政治修明，加強組織力量。必須武力強盛，增加政治修明，加強組織力量。必須武力強盛，增加政治修明，加強組織力量

人類社會進化，由神權之前的洪荒時代，進到神權，由神權而君權，由君權而民權，這些時代的進展，都是靠着聰明和聰明的人，在那裏推動着。換言之，就是歷史進化的動力在於知識。不過，現代的民權，還是不能使得社會安寧，人類生存，祇是被某一階級把持着，因此，凡難以維持生存的人，還要繼續奮鬥下去，而且也一天覺悟一天，非要達到目的不可。自從工業革命，應用機器以後，人力便減少了許多工作的機會。因爲許多人沒有工作，以致失業，不能夠生存。這就發生了社會問題。因就是發生了人民的生活問題，也就是決社會問題的方法，那便發明了種種的社會主義，希求以知識來解決問題，改進人生。

一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由思想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民族主義第一講）

以主義的學說來解決問題，是卽以知識來求社會進化和歷史發展了。這種專爲解決工人痛苦的知識，近代既是非常發達，所以工人的幸福，便因此而逐漸增進。所謂社會主義運動，就組織的觀點而說，就是無產階級的民權運動。那末，民權政治不全是因人類的知識進化而發達的嗎？中山先生對此說得很明確。

「從前人類的知識未開，頗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

權都是過去的陳迹，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上講起來，究竟爲甚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爲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的知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民權主義第一講）

這就指明了民權政治的進化，是由於知識的進步。現在人類知識既已進化，當然要繼續的推行民權政治，不再信任君權，進且要實行全民政治，不去信任階級的統治。換言之，人類從前求生存，是仰賴別人的協助，今後因教育普及，知識發達，人人都可憑着自己的知識力，以圖生命的保和養，而無須藉助別人了。知識之於人類的進步，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化，確是一個重要而不可缺的動力。由此，我們固可知道知識是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進化的要素，同時，也可體會到知識的進化是相應着人類求生存的需要。所以知識也是人類求生存的一種工具。因爲這知識的工具進步，生存奮鬥的方法也進化了，而由工具的武器，和宗教的祈禱，進到了和平的鬥智。人與人爭，從前彼此相爭是鬥力，是訴諸戰爭。現在已經覺悟，漸漸的以智代力了，所謂鬥智不鬥力。鬥智的表現在於法，是和平的，不是暴動的。當前以法代力的鬥爭，文明各國在其國內，大都已經進化到了這個階段。即在國際方面，彼此以法代力的鬥爭，亦即以和平代戰爭。來雜詩人類的共存，也漸有了新的希望。中山先生不僅說明人類組織的社會，是因知識而進化，且認爲生產技術的進化，也是由於知識的力量。

「外國的長處是科學，用了兩三百年的工夫，去研究發明，到了近五十年來，才算是十分進步；因爲這種科學進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奪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從前物力的來源是用煤，由於煤便發動汽力，現在進步到用電，所以外國的科學已經由第一步進到第二步。」（民族主義第六講）

自原子能發明以後，人類生產的技術，又將由力的時代進化到能的時代。這些進步的動力，就是科學知識的應用。簡言之，就是知識力推動着人類社會發展和歷史的進化。

中山先生不獨認爲知識是社會進化的基礎，且說明了知識自身的進化。

「或因社會進化於無意識中達到，或因人工建設於有意識中達到，西方民族達到近世文明，殆全由於無意識的進步，因社會經濟科學，乃最近發明也；但一切人類進步，皆多少以知識（即科學計劃）爲基礎。」（實業計劃居室工業）

，人類社會的進化，所謂由於無意識或有意識中達到，是即說知識亦有其自身的進化。試看他對於知識進化的歷程，是怎樣的分析，而加以分期的？他將其分爲三個時期：第一爲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爲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爲知而後行之時期。所謂於無意識中的進化，即相當於第一二兩期的文化。至於有意識中的進化，即相當於第三期的文化。他依其自己對於知識進化的分期，曾說明了中外歷史的演變，和其兩者的比較。

「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爲兩時期：周以前爲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爲一退

步時期。……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趨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於「知易行難」之說，遂不復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

中國正因知識不能進化，尤其不能以行而求新知，是以人民求生存的活動，停滯於古代文化之中，不能以知識推動進化，而歷史亦終陷於循環式的治亂之中，而無新的進步。可是，歐洲則不然，人民能以不囿於傳統的觀念，而打破生存的躭礙，所以科學、自文藝復興之後，日新月異，不斷的發明，而有新文化的創造，以滿足自己生存的要求，且影響美洲和世界。

「歐美幸而無「知易行難」之說，為其文明之障礙，故能由草昧而進文明，由玄冥而進於科學。其近代之進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其進行不息，百年之進步，非突飛速率，有非我夢想所能及也。」（知難行易三章）

「我國在戰國春秋時期，學術思想，頗為發皇，即有印度佛教傳入，西方文化東來之影響，然畢竟沒有超出傳統的社會人文的知識範圍，而有新創造。因思想的凝固，以致物質科學，無從發達，此雖坐因於科舉取士的流弊，使求知與工作脫離。惟讀書人困惑於「知易行難」的傳統知識，而不能以打破之，要亦為一大原因。歐美人

無此傳統的觀念，乃能以行求知，因知而行，而促其社會進化。所以自其生產的技術，和社會的組織。其影響所及，即落後的國家，一旦應用科學的知識，以求進化，亦一易事。德國的進化固如是，即日本維新的成功，又何嘗不然。

一日本自維新以後，……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進化，且較之歐洲爲尤速，此皆科學爲之也。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其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知難行易三章）

科學知識，與日俱進，十九世紀德日以此而加速的進化。二十世紀俄國也是利用科學知識，以建設新的蘇聯國家，不出三十年的努力，成績斐然，強盛足敵德國，眞是做到了後來居上。惟我國獨以一知易行難」的傳統觀念，人民浸潤過久，生活習慣，思想方式，多不能配合科學知識，以求進化，終是依然故我。近百年來，自曾李洋務運動以還，無時不高唱進化，直到而今，仍是悲哀的感嘆着科學和工業的落後。人類歷史因知識而進化，而停滯，此所以中國歷史因知識錯誤行易，以與之作思想的鬥爭，啓示着國人努力，追求科學知識，以推動中國歷史的進化。

的確，今天中外社會的比較研究，一般人皆祇從經濟的生產方法去着眼，說明文化先進的國家是工業的，中國是農業的。殊不知苟以知識的觀點比較，我因落後的根本原因，則在缺乏了自然科學。沒有自然科學的文化基礎，就是自然科學。因爲工業社會的文化基礎，從何建設

起工業的社會呢？西洋自十五六世紀以來，新科學的發展已開其端。近代生產工具發達的知識基礎，如數學和物理學，大都已爲黎我那都（Leonardo 1452—1519），凱伯勒（Kepler 1571—1630），蓋律雷（Galileo 1564—1642），笛卡兒（Decartes 1596—1650），萊不尼茲（Lebnitz 1646—1716）和牛頓（Newton 1642—1722）諸大科學家奠定了。到十八世紀以後，才開科學之花，而結工業革命之果。自後，化學，生理學，和生物學相繼進步。十九世紀以還，其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等，又植根於自然科學之上，從而繁榮滋長。所謂中國今天的落後，不是就缺乏了這些科學的知識和其應用嗎？誠如岳福羅所言，一個民族的落後，因其祇有粗疏而含糊的觀念，中歐文化的對比，也誠如　中山先生所分析，祇在科學知識有無的差別。

「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爲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毒藥，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以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伽根，紐（牛）頓那些大學問家所主張用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所以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民族主義第四講）

科學促進了物質的知識，利用物質的知識，改變了生產工具，推動着社會形式的發展，和

人類文化的進步。設若沒有科學的物質文明，那末，生產工具又怎樣的能以改進呢？生產方法無從轉變，歐洲社會還不是停滯在農業社會，依然的不能進化到工業社會呢？這一點實的過程，誰能否認知識是推動歷史進化的最後原因。知識的進化由於生活的需要，所以知識即在於人類求生存之所致。

「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淮南子氾論訓）

知識的進化由於生活的需要，所以知識的眞僞和利害的價值批判，則以其對於人類求生存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

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着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的。知識祇是一種生產的工具，改變了這一觀點與實用主義的精神是一致的。知識即力量，人類祇得低首默認。以知識的進化劃分歷史期：根據中山先生的意見，計有不知而行，行而後知，和知而後行的三個階段。這與孔德所分神學，玄學，和科學的三個階段，頗多暗合之處。

總而言之，人類由於求生存的活動，因有智慧而成知識，以知識發明了生

分配組織。經過這些生活方法的進化，輒又積成了人類生活的經驗，變成對於事物有系統的說明，是卽有了眞的系統的知識之產生。這種知識有兩種：一是關於照解物質變化的自然科學，一是關於照解人事變化的社會科學。此外尙有綜合兩者的哲學如藝術宗教等。任何哲學具有預知的特性，使得人類進化到知而後行的時期，因而科學的哲學也有預知文化階段。科學可以根據自己的眞知，推動着社會發展，歷史進化；不必再任由生存活動的盲目開展，亦卽不必任由歷史進化停滯在無意識的自然演進歷程之中。因此，知識是歷史進化的動力，已是二十世紀人類應有的認識了。這動力現在不論在中國抑全世界都是一個考證的實例，同盟國對日本勝利的主因，就中國而論，則是信仰思想的力量，一個各方面落後的國家，能夠抵抗強盛的日本，這全賴民族主義的思想力量。正如中山先生所說：

「我們現在有這樣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爲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才能打破我們，如果民族思想沒有失去，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一定打不破我們。」（民族主義第三講）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不能打破中華民國，反被中華民族擊敗了，這是由於什麼力量呢？就是我們接受了他所提倡的民族主義，中國人一都知道大禍臨頭，死期將至」。於是由民族主義

的思想而到信仰，由信仰才發生出來這樣大的力量。至於美國則以憑其優越的自然科學知識，應用去增加生產力，和製造原子彈，而得致勝的。人類而今既已進化到知而後行的時期，有了知識的武器，所以歷史的前途是光明，抑是黑暗，那就應當自己去負責，因爲知識已將自然人和社會人推進到自由人的世界了。

甚麼是自由人呢？自由人並不是放浪形骸，無所約束的，而是一種能以自由約束着自己的人。所以自由人對於社會是從心所欲不逾矩，對於自然是本諸自然律則，而操縱着和支配着自然，不再爲自然所操縱所支配。是卽人已經進化到了自律的精神，不若現在人類尙處在受着環境支配而不能自拔的階段。現在一般的人祇是在追求低級生活的滿足，爲着滿足自己的物質生活的享受，別人不善，社會不良，自己都不負責。不僅如此，甚且與世浮沉，同流合汚，而不以爲己非。所以這種人對社會的環境，毫不負道德的責任，因此，道德的墮落，人格的喪失，他都是隨着自己的環境轉移，而不能轉移環境。試問，這還有什麼自由可言呢？一個自由人是有其獨立的人格和特殊的個性，他正具有如孟子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獨立精神，以表現其自律的道德。不論對社會，對國家，抑對人類的前途，他都負着推進其達到至善境界的道德責任。這樣才是自由人的表現，才是進化到了自由人的世界。在自由人的世界，一切自然的力量，只是服役於人類的，爲着人類生存的優美而服役。一切自然的環境，皆是人類征服的勝利品。一個自由人的生活，對己負責，對人負責。他控制着自然而不爲

自然征服，他從心所欲而不爲心欲驅使。這是一個極有知識的哲人過着其藝術生活的世界，發揮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價值。

歷史哲學的研究，自十九世紀以後，才行發達，所有各家的體系，皆是只見一偏。或以技術爲重，其推演至極，則歸之於生產的方法，而主唯物史觀。或以組織爲重，則歸之於道德的精神。知識與道德皆由心靈活動而表顯，故這兩者，大抵均主唯心史觀。惟　中山先生則以人類求生存的立場，探討歷史演變，分析生存要素，而將技術，組織，和知識，合而有之，則皆是求生存的工具，而均各給予其應有的地位。所以分言之，固有技術，組織，和知識，合言之，則皆是求生存的看法。所以民生史觀是一元的，即是人類求生存爲歷史進化的動力。人類求生存的要素有技術，組織，和知識，因而歷史進化亦有此三大要素。不過，從前各人研究立場的角度不同，彼此的時代問題不一，而不能爲歷史全景，繪成一幅全圖。其實，各他要素必相伴而生。大體說來，例如，彼此的各進化的分則，不論從任何一個要素說起，則其他要素必相伴而生。大體說來，例如，彼此的各個時期，皆有相通的聯繫。當氏族社會的組織，其技術則爲石器，其知識則爲不知而行。由氏族進到種族社會，其技術則亦由石器進於銅器，其知識則爲行而後知時期。至由種族進到民族國家，其技術則爲煤鐵，其知識則爲知而後行。由此以推，歷史進化的前途，當由民族國家進

於世界大同，其技術則將由電氣進於新技術，其知識亦將發揮其科學計劃的作用。至其詳情，則附表以明之。（註）惟這三者的關係是以平面的看法說明的。至以平面的看法，並非卽說政治，經濟，和文化三者的關係，沒有其各自的主導作用。相反的，彼此依然有制約的關係，主導作用，只是一種有機的統一，不若各家流於割裂，固執一偏，徒特成見，而欲以自己私說，貫通我全部的歷史。民生史觀對於這三者要素，彼此的制約關係和主導作用，是以時代的背景不同而說明的，每一時代的不同，則每一要素所表現的力量亦異。換言之，經濟，政治，和文化對於人類生存的時代問題，可以反映出其各自主導的地位。這三個要素互相調協時，則爲人類社會的太平盛世，如果不能調協而相矛盾時，則爲離亂衰世。消解這矛盾，卽是歷史的進化。然必須以何種要素才能消解這矛盾，而使歷史進化，則經濟的技術，政治的組織，和文化的知識，皆各有其時代的歷史地位。所以解決人類生存的矛盾問題，在求生活的和諧；生活不能和諧，也就是發生了矛盾，消解這矛盾卽須革命；革命卽是推動着人類生存的發展，亦卽是使得歷史進化，所以歷史上有經濟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種種記載。歷史上爲什麼有這些重大而劃時代的革命呢？這便因爲人類生存的某種要素，最不能滿足生存的要

註：附表見另頁。

求，最不能配合其他的要素，使之調協，而發生了矛盾的痛苦。要避免痛苦，便須奮鬥，奮鬥到極度，就是革命的暴發。由此，我們可以瞭解革命是解決人類痛苦的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個目的，不能當作一個永久追求的目的。況且這一種方法，只能於迫不得已時才可施用，不能輕便的常用。中山先生畢生努力革命，他認清了革命是進化的方法，同時也主張不可輕言革命。

「至於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人民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以為非爭到自由平等，甚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所以拚命去爭自由打平等。……一次發生英國革命，二次發生美國革命，三次發生法國革命。……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前的階級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也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現在，……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變成共和國家。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源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階級，也是一齊打到平等。……民權主義第三講）

近兩三百年來，歐美各國固因政治革命而進化，其實，近幾十年來，中國又何嘗不因政治革命而進化呢？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結束，江寧條約訂定，國勢日衰，民生日苦，幸使中華民族生存不能維持，乃發奮圖存。革命運動，歷六十年來，一則推翻數千年傳統的專制，創立民國。二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廢除百年的束縛，獲得自由。當革命初起之時，一般人誤解革

命足以召瓜分而反對之，惟　中山先生深知革命是進化的方法，是極度的生存奮鬥，只有革命乃足以救國，後來革命的結果，果免未曾亡國。

「從前列強的心理，以爲中國永遠不能振作，自己不能再管中國，所以把中國沿海的地方像大連威海漸九龍等處來佔領，做一個根據地，以便瓜分中國。後來中國知道中國還可以有爲，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國的念頭。當列強想瓜分中國的時候，一般中國反革命的人，說革命足以召瓜分；不知後來革命的結果，不但不召列強瓜分，反打消列強要瓜分中國的念頭。」（民族主義第二講）

這次對日本抗戰，是由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發展出來的，所以抗戰勝利，國家環境進步，還是革命的結果。這因爲革命是人類求生存的奮鬥方法，是歷史進化的渡橋。革命雖是一種非常的進化建設，同時也是一種非常的破壞，非常的破壞是不宜於經常的施用。

「諸君要講得革命是不得已而爲的事，革命是破壞的事業，……不是今年革命，明年又要革命。革命要用澈底的方法才可以永久享幸福。如果不然，破壞的事業，是永無窮期的。」（三民主義爲建成新世界之工具）

試想，永無窮期的破壞，那豈不是人類自取滅亡嗎？因爲革命一方雖要破壞舊的，一方却要建設新的。如果，永無窮期的破壞，這便成了建設未成破壞又臨的局面，如此怎能建設新的，以滿足生存的和諧要求呢？生活永遠達不到和諧滿足，人類便永遠陷於痛苦之中，這樣自

然是毀滅自己了。所以革命是不得已的事，不能當作一個目的時時去追求。何況人類以和平方法調協生存的要求，不願再以暴力革命，而進步到同意的革命之境界。而今國內有人常以多次革命論來推斷中國歷史的前途，眞是不知何以自解。革命起於人類繼續不斷的不能和諧的生存，亦卽人生發生了矛盾。這矛盾的焦點，雖在人類繼續不斷的要求生存然其反映則在於文化的知識，或政治的組織和經費的技術。就歐洲中古以後的歷史而言，有文藝復興，工商業革命，和政治革命幾大劃時代的史事。文藝復興在歷史上之所以有地位，卽因其有知識革命的價值。當文藝復興時代，就是知識對於人類生存起了主導作用，有了制約力。

文藝復興運動，是歐洲文化從中古轉到近代的關鍵，其影響至深且鉅。凡社會，法律，政治，以及科學，哲學，宗教，和文學，藝術，無不有激劇的變化。其起末時間，約而言之，始自十四世紀之時，終於十六世紀之際，綿延二百餘年。其中，十五世紀，土耳其人佔領君士但丁堡，希臘學者逃往意大利，以及印刷術發明各事，對於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展，影響尤甚。文藝復興，初在研究古代希臘羅馬的舊籍和文學的傑作。此後又及於科學和藝術，凡如建築，雕刻，油畫，音樂等項，莫不發生極大的研究趣味，因此而表現了反抗中古文化的精神。中古文化爲基督教的世界，爲神的知識權威時代，歐洲人這時不論精神的抑世俗的生活，完全操縱於迷信的傳說，和教會的僧侶。及至教會之所以興起，在發人類生存的三大要素現在因爲啓蒙懷疑信仰之端。歐西教會壓收，欺壓教徒，剝削人民，使其生活維艱，頓失生存希望，而啓懷疑信仰之端。歐西教會之所以興起，在發人類生存的三大要素現在因爲羅馬帝國瓦解，社會紛

亂，人民不能安生，而其教義正足以予人生存的希望，其教會亦能以安寧人民的組織生活，乃得以與時俱進，發展無已。惟後來精神麻事，兩俱不足安定人民生活，甚且反爲生存的壓迫，因而生活不能和諧，發生矛盾的痛苦，勢必出於反抗，於是知識革命的文藝復興運動，相應而起。加之，當時封建社會離析，民族國家發展。又値商城興起，大學設立之際，一則使交通便利，文化對流；一則開講學自由，思想勃發。時勢所趨，教廷無奈，亦予容忍，大開古典研究之風，終而推翻神的權威，揭啓近代科學世界的序幕。卽以發現人的理性，打破宗教迷信；復又發現新的世界，擴大全球聯繫。所以文藝復興既爲中古宗教文化的反動，又爲近代科學蛻化的轉機，而在歷史進化上起了主導作用，發生了制約力。其足以象徵當時反抗精神的表現，與追求生存的希望者，要推米奇耳安格羅（Michael Angelo）在西絲丁禮拜堂（Sistine Chapel）天花板上所繪重新創造的亞當之偉大的畫像。這幅畫像是無羞的赤裸，伸張其無束而健壯的膀膊，向着生命與光明，而表示着人的新光榮，表示着人的權力之復興，自我意識的蘇醒，宇宙觀念的新生。這一知識的啓示，便成了新見地，而瞭解人與自然，撕破了神的外衣。因人的發現，而有人文主義的運動；因自然的發現，而有自然科學的開闢，於是神的世界一轉而成人和自然的世界。尤其古代希臘個人主義的文明既被發掘出來，源遠流長，凡如近代宗教革命，民主政治，資本主義經濟，以及道德和哲學的新文化運動，莫不以個人自由爲中心，爲精髓。自其成爲思想之源，工作之源，一切文藝復興運動，直接的間接的，皆以削弱封建權威，

發揚個人自由，表現人格獨立爲旨趣。自意大利創造了新藝術於先，北歐建設了新宗教繼之於後，英吉利終則完成了新文學。從而近代的新社會，乃蘊育以成。精神的新生，遂開現代批判精神與科學精神之端。文藝復興對於人類進化的主導作用，對於克勝當時創造來日的制約力，誰能否認呢？總而言之，文藝復興爲時二百餘年，氾濫於全歐，成了中古與近代文化交替的連鎖，其影響所及：一是理性思想的發達和一般知識的廣播，二是宗教革命的發生和科學文化的開展。試問，莫有文藝復興的知識革命因素，西歐的歷史，果將這樣的進化嗎？

經過文藝復興，各門科學，如數學、物理、天文、與化學，皆因時代的激盪，而有新的發明和其應用。中古時期，神學爲科學的歸宿，近代科學雖大多發軔於其中，然已另闢後徑，而以自然界爲對象。一般學者由研討希臘羅馬的自然科學，得到新知，據而改正錯誤。應用方面，如化學類的染色，棉紙，以及火藥諸項，皆有發展。火藥應用增廣，強化了君主勢力，造成了國家統一。物理類的磁針應用，助進了探險和航海事業的興起。至於科學方法的提倡，和數學代數的西傳，更爲推動科學知識發達的基本原因。自蓋律雷發明望遠鏡，觀察與試驗乃爲研究知識的新方法，經培根與笛卡兒兩氏鼓吹，而今已成科學的普通方法。近代歐洲產生科學文明，改變人類生活，可說是完全受了文藝復興的影響，且爲其無上的後果。科學發展的結果要以因有宇宙的新觀念，和應用磁針，致以發現新航路和新大陸，由而殖民事業興起，商業範圍擴大。於是，歐洲人的生活發生了極大的失調，暴露了矛盾。這就是因爲人類社會的複雜，文

化的交流，對於一切舊的生活方式，思想信仰，都起了變化，而有一種新的適應之要求，轉又促進了知識的新生；亦即有自然科學和自然宗教的產生，有懷疑態度和進步觀念的發展。是以根據一種批判的精神，研究學術。這種精神，應用到宗教，政治，經濟，和教育各方面，一般學者莫不以理性主義，評判一切，估價一切，社會上傳統的觀念，故舊的習俗，和無知的偏見，均皆逐漸淘汰，而代以新知識，新觀念，改革精神，充塞歐洲。十七八兩世紀的人民，經過知識革命的洗禮。他們從那貫澈一切的「理性」中間，認識了自己的理性，對於宇宙感到一種眞實的趣味。從自然界各項法則，以求其合法性的認識，造成一種理性的啓蒙運動。啓蒙運動自法國傳入各國，雖然而成一個時代的新觀念。這個時代的新觀念，發生了主導作用，克勝這個世界，開明生命的神祕，發現宇宙的奧妙。一般哲學家，根據理性主義，攻擊宗教道德的艱阻，批評政治社會的缺點；同時也指出一條走向現實世界樂園的大道，給予人類一個自信，一個樂觀。憑着這兩種新的態度，輕貌過去，矜盼現在，希望將來。我們今日的文明，便在這時發芽滋長。

中古以後，歐洲人的知識，發生革命，起了主導作用。其中主要影響之一，就是發現了新航路和新大陸，而接觸其商業的興隆，增加資本的雄厚，因此，不但有大規模生產商品的要求，而且有其力量。這種大量生產的要求，隨與中古行會限制的生產發生矛盾，於是轉又促成政治的衝突。這便是近代市民階級要求民主政治的根源。十七八兩世紀之主革命，就是市

民階級要求自由平等的具體行動。當時，自由的真義是打破行會的限制，平等的真義是推翻封建的特權，而求市民們自己取得參政機會，運用法律的保障，便利工商業得到放任的發展，以適應人類新的生存活動。在那時，封建的特權政治，是市民階級對於工商業發展的障礙，換言之，即是生產關係與社會關係發生了矛盾。造成這矛盾的原因，就是商業的活動，雖是附屬於技術的工業範圍，然其影響於人類社會的演變，文化的轉換，和歷史的進化，要亦不可漠視。但這對祇重於生產方法的唯物史觀者，則是一個不可彌補的缺點。他們輕視着商業因素，對於歷史進化的重要性，而不予其應有的地位。可是如就民生史觀的立場，則認其有促進人類文化演變的重要價值，因爲商業的活動是人類社會擴大的動力，人類社會擴大了，即是相當於人口數量的增加。這可以影響到社會關係發生質的變化，生產方法的轉換，以及文化的前進。關於這些，中山先生均有詳細的說明。如以商業觀點，劃分史期，亦可分爲四個階段：第一是物物交易時代，第二是貨幣買賣時代，第三是國民經濟時代，第四是國際信用時代。這四期進化的重心，即是交換的中介。人類自發明交換中介之後，由貨幣而錢幣，由錢幣而信用，每一進化的重心在於工具。人類自發明交換中介之後，由貨幣而錢幣，由錢幣而信用，每一中準的進化，便影響人類文明整個的演進。

「欲知金錢之先河，買賣之導線者，必當從人文進化之起源，着眼觀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開化之種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於深山窮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織而衣，鷄犬相

聞，老死不相往來，其風氣與吾古籍所紀載世質純樸者相若。其稍開化者，則居於河流原野之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利便，於是部落與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證古，可知古代未開化之時，其人無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足以自給，無待外求者也。及其稍開化也，則無不從事於交易，雖守古如許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實爲買賣之導線也。或曰：交易與買賣有何分別？曰：交易者以貨易貨也，買賣者以錢易貨也。錢幣未發生以前，世間祇有交易之事耳。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數業者，其必有害於耕，有害於織，斷不若通工分勞之爲利大也。即耕者專耕，而織者專織，既無費時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則生產增加，而各以有餘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較自耕自織爲進化也。惟自交易既興之後，人漸可免爲兼工，而仍不免於兼商也。何以言之？即耕者有餘粟，不得不攜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織者有餘布，亦不得不攜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類推，則爲漁，爲獵，爲樵，爲工，爲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攜其有餘，出而求交易也。否則，其有餘者，必有貨棄於地之虞；而不足者，必無由所得也。以一人而兼農工兩業，其妨礙固大，然而農工仍各不免於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難殊多。……即耕者有餘粟，而欲得布，攜之以就有餘布者以求交易，無如有餘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則有餘粟者困矣。有餘布者，攜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餘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則有餘布者又困矣。其有餘羊者，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

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則有餘羊者又困矣。有餘器者，攜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得器，而欲得布，則有餘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餘，皆爲其餘三人中所以勞力而獲少，而文化不能進步者也。神農氏有見於此，所以有教民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爲市之制，則交易之困難可以悉免矣。：：自有日中爲市之制者，實今日金錢之先河也」。知難行易二章一

人類爲着生存需要，而有耕織的勞作。爲着耕織生產的增加，而有分工，所謂男耕女織，就是人類最初的分工。爲着分工而能合作，乃發生了易貨物，通有無的物物交易的社會形態。

乃世界之經濟學家，多以爲金錢之先河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亦猶乎買賣時代之有中介也。人類用之者，則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則必受種種之困難也。未有金錢之前，則其便利於人類之交易者，無過於日中爲市矣。故曰：日中爲市之制興，則交易通而百貨出，人類之勞力漸省，故其欲望亦漸開

於是前之祇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漸進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飾玩好等物矣。漸而成爲普通之風尚，則凡有貨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後以之易他貨物。如是則凡有貨之一中準」矣。此錢幣之起源也。是故錢幣者，好之物，如龜、貝、珠、玉等，轉成爲百貨之一中準」矣。此錢幣之起源也。是故錢幣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漸變交易而爲買賣之後，則錢幣之爲用大矣。自有錢幣以易貨物，通有無，則凡有餘而求不足者，祇就專業之商買以買賣而已，不必人人爲商矣。……考中國錢幣之興，當在神農日中爲市之後，而至於成周，則文物之盛已稱大備矣。前後不過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爲我國後代所不及，此實爲錢幣發生後之一大進步也。錢幣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類自有錢幣之後，乃能由野蠻一躍而進文明也。」（知難行易一章）

自交易進爲貨幣，由貨幣再進而爲錢幣，那人類就有了商業的活動。商業也是人類求生存的一種方式，中國人從事產業，稱爲做生意，是即有以此而謀生的意思。由於商業發展，轉又促成人類社會組織的擴大，分工合作的複雜。分工愈細，不但工作的勞力可以節省，因爲熟能生巧，且可促進發明，產生新的文化。那末，人類知識愈發達，因爲知識進化，且成了專門的學術，於是又發生了專以從事知識爲業的人。所謂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就這樣演化出來的。我們中國正當商業發達，刺激工業繁榮，擴大社會範圍，推動文明進步之際，便爲人發覺出他的流弊，是以剏創人爲能事的求生方法，而加以壓抑，加以摧殘，以阻滯其發展

下。「右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卷二）對於賤丈夫的壟斷商人，不獨徵收稅以壓抑之，而且加以「爲富不仁」的精神打擊。這種賤商的觀念，還是面今的中國傳統思想。甚而又將知識專團於人文社會的範疇之內，使其與勞作無關。從此，中國的歷史就停滯在農業的環境之中，而成農業的文化。所以自漢朝實行了會儒術和抑工商兩個政策以後，中國歷史便陷於循環式的變亂之中。可是西歐則不然，歐洲人將商業的活動，盡量的發展，打通了人類的聯接，便利了文化的交流，刺激着工業的發達，知識的進步，個而成了工業的文明。因工業發達，而發生革命，轉又促成商業，由錢幣買賣時代，演化到國民經濟時代；再進而爲國際信用時代，是則更有利於人類文明的進化，歷史的進化。

「錢幣發生數千年而後，乃始有近代機器之發明。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於前矣。蓋機器者，輔勒夫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爲之事，機器皆能優爲之。任重也，一人可當萬人之負；致遠也，一發可達數千里之程。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緣此一進步也，工業爲之革命，天地爲之更新，而金錢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機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產，全賴人工爲之，則買賣之量，亦無出乎金錢範圍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產，則合人工與自然力爲之。其出量加至萬千倍，而買賣之量，亦加至萬千倍，則今日之商業，已出乎金

鏡範圍之外矣。……契券之用爲何？……其節時省事，並得安全無虞，爲利其爲利實有不可思議者矣。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會中，實非用金錢，自織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金錢之制可以廢矣。……錢幣未發生之前，可稱爲需要時代，自耕而食，自機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契券出。而金錢之用亦可以廢矣。……此外無所求，亦不能求也。錢幣既發生之後，可稱爲安適時代，蓋此時人類之欲望始生，亦此時而人類始得有致安適之具也。故曰：需要時代，以金錢爲金錢；安適時代，以金錢爲金錢也。……由此三時期之進化，可以知道商業與工業的相互關係，和其兩者對於人類文明歷史進化所發生的力量了。歐洲中古以還，商業城市興起，市民階級產生，一方推動着工業革命的開展。但自工業革命之後，商業轉又成爲工業的附庸，由於工業生產的國際信用時代。國際信用時代，雖爲適應工業生產的大規模生產而發生，然信用商業之爲利於工業的繁榮，則又不可誣言。惟生產關係既這樣的擴大，而社會關係却依然如故，由此乃又發生了社會關係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這矛盾對在於工業革命的結果，

（一知難行易一章）

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商業與工業的相互關係，和其兩者對於人類文明歷史進化所發生的力量了。歐洲中古以還，商業城市興起，市民階級產生，一方推動着工業革命的開展。但自工業革命之後，商業轉又成爲工業的附庸，由於工業生產的國際信用時代。國際信用時代，雖爲適應工業生產的大規模生產而發生，然信用商業之爲利於工業的繁榮，則又不可誣言。惟生產關係既這樣的擴大，而社會關係却依然如故，由此乃又發生了社會關係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這矛盾對在於工業革命的結果，

祇是極少數人幸福，而極大多數人參加生產活動，不能得生，所以社會革命運動興起。所謂社會革命，如以經濟的觀點而言，就是由於生產與分配的不公平，以致工人起而反抗，解，則在於使得社會關係也是共有性的，而與生產關係發生了矛盾，這矛盾的焦點在於生產方法是社會的，而方法却仍是個人的私有性。這個矛盾的消係相配合，相調協。所以這時歐美各國人民的痛苦，生活的矛盾，其主要問題，在於政治，必須改造。由此政治的改造，便起了主導作用，發生了制約關係，亦即今後須以政治控制着經濟的活動，消解其人生矛盾的痛苦，進且以健全人類的生存，得以和諧，得以安寧。

一外國的政治哲學和物質科學兩種及科學，……外國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比較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差得很遠的，速度是很慢的。」（民權主義第五講）

因為歐美政治哲學不能如物質科學的進步，所以政治機器也不能如物質機器的進步，兩相參差了。中山先生一語道破西洋文明現象已進化到社會性的階段，而其政治的分配原則，依舊是私有性的。由於這點的生產與分配不公平的現象。所以工業化的國家，在其國內，發生了工人革命的風潮；而面在國際，亦因生產範疇是世界性的，而組織原則是區域性的，發生了國家政治與世界經濟的衝突。

所謂社會主義運動，其精義如以政治觀點而言，就是工人的民權運動，也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和平運動。自生產方法已經發展到國際性的階段，政治組織依然停滯在國家至上的境界。試想，怎能不以這一矛盾，而造成世界性的衝突，暴發國際性的戰爭，致陷人類於自殺的一途呢？現在人類雖已逐漸覺醒，企圖世界的政治組織，如國際聯盟和世界聯合國等，祇以未能改正國家至上的錯誤觀念，所以其前途究亦未能樂觀。總之，現代歐美人以及全人類痛苦的根本原因，就是物質機器與政治機器不能配合，而使其調協。所以現代歐美人，甚至全人類的生存，和歷史進化的問題，其關鍵是組織的改造，亦即在於政治的革命，這也就是政治要素起了主導作用和制約力的時代了。

人類生存的三大要素，在歐洲中古之後，其歷史在事實上所表現各自的側約力，和其主導作用，簡括說來，中古之際，歐洲饑饉，不僅限於物質，即精神資料，亦頗缺乏。一般人民，朝野上下，莫不渴求生活的滿足。尤其當基督教會歷層化的時候，生命的希求頓失，於是發生了知識的苦悶。爲消解這個矛盾的痛苦，在那時是知識的力量，所以有文藝復興的運動。這運動對於人類生存的滿足，社會的演變，和歷史的進化，起了主導的作用。由於文藝復興的結果，推動科學文化的開展，於是歷史進化了一步。由於科學知識的應用，發現了新航路和新大陸，而世面發生了生產與分配的矛盾，乃以改造工具，增加生產力爲消解這個矛盾，於是社會劇變，所謂工業革命的發生，這時生產方法便起了主導作用。因工業革命，於是有了工業

文化更新，面歷史又向前邁化一步。由於生產方法改換，生產關係與社會關係發生了矛盾，推翻解這個矛盾，則在於以組織的力量，所以今後是以政治改造爲社會進步，歷史進化的主導作用了。

其實，歐洲歷史，都在中古以前，其演變的經過，也可以人類生存的三大要素，各自的主導作用，和其制約力的法則來說明的。不過，其中古以前歷史的演化，則同我們中國歷史，頗相彷彿。那時，所有歷史演變的基本因素，祇是技術的和組織的，而這兩個因素交互推演的動力，則在人的素質進化甚少。所以每當人口過盛時候，如不以內爭，即以外戰來消解其生產與分配的矛盾問題。戰爭的結果，有時同歸於盡，有時一族勝利，成爲獨尊，而其勝敗的關鍵，則在人數的多寡。所以古代民族的興亡，大都決定於人口的多少。（民族主義第二講）

「自古以來，民族之所以興亡，是由於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爲天然淘汰。人類因爲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現在人類中，都已經絕跡了。」

根據這個最的觀點，我們可以說明西方尼羅河流域，馬斯波他米亞流域，希臘和羅馬帝國，上古時代各民族生存的興亡。當原始時代，遊牧民族一旦遇到食糧不足，那便發生了兩種人類生存的三大要素

有些民族以殺老人或嬰兒爲食物。這樣殘殺的

結果，是可以使得一個民族整個的消滅。二是對外的鬥爭。這就是二個遊牧民族彼此以集體的行動互相殘殺。這種鬥爭的勝負因素，在那時，就在人口的多寡，和組織的強弱了。惟人數多的民族，常易致勝，人口少的，則易敗亡。及至遊牧民族與農業部落間相鬥爭，除以人口多寡的天然力影響其勝負外，還有文化的因素，亦即有了知識的力量。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鬥爭，武力方面，前者雖可必勝後者；但於文化，遊牧民族，亦必爲農業民族所同化。這就因爲彼此生活程度相差甚遠，農業文化較豐富，較複雜。遊牧民族雖勝，亦必須襲取其文化，始能相治相安，此則證之以古代埃及和巴比倫等民族興亡的史蹟，固然如是。即希臘，羅馬帝國，以及日耳曼種族諸種部落的鬥爭，其經過亦莫不如是。甚之以知中國歷史的演化，也不能例外。於此可知，現代一般落後的農業國家，受制於先進的工業民族，又何嘗不是文化發展階段的不同有以使然；而農業與工業文化的根本差別，即在科學知識的有無。所以西方歐洲在沒有科學文化以前，較諸中國，多有不及的。

「當元代時有意大利人馬哥波羅者曾遊仕中國，致仕後回國著書，述中國當時社會之文明，工商之發達，藝術之進步，歐人見之尙驚爲奇絕，以爲世界決必有如此文明進化之國也。……是知歐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尙不及中國當時遠甚，而彼近一二百年來之進步，其突飛速率，有非我夢想所能及也。……此皆科學爲之也。」（知難行易五章）

中西歷史近代進化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即在於知識力的要素不同，這我們已一再的說明

了。中國歷史缺乏了這個科學知識的要素，因而便不能再推動歷史進化一步，祇陷於組織的分配和技術的生產兩個要素互相推動的狀態之中，當矛盾時，便是人口過盛，生產不足分配，以致民不聊生，騷亂四起。這矛盾一旦以斬殺人口而消解之後，便是生產與分配得以均衡，民生暢遂，太平盛世了。所以自秦漢以後，歷史的演變，成了循環式的治亂。中國這二千多年來，祇有是使得這一矛盾暫時的消解，而不能從根本上推動我們生存的進化。中國這種治亂的根源，就是人口繁殖，與食糧增加，不能相需相成。內亂的起伏，沒有革命的興廢。這內亂的根源，就是人口繁殖，與食糧增加，不能相需相成。換言之，生產與分配，一旦失調，便起矛盾。消解這矛盾的唯一方法，則是暴亂。人口的出生率，又有與年俱進的傾向，所以少則數十年，多則百餘年，必有一次循環的騷亂。我們通常的歷史俗言，六十年一小亂，百年一大亂，就是這些史實的說明。歷種：一是流氓暴動，二是秀才造反。秀才與流氓的合流，便成了歷史上內亂的主力，希地農民隨着流氓與秀才相率暴動，這就成了所謂流寇四起，羣雄割據的局勢。羣雄相爭的結果，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稱孤者侯，稱鈎者誅。這時，統治朝代，倘若不能平定騷亂，維持秩序，終而崩潰，那又轉成羣雄互爭皇帝的戰局了。中國傳統的內亂，誠如 中山先生所說：

「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了楚漢相爭。劉邦項羽是爭甚麼呢？他就是爭皇帝。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漢唐以來，沒有一朝不是爭皇帝的。

帝。」……中國幾千以來，所戰的都是爲皇帝一個爛。……中國歷代政朝換姓的時候，兵權大的就爭皇帝，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民權主義第一講）

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這就說明了人口與食糧交互的關係，在人口過盛，耕地不夠分配，以致食糧不足的時候，就是一亂。在亂時，人民因爲自相斬殺的結果而減少，使得人口與耕地分配相平，生產的食糧亦可相濡相成，那便是一治。所以中國歷史上政朝的交替，就是由亂到治的結果。關於人口與食糧調協問題的解決，如不能以改進生產技術的工具，則須以社會組織的原則，但因爲沒有自然的科學知識，工具是無從改造，那祇有注重於分配原理的研究，所以對於這點，我們在傳統的思想上是有特別的貢獻，在求均平，在求節用。不思均而思不均，以均平而求和諧，這幾乎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精神了。因此，自秦漢，三國，兩晉，歷隋唐，五代，以及宋元明清各朝，無不每一政朝初期之際，大抵皆以求均爲政策，而造成其開國的太平盛世，亦即人口與食糧相成，生產與分配得以調協。這時，社會關係與生產關係入於和諧的狀態之中，自後即由中期而至末期。末期就是衰世，亦即人口與食糧失了均衡。當此之時，因無法改良工具，擴大生產量，以解消這個矛盾。雖求均平而不可能，轉換生產方法，增加生產力，擴大生產量，以解消這個矛盾。雖求均平而不可能，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便又成了亂的局勢。若再加之皇室腐化，政治失修，官吏貪殘，人民生活，愈益困苦，所謂官逼民反，就是這樣造成的。我國封建專制政治的因素：一是權臣，二是藩鎮，三是女禍與外戚，四是宦官，五是朋黨之爭。這幾種政權的操縱者，互相糾

圖，彼此鈎心鬥角，卒致釀成朝政紊亂，綱紀蕩然，而使皇朝失統，更換新主。所以每一政朝，當其開國之初，新君大都出自民間，尚知人間疾苦，而能勵精圖治，休養生息，使人民安居樂業。且藉其英明，可以控制這些勢力，使之不致或則驕悍亂政，或則陰謀枉法，乃形成政治清明之局。然一傳至三數代之後，皇帝多以深宮生長，習於尊優淫逸，不知民事，於是大權推移，不落於權臣藩鎮之手，即入於外戚宦官之手，甚有變起肘腋，發生女禍，彼此交納，互相離合，轉又演為朋黨的鬥爭，造成混亂情態。從此以往，愈益糾紛，終歸瓦解。其間即偶出一二聖君賢相，欲圖中興，然亦多以大勢已去，祇能苟延殘喘，無法回天。總之，中國歷史的演變，自秦漢以後，只有兩種形態：一是政朝的興廢，幾已成一公式，是即每一朝代，可分盛期，中期，和末期。新朝初成，三數代君主，大抵賢明圖治，形成盛期。繼至中期，凡如權臣，藩鎮，宦官，外戚，和女禍，與朋黨，幾大勢力，則乘機興起，竊取政權，相推相演，造成衰勢。由此轉入末期，於是法紀失守，貪污風行，上下一手，卒以腐朽而滅亡。二是人口與食糧的變化，人口過盛，生產力不能相應而增，遂演成人與人的自殺悲劇。這二種形態，有時復又會合，互為因果。如當一朝的末期，又值人與人爭之際，那時政府便沒有能力平定騷亂，於是各地暴動，羣雄紛起，這也就是到了政治力不能保障經濟的安定，不能增進生產，而發生了政治與經濟的矛盾。時勢推移，卒成舊朝顛覆，更換新朝的局面。經過一翻破壞，人民生命喪亡，財產損失，社會生機，斷送無餘。這時，人民唯一希望，祇在求其苟安。所以新君政策，首在

偃武修文，無爲而治，以求休息養生。同時，獎勵農耕，實行均田，使得人口與土地，分配相均。自是國勢日昌，丁財兩旺，蔚然而成昇平氣象的盛期。這一大局，自漢以來，大體皆是。當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實現了統一中國，造成專制的新局，一方結束了部落的王國分裂，一方奠定了帝國的統一基礎。我國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治，由此確立，二千年來，未爲動搖，自後，統一就是治時，分裂就是亂時。　中山先生根據這種歷史的事實，說明了中國統一的特殊意義。

「至於我們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呢？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綏遠，青海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西藏各屬地。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推到宋朝時候，各省原來是很統一的，到了南渡以後，南方幾省也是統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漢朝，中國的各省也沒有不是統一的。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便是亂的。」（民權主義第四講）

如就秦漢以後各代的興亡來說明中國歷史循環式的變亂，其根本原因，即在人口數量的過盛，影響政朝的轉變。秦始皇初定天下，不知休息養生，好大喜功：開邊域，興土木，耗竭民力，因而民怨沸騰，漢吳一起，羣雄蹙跽，於是大亂，不二世而亡，自創帝凡十五年。當羣

徒崛起，相爭草澤，終由楚漢之戰，而統一於劉邦，以開漢朝基業。漢初，政尚無爲，輕賦稅以養生，自高祖至武帝，歷時百年，經五主，而人力財力，儲藏殊豐，蔚成武帝一代之盛。武帝興文修武，遠略四境，用兵動以數十萬計，國強民富，可以概見。惟自此也就轉入衰勢，其中雖有宣元中興，亦難挽回大勢。外戚宦官，交結亂政。加之朋黨已起，黨爭以成，終不數代，而成王莽新朝，然此實由新舊勢力暗鬥的結果。祇以政治已腐，不足以解決經濟問題。王莽雖以均貧富，行王田，平物價而變法，終亦失敗。又值饑年，民生愈艱，於是綠林赤眉，先後紛起，羣雄騷亂，前漢統一之局，維持二百餘年而破。迄至光武稱帝，後漢建立，經一百九十餘年而沒。其中經過，與前漢大略相似。光武襲取前規，與民更始，政尚清明，且以提倡節操爲培養正氣之本。初朝堪稱盛世，武功文治，俱有勳績。中葉以後，外戚執政，權臣擁兵，宦官驕橫，黨禍以起。自是政治腐蝕，民生困苦，黃巾黑山，諸亂大作，割據局勢既成，東漢因而亦亡。由於平民騷擾，世族皇室和武人，每每乘機而起，互相結合，於是三國繼起，閱五十年，統一於晉。適於此時，外族混居，是以已非僅爲漢族人口增減而可調協生產與分配之均衡，致使初朝盛期，不易再見。所以因五胡亂華，晉分東西，而破壞統一，造成南北朝的亂局。西晉政治，初因女禍，而起八王之亂以亡。東晉因權臣用事，武將逞驕而廢。其間十六國，共有五十君主，或被廢殺，或遭俘獲者，幾有三十之多，情況混亂，由此可見。這歷二百六十餘年的紛擾，終由隋朝統一。惟煬帝之失，一如秦嬴，不知大亂之餘，政尚無爲，以資休息，而

仍勤遠略，興土木，講文治，勞民傷財，刼後餘生，不堪其苦，叛亂乃起，開朝不足四十年而亡。李唐繼興，唐之於隋，尤如漢之於秦，秦漢隋唐，頗多彷彿，所以史家常相並稱。唐初，政尚無爲而治，偃武修文，培養社會生機，政象清明，史稱貞觀之治。歷百餘年，而至玄宗，國力昌盛，人口益繁，遂成唐之盛時，武事文治，比美貞親，故稱開元之治。惟唐之衰弱，玄宗一代，實爲關鍵。自因安史之亂，而開藩鎮跋扈，宦官專權之禍，牛李朋黨之爭繼起。於是政治失修，加之水旱頻仍，稅捐煩苛，民不聊生，亂起四方，黃巢流寇，爲勢最大，卒致唐亡，又啓分裂之端。朱全忠取唐自代，遂演成五代十國的混沌，閱五十餘年，復又統一於宋。宋之不能久保一朝，恰與晉朝相似，亦因遼夏金外族入侵，而有南北兩宋之分。兩宋先後歷三百多年而亡。北宋僅有一百七十餘載，南宋偏安，亦僅一百四十餘年。南北宋雖均因外患而亡，然其朝政經過，仍不脫歷代興亡的規迹。太祖簡易爲政，生齒尚寡，又以杯酒釋兵權，是以頗能安定社會，傳至神宗，時已一百三十年，漸因人口過盛，形成貧富不均現象，加以迭遭外患，兵需賠款，兩俱費財。生產與分配的矛盾，愈益嚴重。王安石雖以富國強兵政策，力圖變法，解決國是；祇以朋黨衝突，相爭不已，影響所及，新政無成，民亂暴發，淮南宋江，即其著者。內外相煎，遂致徽欽兩帝被俘。至於南宋朝政，亦不外權臣竊政，武將恣睢，由而終亡於元。蒙古人游牧生活，慓悍善戰，威及東歐，入主中原，卒而統一中國。惟其政治知識，既不足以自治，又不足以統治漢人。對於各族，肆意剝削與壓迫，多行不義，造成種族不平，所

以一當民生困苦之際，政治混亂於朝，漢人卽叛亂於野，不及百年，終亡於明。至蒙古帝國，歐亞兩洲，聯個分裂，此川原於沒有大規模生產方法，爲其聯繫。是卽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不能調協而致。他如古代各大帝國，若亞力山大帝國，羅馬帝國等，不能長久維持統一局勢，其故實在於此。蒙古帝國既裂爲四大汗國，雖元朝在中國又不能善保其治，均先後相繼而沒。元世祖雖有數十年之儲蓄，國力漸趨衰，所以文治武功，兩俱炳耀史册。鄭和以南方財力，三下南洋。今日南洋羣島，尤有明威。

及乾隆一朝，既驕且侈，內政外交，均因大勢已去，無力挽回。加之東林黨禍，人民塗炭，加之東林黨禍，人民塗炭，政治愈趨紊亂，貪污成風，民間元氣，虧損殆盡。及至魏忠賢當權，朝綱失墮，貪污成風，人民塗炭，加之東林黨禍，人民塗炭，政治愈趨紊亂

稱中興，祇以敗亡因素，正復多多，內政既類似於傳統的情勢，遭於女禍。而外族入侵，亦非北方部落，而爲工業文明的歐人。所以廣西起事的原因，固非饑饉而已，且以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所致。自五口過商，中外貿易的中心，漸由廣州轉移上海，湘粵運輸舊路日衰，人民生活漸無着落，因此秀才與流氓這次的結合，已非流寇式的造反，而爲太平天國的起義了。中國歷代流寇作亂，必藉邪教惑人以聚衆，洪楊之起，因有基督教義的憑藉，所以無須倡導邪教。而教義中合於平民要求者，遂演成太平天國共產制度與男女平等的施政，由而乃將民族革命，社會革命，與經濟革命，一舉而行之。祇以中國封建意識太重，未能免去帝王制度，而造成內爭的主因，終亦由此功敗垂成。但太平天國雖因內爭，而爲滿清與英國相結以亡；然中國歷史的演變，從此亦不再蹈其循環式治亂的軌迹，而別開新局。雖其歷史傳統的餘波，依然壯闊，然亦必終爲時代潮流所衝破。所以清末，光緒皇帝冀圖挽回大局，採納康梁維新變法，事雖無成，但畢竟未亡於傳統的流寇暴亂，而爲革命勢力所推翻。這一中國史的進化，自中國人觀之，固由外因而受西洋文明所推動。如就全人類而言，則亦世界文化所必致。蓋現代文化已有國際性，交流的結果，必然互起影響。所以我們對於歷史演變的環境，不能孤獨的觀察，而須整個的研究。不能以部的而須以動的看法。不能注意其特殊性，且須認清其普遍性。中國歷史的演進，自清朝下葉以還，所以不循舊軌另闢新途的，就在西洋十九世紀的文明，業已衝入。當時，西洋文明的要素，有民主革命，有科學知識，有工業革命，及其從而發生的社會革命，

而民族國家，則爲之作綜合的統一。

我國歷史，自秦漢而後，其演變形態，總括而言，計有二種：一是各朝興亡的軌迹，二是生產與分配因人口過盛而失調，是即社會關係與生產關係發生了矛盾，消解這個矛盾的方法有二：一是經濟的，即以改造生產技術，轉換生產方法，增加生產力，擴大生產量，使得生產與分配趨於平衡。但這因爲我們知識與勞動，自先秦以來，就脫了節，不足以使物理化學的發達，用之以改造工具，增加生產。二則以政治方法，改良社會組織，或以平均貧富，或以移民開墾。開墾既可以疏散人口，又可增加生產，使生產與分配均衡，是即以社會關係推進生產關係，而使歷史進化。但這種政治的調節，如漢之王莽，宋之王安石，以及清之康梁，各次的變法維新，又皆在朝政衰弱之季，不能發生效力，是即政治力不能推動着經濟力的發生了。所以每當人口與食糧不能相需相成的時候，政治力又不能解決這經濟失調的問題，便由此矛盾，而表現了社會的騷化。歷代變換，皆是朝政衰頹，官吏腐化的結果。至於騷亂的區域，要以黃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長江中游以上爲主，其原因就在於這些區域都是農業的。當人口過盛的時候，如不能以政治力來調節，一旦水利失修，天時失常，水旱爲災，饑饉發生，則變亂即起。至東南區域，尤其浙閩和廣東各省，因地濱海，容易向外發展，而南洋羣島則爲其人口調節的水閘，如就騷亂的本質而以政治觀點言之，就是人民爭取生存的權利，也就是民權運動。惟其結果，卻依然保存了君權，這就因在農業社會的專制政治之內，是沒有民主的文化。所以其起

因雖是民權運動，而結果仍是君主。秦始皇專制，人民反對，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各地響應，「那末是民權的風潮」（中山先生語），到了劉邦項羽相爭的結果，還是皇帝再出。試問，君權爲什麼可以保存呢？因爲權的作用在維持人類的生存，社會的安定。如果，一朝新君，「約法三章」，能以維持人民生活，保衛人民安寧，那便自然的受到擁戴。所以權的運用形式，對於人類求生存，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點，中山先生也曾說明過：

「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爲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像中國君權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可算是發達到了極點，但是後來的君主，還要學他，就是君權無論怎麼樣大，人民還是很歡迎。」（民權主義第一講）

不過，這一傳統的君權，到了清末，便因西方民主文化的影響，而不容再作相爭的對象了。尤其有鑑於太平天國的失敗，中國社會的發展，歷史的進化，如果仍循着古道推演，那已成爲不可能的事了。所以清朝的滅亡，其情況雖與歷代相似，還是由於女禍宦官的誤政，和流寇的猖獗，然其新興時代，則爲民國的成立。中國歷史上政朝的更換，從此中斷。這一進化不在於內部的新生力量所推動，而在於西洋民主潮流所波及。惟其因受外力的影響，既無文化的知識，以發揮其功能；又無經濟的技術，以完備其條件，所以自清帝遜位，民國締造，數十年來，「徒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依然是武人割據，土匪四起的混亂局面。這一亂局，

且有外族參加的因素，益使其複雜。如就往史以觀，當晉朝五胡入華，內亂多延一百餘年，朝亦因遼金夏元的侵入，內亂也延長了一百多年。那時外族大都屬於游牧部落，其文化不如中原的農業文明，歷時亦久，即歸同化，而形成一大民族。惟當清時，所遇外族，其文化固非落後，且爲前進，而是工業文明。這種文化的基礎在於自然科學。所以承清啓後的政治的範疇，即清政腐敗，民生貧苦，這一時代的問題，已非中國傳統的循環式之變亂，依然可以自相斬殺的方法，來消解這個人口過盛與食量不足的矛盾，而須另闢途徑，以民主的力量，加強組織，建設一個現代的工業民族國家，藉求人民生存問題的澈底解決。這祇要能有健全的政治力量，推動着生產工具的革命，增加生產力，擴大生產量，來調協人口與食糧的矛盾，那就可以達到長治久安的境界。所以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建設，便是中外歷史合流的結果，也是中華民族生存的出路。他根據民生史觀的立場，首在以合羣的能力，推翻異族的壓迫，爭取自身的生存，所以提倡民族主義。次須力求政治進步，一則使其爲經濟發展的動力，二則避免互爭皇帝而使民族喪亡，所以提倡民權主義。再次，必須改造生產技術，增加生產量，以滿足人民的需要，所以提倡民生主義。最後，則須以新的科學知識，指導這一偉大的行動，所以提倡知難行易。至於三民主義的次序，如就歷史哲學而言，當以民族主義爲先，是即必須爭取自身的生存，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民族已經滅亡，那還有什麼政治問題可談呢？所

以他在三民主義演講裏，首列民族，次論民權與民生。如就政治實施而言，則當以民生主義為中心，亦即必以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為主，那才能領導着人民去建設。所以他在建國大綱，首言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次及民權與民族。中山先生對於民族主義的提倡，固由於中華民族現勢的衰弱，然其理論的根據和危亡的警惕，則從人口數量的演變來說明的：

「我們要提倡民族主義來挽救中國危亡，便先要知道我們民族的危險是在甚麼地方。要知道這種危險的情形，最好拿中國人和列強的人民比較，那便容易清楚。……

「我們現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來比較一比較：近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國是四倍，德國是二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他們人口有了這樣增加的迅速，和中國的人口來比較，我覺得毛骨聳然。……諸君知道中國四萬萬人，是甚麼時候調查得來的。乾隆以後，沒有調查，自乾隆到現在將近二百年，還是四萬萬人；百年之前是四萬萬，百年之後，當然也是四萬萬。……

「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併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非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民族主義第一講）

這是以量的變化說明了中華民族的存亡關係。乾隆時代，人口多到四萬萬，那便發生了人口與食糧分配不均的問題，所以歷嘉慶之後，繼白蓮教匪而起者，西南有太平天國，淮河流域有捻匪，其他小股流寇土匪，則徧地皆是。太平天國因受西洋基督教文化薰陶，以行共產制度，解決民生，已較進步。不過，這時國窮民貧的原因，尚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因素，所以這百餘年來，中國人無時不以棄生而來活。考往昔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本部人民受其壓迫和排擠，還可向南方遷移，晉宋兩朝，先後南渡，同時也就是二次大規模由黃河流域而到長江流域的移民。明清兩朝的初季，則再由長江流域而向珠江流域移民。但清末民國以來，本部已有人滿之患，尤以長江下游為密。北方人口雖因東三省解禁，而為移民的尾閭，惟此適值日俄帝國主義向外發展，遂遭其排斥。是以東三省固由此而發生了國際糾紛，然益增內亂因素。故長年戰爭，不出之於與帝國主義者戰，即出之於內部相爭。尤其民國以還，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割據地盤，以為其勢力範圍的保障，於是內戰不已，而其基本隊伍，即是職業士兵。非兵即匪，非匪即兵，不啻新式流寇的說白。試想中華民族這樣的以天然淘汰作為生存競爭的方法，其前途是何等的危險；因此　中山先生力倡民族主義，以組織的力量解決民生問題，使得中華民族永遠生存。中華民族能夠生存了，那才能有歷史的進化呀。歷史進化的力量，亦即人類生存的力量，據他分析有天然的和人為的。而今中華民族這些進化力，不幸都是處在極危險的境地。

「但是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的力量，

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爲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我們民族處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這兩種力的壓迫，並且深中這兩種力的禍害了。」（民族主義第二講）

天然力就是人口的盛衰，這一現象由於自然淘汰，所以比較得緩慢。可是政治力和經濟力，那就更容易消滅一個人口多的民族了。經濟力比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利害。政治力的壓迫，有二種：一是兵力，二是外交。由於這些而亡國滅種，容易知覺，容易反抗。可是經濟力的剝削，則是習焉不察，日以爲常，而不自知了。何況我們所受外族的侵略，更以政治力促進他們的經濟壓迫，所以中華民族同時受到這二個力量的壓迫，再加上天然力以及精神的文化侵略，所以我們要生存，那就必須去打消這些壓迫的力量，而使中國歷史化，世界歷史進化，換言之，人類整個歷史的進化。由此他便主張「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問題的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中山先生語）

那末，爲什麼採用民權主義來澈底的維持人民的生存，而不將維持生存的權，依然交給君主去施用呢？這有兩個原因：一以現代是民權潮流的世界，中國的君權政治不能不從此結束，以順應世界的潮流。二以人類知識已經進步，而覺中國人的知識，自然亦應因受影響而進步，而覺悟。

「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爲前人所發表民權的言論

稍有不合理，像盧騷的民約論一樣，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也不可因爲英國有格林威爾革命之後，仍要復辟，和法國革命的延長，便以爲民權不能實行，……但是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樣的挫折，怎麼樣的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爲順應世界的潮流，二則爲縮短國內的戰爭。因爲中國自古以來，有大志向的人，多是想做皇帝，……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就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我從前因爲要免去這種禍害，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家成立了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戰禍。」（民權主義第一講）

這是順應世界的民權潮流，而結束中國封建政治，免除爭王爭侯的內戰，減少中國人口損失的用意。中國自夏禹之後，由啓家天下到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歷史上起了一大變遷，是即經濟的土地封建制度，雖已逐漸消滅，但政治的封建勢力却依然存在。這從漢朝以後，事實昭彰。漢朝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以及明朝成祖之亂，都是封建政治的結果。至於唐之藩鎮和清之三藩，亦無非變相的封建而已。秦因未用封建，而採中央集權，遂造成官僚政治的形

態。漢因鑑於秦之失敗，雖恢復封建，但官僚政治未廢。由此相沿，我國官僚政治遂爲國家政治的中心力量，而使政治封建形態益加完成。所以中山先生說：

「中國自秦以後，封建制度便已經打破了。……中國到今日脫離封建制度，雖然有了二千年，但是因爲工商業沒有發達，今日的社會情形，還是和二千年以前的社會情形一樣。」（民生主義第二講）

中國直到今日，因其社會背景未變，所以政治仍是封建性的君主專制。大家爲了發揮一己的英雄慾，不惜犧牲人民生命，造成特殊地位，眞是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因不習慣於民權生活，終於民國成立之後，不獨舊的武人，稱帝者有人，復辟者有人，就是許多自命爲革命的新人物，也常有自相殘殺，想做新式皇帝的。但這些不論新舊反民權的人，爲什麼又沒有成功呢？這就在於一般人民的知識，業已進步，不願再將維持自己生存的權交別人去運用了。

「從前人類的智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迹，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上講起來，究竟爲甚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爲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的智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必要自己去獨立。」（民權主義第一講）

現今既已到了民權時代，而人民的智識又是很進步，那末，自然的就要建設一個民權政治的國家。這樣，我們國家的政治進步了，不但可以用政治力量同外國去奮鬥，而且可以促進

生問題的解決。人類文明進步到二十世紀的時候，對於生產與分配的調節，已可不以減少人口的方法，而以改造技術，增加生產力，擴大生產量，來消解人口與食糧的矛盾了。這就是馬爾色斯的人口律已失其時代的背景，而須加以修正。馬氏人口論的正確性，其先決條件則在生產方法不變的前提之下，可是現在則不然了。生產方法當今已有驚人的進化，所以工商業特別發達，民權政治固爲其發達的結果，同時，也是推動其發達的必備條件。歐洲文化的演變，以工商業爲主力，這點已經一再的予以說明了。因其經濟的進化，影響到政治的進步，「大概社會變化和資本發達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後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到資本家。」（中山先生語）西洋民主政治是商人的產品，民主政治的實現，轉使商人變成了資本家。商人怎麼樣變成資本家的呢？這就在於取得民主地位，利用政權，制定法律，保障商業秩序，推動工業的進化。質實言之，就是政治力解放了經濟力發展的束縛。十七八世紀市民階級所以要求自由平等，推翻君權，實行民權的，就是要以政治力量打破中世紀行會生產的約束，得以放任的自由生產。因爲無限制的生產要求，刺激着改造工具，開闢交通，改善運輸，從而發生工業革命。因工業革命，歐美人民的生活，乃由需要而安適，由安適而奢侈，這一經濟力的進化，正是可以利用來解救中國人的貧苦，所以　中山先生一再提倡，發展實業，增加生產，以謀分配得其平均。如果中國以民權政治，推動工業革命，抵抗外國經濟力的壓迫，以解決民生問題，促進社會進化，那豈不就是歷史進化了嗎？不過，無論民權政治的建設，抑工業革命的開展，總須

要民族能以團結，首先推翻帝國主義的侵略，才能收到效果。所以中華民族救亡的急務，在以民族主義的力量，建造一個現代工業民族的國家，以民權政治的力量，規範着生產建設，促進民生主義的實現，這個三民主義的國家，正是中國歷史進化的象徵。

中國現代民族國家這樣的完成，如就西洋歷史進化的過程，和唯物史觀的立場看來，那末，豈不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蹟嗎？據歐洲近代歷史的發展，第一是民族國家的形成，第二是民主政治的革命，第三是工業革命的開創。而且這一進化的過程，是生產力的發展，是階級鬥爭的力量，在那裏推動着。試問中國歷史的演進又怎樣能不遵循這一歷史的軌迹呢？因此，便有人認爲中國歷史進化的法則，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以資產階級完成民族國家的建設，所以中國現前歷史任務，祇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以其成功去推動着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這樣，於是由國家主義到帝國主義，換言之，由於私人資本主義的工業發展成熟，然後才能有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以中國人民生活間遘的眞正解決，就須再經過另一次的革命，才能徹底完成。這種二次革命的主張，殊不知祇是根據西洋歷史無意識的自然演進的事實。不錯，民族國家的構成，是工商業發達的結果。其演成經過可分三期：第一期是以十五世紀爲關鍵，有葡萄牙英法及西班牙各個民族國家的形成；第二期以十九世紀爲關鍵，有德意及日本各個民族國家的完成；第三期則以二十世紀爲關鍵，如中國及一般弱小民族的建國運動。第一期民族國家，其完全的背景，是非常的複雜，第一當教會勢力衰

微，統一的拉丁文失勢之時，在某一地域之中，因其方言發展，漸以形成各個民族的特別國語。第二教會與政治的種種關係，互思糾紛，互相激盪，而促成民族意識的發達，如各地教會組織的體系，即爲各國政治單位的張本，教皇與君王的鬥爭，所爲各國政權脫離教權的初階。第三羅馬帝國崩潰，種族王國成立，其遺風餘俗，皆爲樹立各個民族國家的基礎，又因各王爭雄，由是王權得以伸張而鞏固，王國得以並併而擴大。第四封建制度，讓人弊生，發生種種腐敗的缺點，而須加以徹底改革，以及羅馬法地區精神的復興，凡此皆爲促進強力的中央政府之確立，利於國王勢力普及於地方，俾進近代民族國家的面成。第五因工商業興盛，市民厭惡封建戰爭，希求有一統一的政府以利其發展，所以一大民族國家的形成，就是一大國王得助於人民，克服許多封建領侯的象徵。人民因求地方秩序的安寧，百業順利的發展，多願納付重稅，助其強大的國王，整軍修文，鞏固中央政府，完成統一大業。所以那時民族國家的特質，在具有一大國王得助於人民，克服許多封建領侯的象徵。人民因求地方秩序的安寧，百業順利的發展，多願納付重稅，助其強大的國王，整軍修文，鞏固中央政府，完成統一大業。所以那時民族國家的特質，在具有統一的言語，實因此爲構成其同生活習慣和感情的必要條件，從而養成其民族意識。其所以須具有統一的政府以利其發展，所以一大民族國家的形成，就是一大國王得助於人民，克服許多封建領侯的象徵。人民因求地方秩序的安寧，百業順利的發展，多願納付重稅，助其強大的國王，整軍修文，鞏固中央政府，完成統一大業。所以那時民族國家的特質，在具有統一的言語，實因此爲構成其同生活習慣和感情的必要條件，從而養成其民族意識。其所以須具有獨立而最高的權力，亦因其對外有獨立的權力，乃可以興外侮，有優越地方的權力，乃可以成立健全的中央政府，掃除封建制據的地方政治形態。這時期民族國家的建立，是隨着工商業的發展，衝破了以血統爲主的氏族藩籬，擴過了以莊園爲界的種族屏障。達到了以自然疆界爲限的國家主義，而爲君主專制的國體。總之，初期的民族國家對於市民階

級，有兩大功能：一是剷除封建的割據形態，造成統一的中央集權制。二是對於外力的侵略，加以武力抵抗，而利其工商業的繁榮，和殖民地的爭奪。由此形成初期的民族主義的兩個任務，就是愛國和排外。及至君主專制，貴族特權妨礙着工商業進一步的發展，那又從事於市民階級的政權奪取，而爆發了民主政治的革命。當第三期如德意日各個民族國家的建立，其背景又另是一樣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是這幾個民族國家完成的時候，那時的情況是怎麼樣呢？簡言之，十七八世紀的民主政治，大體已經定型了，工業革命的發展也已成熟了。民主政治與工業革命，這兩大勢力業經普及到全歐，影響到全球。所以當德意在歐洲排斥奧法，日本在東亞排斥歐美列強，各自建立民族國家的時候，不是自己的工商界資產階級作主導力量，適應於內部鬥爭的要求，而是受着外力壓迫的影響，希求整個民族擺脫外患，形成了皇室貴族和資產者及其他各階級合作的統一，是由於利用對外鬥爭而形成內部團結，不是一如英法等國在昔由內部鬥爭而造成的民族國家。眞實言之，就是利用對外暴力來轉變內部的進化。自內部組織進化之後，才以政治力量去推動工業革命的發展，這就是以社會關係推動着生產關係的進步。因爲這兩種關係的調協，各國社會得以進化，而有他們這七八十年來的繁榮。可是，這種繁榮爲什麼現在轉又衰謝呢？這就因爲當時各國沒有顧及到工業革命的前途，他們祇是循着私有資本主義的古道而進，以致由民族國家一轉而成帝國主

義。他們發揮了政治的力量，協助資本主義發展的熟成，生產力的發達，其結果，生產品的製造，並不是爲着廣大人民滿足生活的需要，而是資產者的利潤追求。所以其市場要擴大到國外，原料也要獨占到全球。於是遂同先進的帝國主義如英法等國發生衝突，二十年之間，先後演成了兩次世界大戰，終於在這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由資產階級的英美各國和無產階級的蘇聯夾攻之下，而一同毀滅了。當第二期民族國家演成的時候，他們祇記取民主革命的教訓，所以採用君主立憲國體，可是那時沒有般鑑着社會革命運動的教訓，所以有其毀滅的結果。由是，當第三期現代民族國家演進的時候，各國情況與第二期頗有相似，也是落後民族的農業社會，因受外力壓迫，而可促成君皇及各階級合作，以互助的力量，對外鬥爭，圖求生存。誰鑑於歷史的教訓，不但須要採用民主政治，並且須要防止社會革命，和其走到帝國主義的末路，故應以社會主義規範着工業化的前途。正當這個時會，我們中國在這一潮流之下，也曾發生過維新的運動，亦即向着工業的民族國家去發展。其初是太平天國的起義，繼而是光緒和康梁的變法維新，不過這兩次的運動都沒有成功。爲什麼別人的民族國家建設可以完成，我們果不能成功呢？這失敗又是什麼原因呢？中國有什麼特殊的原因，而不能隨着一般的軌迹去進化呢？根據我們分析的結果，清末變法之所以失敗，在其政治已極腐朽，而至衰世，正是女禍和宦官誤政之際，所以君皇已無力量領導各階級合作，亦即不能發生推動新時代的作用。換言之，政治力阻礙着經濟力的發展了，不能使社會進步，歷史進化。至於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他們

雖有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兩個因素，但却沒有民主革命的因素，所以其結果是毀於封建的內爭。

「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講起原因有好幾種。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又有人說洪秀全之所以失敗，是由於得了南京之後，不乘勢長趨直進去打北京。……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之所以失敗，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那四部份的基本軍隊，都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民權主義第一講）

中山先生根據內因決定外因的原則，來分析太平天國的失敗，所以有其獨到的見地。因見於此，當他自己起義革命的時候，爲着要免去人民的禍害，且使得革命成功，則引以爲戒，而主張民權，建立共和團體。這「一則爲順應世界的潮流，二則爲縮短國內的戰爭。」同時，他研究前二期民族國家之所以發生階級鬥爭的病態，以及走到帝國主義的末路，其原因在於工業革命的發展，是循着私人資本主義的原理進行。這樣，國家雖是富強了，但多數貧困的人民還是遭受苦難，而有社會革命的運動。因此，他對於中國以改良生產工具，增加生產力，擴大生產

量，來滿足人民生活的工業革命，便主張實行民生主義，亦即「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民生主義第一講）這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設，則是已經接受歷史的教訓，以民權政治的力量，從事工業化，所以其前途既無階級鬥爭的危機，也不是帝國主義的末路。

「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燄，乃較政治革命爲尤烈。……余遊歐美，見其經濟岌岌危殆之狀，彼都人士，方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因念吾國經濟組織，持較歐美，雖貧富不均之現象無是劇烈，然特分量之差，初無性質之殊也。且他日歐美經濟之影響及於我國，則此種現象，必日與俱增，故不可不爲綢繆未雨之計。……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孫文中國革命史）

這是中山先生根據量與質的變化，而說明中國社會關係的本質是私有的。如果中國工業革命，仍舊循着私人資本主義的原則去發展，那祇不過是量變而已，且其爲害更甚。我們應當在工業革命進行之初，就以社會關係共有的本質，來規定着生產關係的進化。所以他主張民權主義來保障着生產關係的轉變，和民生主義的實現。民權主義爲什麼可以發生這大的效力呢？對此我們要有深切的理解，那必須懂得民生史觀第二法則的規律。這就是歷史的進化受着社會關係與生產關係交互的推動。當前中國以工業革命來解決民生問題，首須以政治力量來推動經濟

力的發展。所以　中山先生說：「要把中國造成一個新局面，非用新組織不可。」就是新的政治。當今中國工業革命發展的前途，是受着政治的束縛，也就是國內封建的和國外帝國主義的兩種社會關係阻礙着生產關係的進化。推翻封建性的官僚政治和帝國主義的兩種勢力，就必須以民權的力量才能做到。民權的力量摧毀了封建性的官僚政治，打倒了帝國主義，那末，發展生產力的障礙也就推翻了，這樣，中國才能順利的發展工業革命。但這一革命的主導力量，也是由於外力壓迫，而形成各階級，各部落的合作，所以是國民革命來掃除工業化的障礙。其實，中國進行工業化，早自清末曾李洋務運動，即已開始，直到而今，不但沒有成功，而且依然是殘敗。是即這一百年來，證遇到國內封建性的政治阻撓，官僚集團腐蝕了國營工業，這是周知的事實。可是，此外還有帝國主義的壓迫。至於帝國主義與落後的封建性的地方政治，結合起來，束縛着中國工業的發展，一般人便不容易瞭解，而　中山先生却一再的指示着我們。

「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着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够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民生主義第四講）

他不但有理論的指示，而且有事例的說明：

「當歐戰的時候（按即一九一四—一八），歐美各國沒有洋布運進中國，到中國的洋布便不夠人民穿，布價便是非常之貴，當時中國的

商人，要做投機事業，便發起設立紗廠布廠，……後來上海設立華人家工廠，都是很賺錢。」（民生主義第四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中國新興工業曾經一度的繁榮，可是一到戰後，各國工業復興，中國的資本家便無力與之競爭而失敗了。

「當歐戰的時候，本是中國商人最賺錢的生意，當時之所以賺錢，是由於洋貨不能入口，沒有洋貨來競爭。我這次進口的時候，沿途看見紗廠布廠的煙筒，多是不出煙，我便奇怪起來，問那些由上海來接我的人，他們都說那些工廠在這幾年中極虧本，早已停工。這一事實，教訓了中國人什麼呢？一則說明了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是沒有其前途的，中國的資本是應當澈底的覺悟。二則說明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受着政治的束縛。

一推到我們現在的紗廠和布廠，也是用機器，為甚麼外國人用機器，同是一樣的用機器，為甚麼外國的紗廠布廠能夠賺錢，我們中國人用機器織布紡紗便要虧本呢？而且外國織布的棉花，還是從中國買回去的；一往一返，要花多兩筆運費。再者外國工人的工錢，又比中國高得多；照道理講是應該中國的紗廠布廠要虧本。為甚麼所得結果，恰恰是相反呢？這個原因，就是中國的棉紗受了外國政治的壓迫。……當從前中國用手工和外國

用機器競爭的時代，中國的工業歸於失敗，那還是純粹經濟問題。到了歐戰以後，中國所開紗廠布廠，也學外國用機器去和他們競爭，弄到結果是中國失敗，這便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外國束縛中國的條約，對於棉紗問題，是有甚麼關係呢？……外國洋紗洋布，只要百分之七、五的厘稅，便可以流通中國各處地方，便要更納一次厘金，……所以中國土布的價錢，便變成非常之高；土布的價錢太高，便不能流通各省，所以就是由機器織成的洋布，還是不能夠和外國布來競爭。……因為中外貨物的稅率不平均，

縛。關於地方政治，是受着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性的地方政治之束縛，大體已經解放。關於帝國主義的束縛，十五年北伐以後，可謂大體亦已解放。惟這一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受着各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日本失敗以後，可謂大體亦已解放。惟這一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受着社會關係的桎梏，中國人雖在努力推翻，但其殘存勢力，尚圖復興，而今依舊有人提倡聯省自治，和由解着中山先生的地方自治，以求變相的地方割據之再生。中國各省地方政治的封建勢力，果真復活，國家不能獲得真正統一，我國工業化運動，八十年來，遭遇着封建的官僚政治的打擊，情的阻撓和摧殘，而更難發展了。中國工業化的前途，又將受傳統的封建政治，予以無為無成效。即在抗戰期間，民營工業和國營工業，不論民用的抑國防的，莫不受着官僚政治的

腐蝕，而潛於危。加之，當時又沒有正確的計劃政策去統籌辦理，反使局部的管制政策，發生極大的流弊，當然更無法去協助工業發展。所以今後中國工業化如要成功，必須力求政治力的進步，亦即必須以民權政治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而創造一個新的行政機器，來推行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

總之，中山先生對於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是將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這不獨是時代潮流所趨的歸宿，且是民生史觀法則的範疇所決定，而完成其三民主義的國家建設。這就是一次革命的主張：

「我們中華民國若將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解決，用一個一定會將現在的中國，變成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是建設新國家之完全方法）

他這種主張，難道是不知道西洋歷史進化的過程嗎？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試看他說的：

「三民主義的道理，原來是一貫的。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次序，世界各國都是先由民族民權兩件事，却忘記了最要緊的民生問題。

「歐美各國二百餘年以來，祇曉得解決民族民權主義，祇有少數人享幸福，大多數人還是痛苦。因到現在全國的權力，都操在少數資本家的手裏，為大多數人不甘受這種痛苦，所以現在才有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的事情，時常發生。」（三

據此，他既知道西洋歷史進化的過程，是分爲三個階段，爲什麼他又主張在中國歷史的進程裏，一次完成其進化呢？這難道他不知道唯物史觀的法則嗎？他不但知道，而且去批判。他之所以主張一次完成中國歷史進化的，不是根據唯物史觀的進化法則，而是遵循着他自己發明的民生史觀之法則。唯物史觀祇認爲歷史進化的主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可是民生史觀還認爲政治力和知識力有其推動歷史進化的主導作用。試就知識力而言，人類知識文明，現在已經進步到科學時代，知而後行的時代，這也就是到了可以知識的力量，去推動歷史進化的階段，因爲科學是可以預知的，科學的行動是計劃的。所以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設是預知的，是計劃的國家建設，不必再盲目的重蹈西洋歷史無意識的自然進化，覆轍了。知識是人類進步的因素，也是歷史進化的一個因素，這是理論，也是事實。知識之所以能爲人類進步的因素，則在由於「凡人有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也。」是卽知識由於生命發展的行動而成。至於知識發展成爲思想，就是根據人類生存的要求而演進，思想的構成是由於生存環境的事實爲背景，所以「我們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便先要靠事實，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那末，對於中國歷史進化的道理，我們便不能專憑西洋學者的言論，而須自己去根據現在中華民族要求生存的環境，和整個世界人類生活的情況，「因爲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發生言論，並不是先有言論，然後才發生事實。」當代的事實是什麼呢？根據世界歷史進化的潮流，人類已經進步到科學時代，由於科學知識的應用，不但改造了技術，增加生產力；而且促進了組織，增強了政

治力。由於這一變局，造成了帝國主義的侵略，革命，在國外引起了落後民族的復興運動，而中國正是落後民族的地位，民族生存陷於危亡的境界。所以我們要求生存便須學習科學，一方改良生產技術，一方改良生產技術，一方改良政治組織。惟我們進行這一種求生存的鬥，難道不應當根據以往的史實，來教訓着自己，不要再鑄成大錯嗎？歷史的價值，就在鑑往知來呀！人家已經走錯的路，我們何必再蹈覆轍呢？所以根據前二期各個民族國家的演成，和中國近百年來復興運動的經驗，中華民族的建國運動，就應當包括着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的歷史背景有以使然。所以國中山先生說：「大凡成立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一定是受種種影響，尤其以歷史底和地理底影響爲最大。」不過，這一複雜環境的適應，中國人現今已無知識力來引導着自己向前進化了。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洗盡挫折，深究其中原因，蓋知中國人沒有現代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的思想所致，而又深中「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遺毒，乃發明知難行易學說，作爲思想鬥爭的武器，一方改正中國人相知識，一方積極的鼓勵中國人追求科學的系統的眞知；作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以他既說明其革命的阻力是革命黨人的知識太低，又說明有了眞知識就可完成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普徵之士，多期期以爲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爲予之理

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是豈余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夫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今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開革命建設之始，是無革命之建設矣。……其於國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毫無所補，是亦以暴易暴而已。」（知難行易六章）

不幸，因爲當時革命黨人知識太低，沒有知識力去推動中國歷史進化，卒致民國成立以後，還是停滯在傳統的歷史範疇之中，而沒有眞正打開中國歷史進化的道路。所以　中山先生雖認爲在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祇以國人甚及黨人都缺乏科學的知識，沒有眞知特識，徒誤於知難行易的粗疏觀念，而使革命事業，功敗垂成。　中山先生乃痛憤的說：

「此說（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始於傅說對武丁之言，由是數千年來，深中於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設計劃，一一皆爲此說所銷也。……兵法有云：「攻心爲上」，是吾黨之建國計劃，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夫民國之建設事業……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知難行易自序）

這便說明了知識不能發生主導作用，而阻滯了歷史的進化。如果，那時革命黨人對於三民主義國家的建設，「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故爲一國之經營建設所難得者，非實行家，乃理想家，計劃家也。」因此　中山先生遂一方努力於思想的鬥爭，一方

計劃建設的方案，開於思想的鬥爭，一再鼓吹反對封建思想和殖民地意識，以掃除障礙，而為推進計劃建設的主導力量。所以對於民族主義有知難行易的思想建設，以實其實現。對於民生主義有民權初步的行動建設，以實其建設。而以計劃政治推行其計劃經濟的建設，總之，以計劃政治推行其計劃經濟的建設。而以計劃教育助成之。這些計劃的實施，成事實，就全在發揮知識力的主導作用。現今我們中國人既已根據他的計劃，推翻了傳統的專制政朝，打倒了侵略我們最猛烈最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那末，今後就應當再進求三民主義的真知特識，繼續的根據他的計劃而完成新中國的建設。所以我們尤非要明瞭知識力對於社會進步，歷史進化的重導作用。

一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予之於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成之先例，鑑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為革命方略。……革命之建設也，非常之建設也，亦速成之建設也。」（知難行易六章）

我們知道革命是非常的建設，如果當非常的破壞之後，繼之以非常的建設，中國歷史豈不是就飛躍了一步，而一次完成其進化了嗎？知識力起了主導作用，在那裏推動着歷史的輪子飛

轉，而今已成爲普通的事實。試看這次世界大戰，同盟之所以勝利，就全在知識的應用。對於政略和戰略的決定，每次舉行大西洋會議，德黑蘭會議，以及開羅會議，集思廣益，以求知識的健全，而門智。對於戰術也是以科學計劃的方法來運用，來進行。其中西歐戰場諾曼第的登陸戰，中國戰區中印交通的開闢，史迪威公路幾爲現代建築史上一大奇蹟，這些都是先經過科學知識的計劃，而後做成的。至於原子彈的發明和製造，以及其應用，而決定了戰爭勝敗，那更是科學知識所發生的主導作用和制約力了。其實，知識對於歷史進化的影響，早爲事實。就中國歷史而言，自戰國而後，歷史的演化已多由知識力決定，戰爭的勝敗亦多取決於知識了，所謂鬥智不鬥勇，皆是這一說明，而戰國策一書不啻就是鬥智不鬥力的說白。即如歐洲，亦復如是。譬如近代民族國家的演進，民主政治的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發展，各國莫不在在有其文化革命爲之主導。總而言之，人類的智慧和經驗，自構成了科學知識之後，對於人類求生存的活動已發生了主導作用，可以推進社會發展和歷史進化。歷史進化有了知識力的因素，也不再無意識而自然的向前演化，則轉入於人爲的進化時代了。……社會組織之不善，雖限於天演，而改良社會之組織，或者人爲之力，尚可及乎？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其所主張，原欲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而以和平慈善，消滅貧富階級於無形。」（社會主義的分析）

以「人爲之力」，改造人類生活，就是發揮知識的作用。所以今後社會主義的世界，完全是科學的哲學之世界。知識對於人類求生存的活動，既有這大川。其理想能以美滿的實現，則全在於科學知識的應用，我們對於中國歷史的主導力量，那末，今後歷史進化，亦已由漸變發展到突變的階段。所以不能墨守着十八世紀唯物史觀的成說，而須瞭心史觀和十九世紀唯物史觀的成說，而須瞭解新的民生史觀的法則。以預知的計劃的方法，去推動着人類生存的進化，歷史的進化。

第二法則

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凡屬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

——中山先生語

民生史觀的圖表(民生史觀表二)

人類的生存

〔個人；民族集團(民族、部族、民族)；階級集團(無產、資產)和全人類〕

↓

生存的基本活動

〔保和養〕

↓

社會生產的生活關係

技術生活 —生產關係— (以什麼工具去獲得生活的物質資料)

知識生活 —意識形態— (怎樣調適生產關係與社會關係)

組織生活 —社會關係— (以什麼力量去獲得物質及怎樣分配和保衛物質)

經濟生活 ⇄ 意識生活 ⇄ 政治生活

人與人間的關係以互助為主導方式

人與人間的關係以鬥爭為主導方式

為中心動力生產工具以手

為中心動力生產工具以機

非科學的分工合作	第一時期 漁獵	經驗的觀念 (樸素的唯物觀念) 不知而行	第一時期 氣力	原始氏族共產社會 (個人與社會是統一的)
非科學的分工合作	第二時期 遊牧	宗教的想像 (神學) 不知而行	第二時期 神權	奴隸氏族社會 (個人與社會是矛盾的)
非科學的分工合作	第三時期 農業	玄學 (形而上學) 行而後知	第三時期 君權	封建社會 (個人與社會是矛盾的)
科學的分工合作	第四時期 工業	科學的推證 知而後行	第四時期 民權(階級的)	資本主義社會 (個人與社會是矛盾的)
科學的分工合作	未來時期 新工業	科學的哲學 (自覺的意識) 知而後行	未來時期 全民政治	新共產的民生主義社會 (人類大同) (個人與社會是統一的)

生存奮鬥的方式

對自然界的關係

絕對的互助　絕對的鬥爭

生產方法 —分工合作— (生產工具與勞動力的使用)

生活方式 (衣、食、住、行、及養生送死的儀式)

藝術的物質生活

奮鬥行動的必備條件

智　仁　勇

誠 (行動的貫澈始終)

善　惡

(個人與社會是統一的關係和諧而滿足的生存)　(個人與社會是矛盾的關係衝突而鬥爭的生存)

文化的理性生活

對人類本身的關係

相對的鬥爭　絕對的互助

人與人關係的類別

個人與個人 (夫婦、朋友等)　個人與團體 (家庭、社會、政黨等)　團體與團體 (國家、階級、民族等)

組織關係的基本原則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個人對社會的義務 (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社會予個人的權利 (自由　平等)

哲學的精神生活

第三法則　人類生存奮鬭的兩個主要方式——互助與鬭爭——及其主導方式

對於民生史觀的基本法則，我們既已說明了歷史進化的最後原因，在於人類求生存，和生存活動的三大要素及其主導作用，最後便應當說明人類求生存的奮鬥方式。人類之所以要求生存，就在因爲人的生命發展過程，是一串的新陳代謝作用。人之身體由於細胞組成，細胞需要新的營養資料，使其代謝作用，繼續不斷的綿延。爲着滿足這一個要求，那便發生了生存的奮鬥。人類之所以要奮鬥，就在於天地間一切動物都是由於細胞組成，都是需要新的營養資料，使其代謝作用，繼續不斷的綿延。因此，凡是動物都要獲取食料，所以就發生了彼此互相鬥爭的現象，鬥爭的結果，使得同類相助。所以一切動物的生存活動，莫不是當其集合而營羣體生活的時候，對外是生存競爭，對內則排斥生存競爭，而以互助合作的努力，以求共存共榮。是以任何動物生命的發展，都具備着兩種活動來維持自己的生存，這就是覓食和自衛。中山先生承受科學研究的成果，認爲人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所以他就以此說明了人類生存的奮鬥。

「但是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要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發生了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民權主義第一講）

生存競爭是動物的求生方式，也是人類求生方式。兩類動物彼此競爭，一旦到了極端，那就發生了戰鬥的行爲。在戰鬥的時候，同類相助，這是自然的事實。對此，中山先生也曾說明過。

「人類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覓食，一方面是自衛，在太古時代，人食獸，獸亦食人，彼此相競爭。……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在別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這兩個地方的人類，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和猛獸是不同的，於是同類就互相集合起來，和不同類的去奮鬥，絕沒有和不同類的動物集合，共同來殘害同類的。當時同類的集合，不約而同去打那些毒蟲猛獸，那種集合是天然的，不是人爲的。」（民權主義第一講）

當人同獸爭的時代，人類不單是以同類相助的合羣力量，而且因爲人類比較聰明些，還知

道用木棍和石頭，以技術的力量，戰勝獸類，克服獸類，把猛獸殺滅淨盡，命才得到一個保障，同時把馴伏的禽獸豢養起來，作爲供給食糧和工具應用的資源。人類戰勝了獸類，打下了天下，便選擇優良的地方定居下來，經過與天災如風火水雷等的禍患鬥爭，於是良好地區便都住滿了，自後就是不好的地區，也在那裏遊牧遷徙，住居下來。這樣，人口一天天的增加，地方一天天的減少，人類生活的情形，便發生了一個大變動，那就是大家都要爭取一塊好地方。爭取好地方的衝突，直到而今，還未終止，所以人與人爭的經過，其初是人羣與人羣爭，這個集團與那個集團爭，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是古代氏族與氏族，彼此集團鬥爭的自衛警戒。氏族與氏族相鬥的結果，彼此都促進了內部的團結，組織緊密，因此，一個英勇善戰的酋長，便應運而出。酋長的責任在維持和保衛一族的生命，同時，又以知識未開，對於許多自然現象所給予人的災難，非但不能控制，而且不能瞭解，所以酋長的職務便是祈禱和打仗，也就是神權發生的象徵。當兩族相鬥，敗者爲奴，勝者爲主，論功行賞，封分土地，於是王侯四立，從而演成封建時代，君權亦由此逐漸發達。自後人與人爭鬥爭的基本原因，則在生產與分配的不平衡，換言之，就是爭食。在農業時代，生產的基礎就是土地。所謂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土地與人類生存的關係，由此可見。至於生存競爭對於土地與政治組織的關係，盧騷曾分析得很清楚。他說：

「一個政治團體可以用兩個方法來衡量，就是領土的廣袤，和人民的數量；在此兩者之間，有一個適當的關係，據此國家可以明示其眞實的範圍。人民組織國家，土地供養人民，那末，其必然的關係就是領土必須足供維持其人民，就要有多少居民，就要有多少土地。依此比例，那就曉得了一個定額人民的最大勢力，因爲倘若土地太多，而管理之，則是一個負累，沒有適當的耕植，和生產的豐富，這就是自衛戰爭的近因。」（民約論二編十章）

國家以轉移其隣國而爲擴大地盤，這就是攻勢戰爭的近因。倘若土地不足，他這個意思頗與我國民爲邦本，食爲民天的古話相似，同時也說明了分配與生產的相互關係，如果不能調協，便是人類的戰爭主因。當人類經過集團的鬥爭，其初克服了獸類，繼而戰勝了同類。從此以後，人類的社會組織與生產技術的發展，都有了長期的停滯。尤其在克服同天爭的技術方面，直到科學知識發達，應用來改造了許多舊的技術，發明了許多新的工具，才加強了同天爭的力量，掃除了許多自然環境的障礙。在人類沒有這些新工具以增加生產力，調節分配與生產平衡的時候、私有財產便逐漸演化而成。自私有財產的社會關係確立，人類不但對外發生集體鬥爭，卽對內也發生了個人與個人爭，階級與階級爭，甚而演成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爭。不論個人與個人，階級與階級，這時人與人爭的象徵是君權的產生，表示着組織嚴密，鬥爭力量強化，但并不能解決人同天爭的問題。直到個人與個人爭，階級與階級爭，其程度的尖銳化，轉又發生了民權時代，還是人同人爭的世界。所以自私有財產

制度興起，原始共產社會消滅，人與人爭的程度，
了。

「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資都壟斷起來，圖他過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
於是變成人與人爭極劇烈時代。」（民生主義第二講）

人類由於內部，個人與個人相爭，演化到階級與階級相爭，這是順應着同類相助的自然現
象造成的階級鬥爭的事實，所以不自今日始，而早已存在了。譬如早在古代希臘，雅典因爲工
商業發達之後，就發生了階級鬥爭。紀元前七世紀時，雅典社會形成階級的分野，農工階級生
活日苦，於是展開了鬥爭的活動。紀元前六二一年憲宰屈拉哥（Archons Draco）制定法律，
保障市民利益。紀元前五九四年梭倫（Solon）解放債奴，改善農工痛苦。這一鬥爭，繼續發
展，後由水手漁夫陶工以及各業匠人，組織海岸黨，和由牛羊牧人以及小農組成的山黨，均爲
要求解放而鬥爭，貴族則成立平原黨以對抗。至紀元前五百年，經過平民優勢的奮鬥，君王廢
除，貴族毀滅，而開古代的民主政治之端，不過，那時的民主政治，只是自由民，亦卽資產階
級的，所以並沒有廢棄私有財產制。而私有財產制度，歷羅馬帝國和中世紀，直到現今，還是
造成一部人類自相殘殺的戰爭史之主因。卽我國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六十年一小亂，
百年一大亂，也無非是人與人爭的史話。總之，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就是人同人爭的局面。
這一長期的鬥爭，如以權力來分，可以劃爲三個階段：由神權到君權，是第一個階段；由君權

國民權的鬥爭，是第二個階段；再由少數的資產階級民權到全民政治的鬥爭，是最後的階段。

人類生存的進步，須要組織，維持組織和推動組織，那便須要權力。所以君權與神權爭，這些皆是顯露着人與人爭的程度，益趨猛烈。事實上，人類雖已自有史以來，便相鬥爭，但給予這鬥爭以理論的說明，即是十九世紀中葉以還的事。因爲當時人與人爭的事實太普遍，太劇烈了，乃有達爾文以生物學和馬克斯以社會學來建立鬥爭的理論體系，助長着鬥爭的開展。關於這兩個人的學說，影響人類實際生活甚大，我們應當澈底瞭解。馬克斯的學說，前在本書第一法則裏已經予以詳細敍述，茲不復贅。至達爾文學說，自應在此加以扼要的說明。

英人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生於一八〇九年，享壽七十三歲，與馬克斯同一時代，皆是十九世紀的人物。達氏在學問上的成就，可與馬克斯比美，亦足以代表十九世紀的文明。這位偉大的自然研究者，不獨對於生物學有特殊的貢獻，即對心理、和倫理的問題，同樣的富有研究。他愛眞理，同情人道。其幼年初習醫學和神學，惟均無興趣，而喜自然科學，觀察生物。當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六年，航遊全球，遂爲其發現生存競爭的初步研究。此時遍迹南美洲，注意南北兩部動物生活的相似和差異。歸國之後，繼續探討，頗思解答動植物在其環境之中，其形態和特性，何以保持和發展而有利於其自身？達氏正值思索形態和特性的差異與環境相關的自然原因之際，適於一八三八年得讀馬爾色斯人口

論一書，因而刺激其思想，觸動其靈感，乃發明同種動物必須互助合作，而與別種動物相爭，以求獲得生活的必需資料，生活是而且必須是一種生存競爭。無論個別的抑集體的形態和特性的發達差異，莫不由於對其環境適應的競爭而使然。達爾文於是便藉此而發明其動物的差異是由於生存競爭的學說。一八五九年刊印其物種起源（或譯物種由來）一文，自後繼續的發表論文，敏以求之，死而後已。其中人類原始一書，尤爲重要。此書是以演化的證據，說明人由動物進化而來，否認人由上帝創造；而推翻了西洋基督教傳統的迷信。一切生物皆由生存競爭而得進化，競爭雖是自然界的一般法則，但生存與否則各有不同。競爭的歷程，經過自然選擇的結果，一方是天然淘汰，一方是最適者生存。自達氏以引證生物的現象，而創立其生存競爭的學說，於是便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不但在哲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一則給予了自黑格爾以來的進化哲學以科學的根據，打破了宗教上神的權威；二則確立了自然科學的進化觀，展開了自然科學新的研究方向。尤其在社會科學方面，十九世紀正是工業革命成熟，階級分野劃清的時候，當生存競爭說一出，不論有產階級抑無產階級，兩方的各國學者，皆爭先引證，作爲彼此鬥爭的理論根據。資產階級的學者可以英人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894）爲代表。斯氏早於達爾文之前，即倡社會發展說，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便給予其演化哲學以科學的新基礎。斯氏且以個人主義觀點，強調生存競爭和天然淘汰的理論，以之說明保護病者弱者和不適者爲種族墮落和衰頹的原因。正當這時，德國資產階級亦準備對封建貴族的專制政治，

作一種新的攻擊，於是達爾文的學說，恰巧可以用作理論的指導，而受着普遍的歡迎。同樣，歐洲其他各國，凡有自由進步的資產階級，無不憑此以與保守的勢力交戰。當新興資產階級利用孟氏學說，一方對無產者壓迫的時候，社會主義者也接受了這一武器。這一進化觀的生存競爭說，尤其爲馬克斯階級鬥爭說之前，即倡階級鬥爭說，兩者於是相得益彰，而馬克斯尤引爲快。動物界適用達爾文學說幾爲當時的標語。所以有人引申而論，在動物界鬥爭的結果，是自然的器官發達，在人類鬥爭的結果，是生產器具的發達。這種比擬的申論，雖關近於奇談，然其影響着人類相爭，推波助瀾，益趨悲慘的境界，而且不絕的一再重演着有產者與有產者鬥，有產者與無產者鬥，無產者與無產者鬥，以及個人與個人競爭，階級與階級競爭，甚至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相爭，終至演成國家集團的大戰爭。二十世紀上葉，不出三十年，就暴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現前幾是人類瘋狂的混戰世界，而且大有不以爲足，繼續重演的趨勢。達爾文學說而今之所以爲人歡迎，風行全球的，正以其人與人爭的社會背景，有以使然。不過，如火加薪，使勢益烈。

生命的發展是互助與鬥爭的統一，這是事實，也是理論。當達爾文學說只被人強調其競爭的一面，人類愈加愚蠢的實行了大屠殺，而自以爲聰明。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正當人類瘋狂的自殺，同時也有人特別研究生命發展的互助一方面。關於互助的研究，要以俄人克魯泡特金

（P. Kropostin）尤爲著名。克氏爲一動物學家，研究結果，認爲「互助在進化中乃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元素」。他針對着競爭，而名其書爲互助論。互助論一書，自動物的互助說到人類的互助。人類的互助，從野蠻互助，半開化的互助，和中古都市的互助，直到近代的互助，敍述詳明，以解世惑。克氏曾親見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人類自相慘殺的悲劇，痛惜着人類濫用達爾文學說的術語，作爲多行不義的遁詞，而力倡互助的利益。他在互助論的序言上說：

「此番大戰開始，幾使全歐皆捲入於一個極可怖的戰爭之漩渦中。在那些受有德人蹂躪的比法二國地方，非戰鬥員皆妄遭屠殺，人民的糧食，亦被刼一空，而無以生活，其情形之慘酷，實以前之所未有，而那些想要原恕此等暴行的人，乃拿「生存競爭」來作辯護。

× × × × ×

「雖然動物間互相扶助，互相維護之重要，……則尚未被他們所承認。蓋他們尚不知道，人們因爲如是，斯有種種進步的社會制度之發生。」（克氏著互助論周佛海譯）

眞的，互助之於進步的重要，尚未爲現代思想家所洞悉，統治者所承認。第一次大戰之後，人類自相殘殺之禍，并未終止，不出三十年，旋即演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大戰的慘酷，尤甚於前，據可統計的死傷數字，已超過前次二百萬人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南京十五萬市民的被屠殺，德俄斯太林城爭奪戰的悲慘，皆已成了不能洗刷的人類汚點。這二次大戰的

種子，早卽任一次大戰結束之時，便已播散了。現今第二次大戰雖已結束，可是各國有知識的領袖，和有權威的統治者，固已以言詞高倡世界和平，而刻露着互助的重要，但他們的行動却依舊的重於競爭。噫念前途，人類的光明畢竟少於黑暗。德哲尼采曾說：

一你們將以愛和平爲新的戰爭的方法，

但是短期的和平多於長期的和平。」（戰爭與戰士）

難道人類眞是這樣無知的愚不安愚，永遠的自作小聰明，來欺騙自己嗎？對於互助與競爭的生活，眞是不知取舍嗎？我們要知道競爭與互助的行動雖殊，而其爲適應環境，維持生存的功用則一。何況達爾文所謂生存競爭，非非生物進化的眞正原因，只是生物求生的一種方式。馬克斯所謂階級鬥爭，亦非人類社會進化的眞正動力，只是社會病態的一種結果。生物的生命發展，不論個體的抑羣體的，要皆是互助與鬥爭，同時非用，一體兩面。根據生物的進化自然法則，對內部，對自己，對同類，總是以互助爲主。因爲互助才能得到生存的和諧，而表現生的現象，所以競爭是補。生存競爭有兩個不同的狀態，一是物種反抗不利的自然環境，或和其相競的物種，這謂爲對外作戰，二是物種內部相爭，以求生存，這謂爲對內作戰。對外作戰時，合羣性的自衞表現，最爲有力，換言之，卽是以互助方式爲生存奮鬥的主導力量。這也就

是生物求生存的方式，對同類是絕對的互助，相對的鬥爭，依據近年來生物研究的結果，尤是這樣。英國生物學者 J.S.赫胥黎根據 A.Huxley 的意見，認爲將來人類的進步，依靠內部種種合作的增進，直到克服其內部特種的競爭。(J. S. Huxley: 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 1939) 由此可見，鬥爭與互助是人類求生存進步的兩種主要方式，而互助對於進步，較諸鬥爭，更爲重要。

中山先生既以人類求生存爲社會進步和歷史進化的重心，那他對於人類求生存方式的互助與鬥爭，自有其綜合的看法，和其主導作用的說明。在本書第一法則裏，我們已經引據過他對於人類由物種進化而來的意見。至於動物與人類生存進化的原則，其根本的差別，就是動物界以鬥爭爲主，人類則以互助爲主。所謂「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可見 中山先生認爲互助是人類求生存的主導方式。而其至今尚存有競爭的方式，則在以人類的獸性，未曾全行化除，所以他雖以互助爲主，但不否認人類現在還處於自相鬥爭的階段，且認爲鬥爭是人類社會病態的表現。

「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祇見得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

所以馬克斯祇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民生主義第一講）

階級鬥爭既是發生於人類社會的病症，當這病症沒有消除，使得人類不能求生的時候，那鬥爭還是須要的。所以他又說：

「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以用馬克斯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民生主義第二講）

這就是：

「外國因爲大資本是歸私人所有，便受資本的害，大多數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發生階級戰爭來解除這種痛苦。」（民生主義第二講）

關於社會分配不均的痛苦，如果不能以互助的和平方法去解除，那祇有以鬥爭的方法去消滅。

「現在歐美的工商業進步到很快，資本發達到極高，資本家專制到了極點，一般人民都不能忍耐，社會黨想爲人民解除這種專制的痛苦，去解決社會問題，無論是採用和平的辦法，或者是激烈的辦法，都被資本家反對。……不過主張和平辦法的人，受了資本家很多反對，種種的刺激，以爲用和平手段來改良社會，於人類極有利益，於資本家毫無損害，尚且不能實行，便有許多人漸漸變更素來的主張，去贊成激烈的辦法，也一定要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民生主義第二講）

當以階級鬥爭的結果，一旦可以使得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能夠生活，那便達到互助的局勢。英美各國的情形，大抵皆是這樣。

「譬如英國，從前革命，殺了皇帝，不到十年，再復辟起來。但是英國的貴族，知機善變，知道民權的力量太大，不能反抗，那些皇室貴族，便不和民權去反抗，要和他去調和。講到民權的起源，本來是發生於英國的，英國自復辟之後，推翻了民權，便成貴族執政，只有貴族可以理國事，別界人都不能講話。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後，在貴族之外，才准許通平民有選舉權。到了歐戰以後，才給女子也有選舉權。更是濫用退讓手段，順應民權的潮流。……准愛爾蘭獨立。……像對付埃及，也是退讓。……至於……容納工黨，組織內閣，工人執政，便更足以證明英國貴族的退讓，民權進步。……英國貴族知道世界民權的大勢，能夠順應潮流，不逆反潮流，所以他們的政體，至今還可以維持，國家的現狀，還是沒有大危險。」（民權主義第四講）

英國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發祥地，也是工業革命的祖國。他經過數百年階級鬥爭的閱歷，才體驗到妥協和退讓是大家共存的必備條件，換言之，就是瞭解了互助的秘訣。是以對內政和屬地皆以這一總訣來維持大英帝國的生存和發展。在內政方面：從近而言，自一六四九年查理斯第一（Charles I）被殺，至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之後，便由鬥爭轉入妥協一途，從此即有鬥爭，亦即以和平的方法求互助的實現。至於屬地方面：自

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以後，對於殖民地政策的推行，已具戒心，不專以武力壓迫爲主。當一八三七年平服了下坎拿大的叛亂，政府即派自由份子杜漢爵士（Lord Durham）前往調查事變眞象，研討結果，深責官吏施政不良。於一八三九年，呈送報告書，建議設自治省以求長治久安，並主張凡英國殖民地，能以自主者概許自治，成立政府，其總督與首相各對其國會負責。政府採納此項意見，而爲其殖民地政策的一大轉變。一八四〇年坎拿大在英皇之下，組織聯邦政府。於是紐芬蘭，澳洲，紐西蘭，和南非聯邦，均先後獲得自治領的地位。此外其他屬地，亦藉此多少獲得一些自治的權利。英國人懂得了互助，利用了妥協，所以階級戰爭的結果，成了階級妥協的局勢。他雖是工業革命的祖國，工黨幾度得勢，但並沒有發生無產階級的專政革命。他雖是殖民地最多的國家，但並沒有瓦解的現象，而有更加凝結的趨勢。即以現在澳大利亞勞工黨外交政策的轉變而言，勞工黨平素因爲反對不列顛帝國主義，而主張孤立主義。但經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侵略的威脅，已採取與聯合王國從事很密切的合作了。澳洲政府已經領悟到必須得着不列顛聯合王國的支持，他們對於世界問題的意見，才能爲人重視。一九四四年其總理寇丁曾明白表示過：「澳洲祇有作爲不列顛聯合王國之一必要部份，才最能在一個世界機構中表示其自己的意見。」這不啻說明了澳洲和紐西蘭，坎伯剌協定，對於大英帝國祇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所以現在的大英帝國正是象徵着互助是人類生存發展的主導方式和主要因素。英國是有皇帝的民主國，英皇也象徵了人類妥協的利益。在二十世紀上葉，兩次世界大

戰之中，英國全體人民一致努力對外，戰勝敵人，而其混合內閣，尤足作爲徵幟。英國如是，再看美國。美國是現代第一等富強國家，國內的工業極度發達，國家的政治操縱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或共和黨之手，但無產階級革命的勢力，並不雄厚。這就在於美國已以社會改良的方法，調協階級的關係了。至其對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政策，也是比較開明，如許非律賓的獨立，和援助民族自決的運動。這些妥協的方法冲淡了鬥爭的濃情密意。此外，如德國在俾士麥時代，就實行了社會改良政策。所以德國雖是歐洲社會黨發達最早的地方，直到而今，無產階級的專政革命也沒有力量。歐美各國近年來對於促進自己的社會進化所用的方法，是互助多於鬥爭了。

「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作四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從今以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進步的。……至於這種社會進化，是由於甚麼原因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民生主義第一講）

爲什麼人類的生存競爭也可以得到妥協的地步呢？這是因爲人類對於生存的態度，原即不一。人類對於生存的環境，最普通的有兩種：一是順應的，二是適應的。前者是消極的，後者是積極的。所以一則近於妥協，一則近於革命。但就一般人而言，是習以爲常的苟且偷生，只要他的生命不被人壓迫到不能喘氣，不被人剝削到不能生存，那還是可以容忍的，過着順應的

生活。因爲生活的改善，是要有理想的目的，而且有時須經過痛苦的。所以人類進化，大都是由於有理想的人不顧苟且偷生，出而領導革命，或者從事改良。試看美國黑奴解放約經過，就是這樣的。

（一）美國注重人類平等的憲法，既然成功了以後，還要黑人來做奴隸，所以美國主張平等自由的學者，見到那種事實，和立國的精神大相矛盾，便反對一個平等自由的共和國家裏頭，現有許多人類來做奴隸。……當時全美之中，北方各省沒有畜奴的，便主張放奴。南方各省所畜的黑奴是很多的，……南方各省反對放奴。……所以放黑奴的風潮……構成美國的有北戰爭。……美國的南北戰爭，爲黑奴爭平等，不是黑人自己懂得要爭。因爲他們做奴隸的時候太久，沒有飯給他們吃，有衣給他們穿，有屋給他們住，他們便很心滿意足。……南方各省因爲打敗了仗，……自此之後，便不理黑奴，從解放之日起，便不給飯與黑奴吃，不給衣與黑奴穿，不給屋與黑奴住。……一時青黃不接，黑奴覺得失了泰山之靠，便感非常的痛苦，因此就怨恨放黑奴的各省分，尤其恨北方那位主張放黑奴的大總統。（民權主義第三講）

中山先生到於人類求生存的方式，認爲以互助爲主導，這不但是由於西洋史實的體會，和根據生物學的研究，而且是受着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我國人與人爭的事實，當春秋戰國時代，表現得最爲激烈。戰爭的形態就是兵與兵的決鬥。決鬥的結果，只是暴露了人類的悲慘，

秩序的混亂。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這樣，只是使得人人不能安生。戰爭原是求生的一種方法，但這種方法並不足以安生，反而適足以害生，所以那時反戰的思想普遍的流行着。諸子百家無不以唾棄戰爭爲主旨。道家的「佳兵不祥」，墨家的「非攻兼愛」，即儒家的愼戰義戰的態度，也認爲「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而主張「善戰者服上刑」。進且指示天下統一，始能安定，然須「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就是專以研究戰爭的兵家孫子，也主張「攻心爲上」。我們古時的兵法，就是研究戰略戰術的，所以自此之後，我國用兵者都以不攻而勝爲上策，殺人流血雖勝，亦爲下策。這點淮南子兵略訓闡發得很透闢。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

這就說明了用兵的目的在求生存的安全和發展，所以不論戰略戰術，皆以不害人爲要。兵略訓分爲三策以言之：

「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陋，……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未至兵交接，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

用兵已不主張決勝於疆場之上，這就因爲兵的鬥爭，在除暴安良，爲求生存和諧發展。「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用兵有術，而義爲本」。當戰國時代，各國間的爭執，都以折衝於樽俎之間爲尚，和爲貴成了反戰的標語。這一思想歷漢唐而益甚，文化流播，中國人幾以當兵爲恥。此種社會意識，而今尚有，然已爲中國人求生存的一大弱點，兵之不可廢，是有其價值的。關於兵的存在，其價值以求生爲要，呂氏春秋蕩兵篇亦有此意。

「有以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訓活人，得惡藥則殺人。」

又說：「攻伐不可取」，如果是攻伐之兵，就有武德，那也是醜行凶德。所以在論威篇則謂「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這在中國思想上最不容的，這在中國人內心裏最不滿意的，因爲中國人已深深的覺悟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和平道理。由於見到和平的優點，所以認爲「萬物竝育而不相害」，從而推論到人與人是互助的，人與人的關係是以界限來規範其互助的行爲，是卽所謂人類社會須以禮節之。禮就是人與人交接的分寸，彼此均能遵守着這個界限，這點分寸，那社會的相助自然可以美滿的表現出來。所以「禮之用，和爲貴。」但是爲求互助，爲求和平，也都不可失去禮的規範，因爲一失却彼此的分寸和界限，那便不是眞的互助，眞的和平，反祇成了片面的優越，沒有達到和諧的境界，所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因爲要以禮來達到人類眞的和諧境界，

而表現着互助的光輝，必須彼此以誠來做到相對的統一，完成生的局勢。讓較諸容忍不同，容忍是權勢的屈服，讓是情理的諒解。中國人今天不去發揮傳統的讓的態度，反有要求學習西洋容忍的文化，眞是數典忘祖了。人與人的交接，如果不能以禮節之，以讓諒解，而發生了鬥爭，這鬥爭也是義戰。這種主和而義戰的思想熏染了中國人心，幾有二千多年，以此與「強權即公理」的西洋文明相較，在鬥爭方面，我們深愧力之不如，然在互助方面，反覺文化多了。

中山先生益爲發揚光大，他對於人生奮鬥的方式，當以倡導互助求和平爲急務，至對鬥爭亦不輕忽。且每主戰爭，則爲義舉。關於戰爭的軍事學，他雖無專書，然其軍事思想流散於其演講詞中，頗多爲中國兵學的傳統精神。尤以軍人精神教育一講，更爲重要。軍人便須軍人有革命精神。軍人有了革命精神，便成了革命軍。革命軍的責任是打破人類的不平等，去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和世界。革命軍的精神，在發揮智仁勇的價值。本諸智，而後能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本諸仁，而後能救世，救人，救國。本諸勇，而後能有技能，辦生死。由於軍人既具有主義的精神訓練，及其目的之瞭解，故其立志，決心從事革命，其生命的代價，不成功即成仁。所以這種革命軍的用兵，基本精神就是求生存的義戰。不過，這種義戰之兵，如果能夠不用，他也是主張不用的。所以他又說：「主義勝過武力」。以主義去攻人心，做到攻心爲上。本此原則，他對於中國的統一，也是這樣的。有時主張「統一中國

非出兵北伐不爲功」，但倘能不以武力得到統一，那也主張以和平的方法達到目的。至於對外國的態度，也是以互助的觀點來指示中國的前途。中國的前途在於工業化，而工業化的實現必須與工業國家合作，然後才能做到。

「夫今日立國於世界之上，猶乎人處於社會之中，相資爲用，互助以成者也。……夫以中國之地位，中國之富源，處今日之時會，倘吾國人民能舉國一致，歡迎外資，歡迎人才，以發展我之生產事業，……若國人能曉然於互助之利，交換之益，用人所長，補我所短，則數年之間，即可將中國之實業造成如美國今日矣。中國實業之發達，固不僅中國一國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也。」（知難行易七章）

然則外國如日本者，必欲不予我以工業化的經營，則亦必以鬥爭的方式，出而拒絕之，排斥之。中山先生雖指示了我國工業化的發展，最大捷徑，不在競爭，而在互助。然苟遇阻礙，仍須加以奮鬥。這一遺教，在其彌留之際，尚以「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噓聲，吹醒國人。和平即對國內團結一致而互助的方法，奮鬥即對國外競爭的方法，這也就啓示了中國人，中國的生存是對內互助與對外競爭的同時並舉，而後才能得救。這是動物求生存的必然方式，也是人類現代求生存的方式。總之，中山先生以爲人類在現階段，尚不能免除鬥爭的方式以求生存，當非鬥爭不可的時候，他還是認爲要鬥爭的。因爲在這人性與獸性過渡時期、互助尚未發生絕對的主導作用，自然還須要相對的鬥爭。但因爲人類自社會生活發達以後，求生的活動，

凡如衣食住行的緊要，漸以分工來滿足，分工愈細，也就是合作的互助愈大，而社會則愈益進化。人類因分工而緊要互助，這自工業革命以後，改造了新工具，愈益顯其必須了。當十八世紀亞丹斯密原富一書，首即論分工之效，其時祇言小規模的分工，而有利於工作效率的增進。時至今日，不僅大規模的製造廠已見分工之利，且因生產方法日趨國際化須互助，方能收分工之利。這一事實，已漸為人共知。不獨現代人類生存的活動，因分工必須互助合作，以便社會進化，即自古以來，人類社會，不可偏廢，中西賢哲都有說明。古代希臘柏拉圖和亞利斯多德均以社會國家之所以存在，即以機成的互助團體。亞利斯多德曾說：「夫人類最初之結合，其起原必由於滿足自己生活上的必需供給，那就必須變與這分工合作的社會，而後才能生存。所以他又說：「人類之為政治動物，亦本乎自然。」政治就是社會組織發展的一種形態。政治組織的最高形態是國家，因此他說：「國也者，即分工合作的意思，頗與我國孟子的見解相同。為社會必須分工合作的。茲將其全文引出，以明其真義。

有莘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布以為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許行以爲賢君不耕而食，則是剝削人民，雖賢不賢，他應當自耕而食。換言之，許行認爲人人滿足其一己生活上的需要，皆應自給自足，方是對的。但這是違反社會進化的分工合作之發展，且爲不可能的。孟子即根據這點反駁，以對話式的討論，批判其錯誤。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

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認爲「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那末，君是負政治的責任，治理衆人的事，當然也不能「耕且爲」了，不過，治人事的君，後來變成專爲剝削人了，只是食於人，而不爲人治事。但孟子的邏輯，只是分工合作。「勞心和勞力的人，彼此是要負責盡職，除民害，增民利，專心致志的治理人事。試看他所舉的例證，就是這樣的。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試問，舜益和禹，當忙於驅除禽獸，修治水利，從何有暇得以自耕而食呢？他們這樣的勤勞，爲民治理安生的大事，既已無暇自耕，難道可以不食，而亦不能食於人嗎？其次，他又就教民農耕，和傳播文化的人們來說，也是不能自耕而食，而須食於人的。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

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不但從事實際工作，如后稷和契者，無暇自耕而食，須食於人；即「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的堯舜，也不必自耕而自食。因爲：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

以天下爲己憂者是大人，大人之事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是小人，小人之事是只見私利，不顧公利的。於此足以證明儒家之所謂君子小人或大人小人的意義，是有以品格高低和責任大小的分別。大人即指爲羣衆之事負責者，小人即指爲一己之事負責者，換言之，大人一詞的眞義，是指負大責任的人而說，小人是指負小責任的人而說。即與中山先生分別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意見相似。不過，因爲這些大人們，後來漸失德修，名不稱位，都成了一些不肖之徒，只是食於人，而不去勞心治理衆人之事，引天下爲己憂了。甚而去剝削人民，壓迫人民，因此，遂乃爲人咀咒是剝削者壓迫者，而要去推翻他們，廢免他們。殊不知這祇是社會組織的病態，一旦社會組織轉入正常，這些大人們還是不可缺少的。他們還是須要食於人，穿於人，衣於人，和住於人的，因爲這是人類分工合作進化的必然結果，任何人沒有力量可以去反抗，不論他是怎樣的憑着自己卓越天才去設想，去虛擬。這種社會進化的潮流，其力量的偉大，自蘇聯十月革命之後，益證其不可反抗

了。蘇聯革命以後，政治組織依然的須要這些大人們來治理衆人之事，而食於人。不但從事政治工作的人，須食於人；即從事文化工作和自由職業者如教師、律師、醫師、以及新聞記者和劇員，也都不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自築而居，和自車而行，皆須要別人供給他們這些生活的必需資料。托拉斯基不懂得這個道理，指責着他們，說是官僚政治。美國的商人也不懂得這個道理，便說他們是官僚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實，這是蘇聯轉入生理的社會，自然的組織。人類生存的活動愈複雜，社會愈進化，社會組織也愈分工。在分工的互助合作社會，只有每個人都是爲着社會的健全而努力，爲着各人的幸福而工作，那就無所謂什麼剝削者和壓迫者了。勞心與勞力的分工，只是合作的必然結果。由於社會組織的分工合作，必須人人各盡所能，各盡其性。

「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文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鑊，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各人性齊矣。」（淮南子齊俗訓）

中山先生體會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對於社會國家組織的政治理解，即未輕予苟同西洋淺見者流，而主張國家的消失與毀滅。這也就是他發明民權主義的背景。民權主義的基本理論根據，一是權能區分，二是革命民權，從而演成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和萬能政府。他這思想，與

歐洲十八世紀民主政治的思想不同，那時在使政府無能，要限制政府的職權，所以要將各權有牽制。現代的民權思想，在使政府有能爲人民服務，所以要權能制衡。萬能政府的官吏本諸服務道德，各盡所能，爲衆人謀幸福。所以他說：

「人類的思想，可說一種是利己的，一種是利人的。重於利己的人，每每出於害人，也有所不惜。由於這種思想發達，於是有聰明才力的人，就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漸積成專制的階級，生出政治上的不平等了，這是民權革命以前的世界。重於利人的人，只要是於人家有益的事，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亦樂而爲之，這種思想發達，於是有聰明才力的人，就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漸漸積成博愛的宗教和諸慈善事業。不過宗教之力，有時而窮，慈善之事，有時不濟，就不得不爲根本上的解決，來實行革命，推翻專制，主張民權，以平人事之不平了。」

從實行民權革命以後，剝削者和壓迫者的自利之徒，固然可以打倒，但各人個性不同，還是不能人人相同，所以平等的精義，在分工合作的社會組織裏，是各盡其天賦的才能，而求人類的共同幸福。因此，他認爲先知先覺的發明家，後知後覺的宣傳家，和不知不覺的實行家，這三種人互相爲用，協力進行，然後人類文明，才能眞的進步，社會才能眞的進化，歷史發展才有眞的前途。是以他接着又說：

「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的人，使之平等，則人人應該以服務爲目的，不當以奪取爲目

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的人，也應該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民權主義第三講）

據此可見，「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的大人們，且是人類文明進化不可缺少的。我們總能去推翻他們呢？惟自人類社會當進化之際，發生了病症，這般爲衆人治理安生之事的大人，乘組織複雜而嚴密之後，知其不可缺，遂逐漸演成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壓迫階級，於是他們專以食於人爲能事了。由是造成人與人的不平，加強了人與人的鬥爭，暴露了人類的醜陋。所以亞利斯多德說：「蓋自古迄今之革命大變，財產問題，實爲其樞機故也。」財產問題爲什麼能成爲革命大變的樞機呢？這就由於財產造成了不平等的現象。因此他又說：「革命是由於不平」。人類社會不平等的事實，最主要的就是由於私有財產權的發生，而造成了貧富不均的階級差別。因爲貧富的差別，是富者剝削貧者之所致，甚而貧者的生存都被剝削得不能維持。這樣，就造成了鬥爭和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不平。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於不平的事實，也是特別的注意，而求改善的。孔子所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就表示了求平的重要性。因爲人類生存的發展，須要求得和諧的滿足。得到和諧的條件，就是自由與平等，而平等又是自由的先決條件，兩者相較，平等最爲重要。　中山先生亦即本此而說明了西洋近代歷史的進化，西洋各國近代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大革命，「如果要考究他們

發生的原因，這三項東西，都是從不平等裏頭反動出來的。」他對此曾有簡要的說明。

「就民族的情形來說，有甚麼不平等呢？簡單的說，就是政治上的不平等，這一國壓制那一國，這種民族壓制那種民族，壓制愈厲害，反動也愈厲害。

「民族主義在人類思想上，本來發達最早。到了後來，覺得自己民族，雖然不受他種民族的壓制，但是在本國之內，還要受到特別階級的壓制，像皇帝和貴族高高在上，人民處在他們壓力之下，動也動不得，因爲受壓力的痛苦，便生出反動，便提倡民權來反對君權。

「歐美各國近二百年以來，祇曉得解決民族，民權兩件事，却忘記了最要緊的民生問題。……所以現在才有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的事情，時常發生。」（三民主義爲迎成新世界之工具）

西洋各國由民族主義進到民權革命，再由民權革命進到社會革命，就時代說是有先後的，但其發展的動因，都是在於不平等。可是，當前中國人的生存遭遇，幾如民族，政治，和經濟，莫不處在不平等的狀態之中，所以他爲中國人生存的發展，達到和諧的滿足之境界，便發明了三民主義來解決我們生存的問題，以求自由平等的獲得。因此他說，「三民主義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義。」三民主義的一貫精神，既是求自由和平等，這不但可以救中國，而且可以救世界。

因爲現在中國所處的地位，是工業落後的弱小民族，凡可以解決中國一切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基本原則，都可用之於世界上的弱小民族。所以三民主義的國際性是很重要的。何況現在世界

上一切鬥爭的基本原因，就在於有了民族的不平，民權的不平，和民生的不平等，所以有不平，所以有弱小民族的復興運動。因爲民權有了不平等，所以有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以民權的平等爲經濟有了不平等，所以有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因爲有了這種種的不平等，才能去實現世界上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世界。中國自己眞正的解放之後，才能去做到「濟弱扶傾」的工夫。我們既知道三民主義既可以救中國，又可以救世界，那便須洞悉三民主義的重心，在於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一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上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能夠解決，人類才可以很大的幸福。」是即因民生主義是促進經濟地位的平等，人類才有了眞實性，也才有了堅固不移的基礎。實實在在的抗戰，最後得着勝利，但是沒有澈底完成民族主義的革命。所以我們對於世界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還是沒有力量去援助，去做到「濟弱扶傾」的工夫。我們既知道三民主義既可以救中國，又可以救世界，那便須洞悉三民主義的重心，在於民生主義。

新的共產時代。

一到了共產時代，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吃，便不至於爭，便可以免去人與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民生主義第二講）

現代社會組織的原則，建立在不平等不自由的上面，以致大多數人不能求得生活和諧的滿足，因而社會文化墮落，道德退步，於是莫不以鬥爭爲自己生存的急務。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個人的經濟貧窮，大家都爲爭生理之所迫，也無法追問自己的生活不能滿足，到這種境界，也無法遵守秩序，節持分寸了。這樣，於是鬥爭的激烈，凡如侵凌、欺詐、暴虐、陰謀、險巇、狡騙、以及利誘和威脅，一切醜行罪言，皆爲人生必備的技術，甚而至於戰爭，也視爲人類應有的行爲，而加以獎勵和提倡。而且這些行爲之所以被人視爲有道德的價值，則在以自己生存，不容別人生存爲目的。其哲學的基礎，是片面的和絕對的獨斷。其政治的運用，是陰謀和暴力。因此，凡由於以相對的平等的哲學觀點所構成的行爲道德，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都被人輕視，予以冷嘲熱罵的譏刺，而不能存在，更不必去遵行。凡政治的基礎建築在道義和道德，又是將來新共產社會不可缺的精神基礎和組織原則。倘若這些道德行爲的

德不能發生實踐的效力，這些組織原則不能變成制度的根據，那末，人類的前途還是黑暗多於光明，進步少於退化。根本說來，人民生活依然不能徹底解決，試問人類墮落到雖善不善的境地，那還有什麼文明可以追求呢？

「……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的組織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甚麼爲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爲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爲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的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苦，那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民生主義第二講）

依此，我們更可以瞭解私有財產制度，是由於人口與生存需要的物資不能平衡，而致民生不遂所發生的。自私有財產制確立而深化以後，那就是人與人類的開始，直到而今，愈演愈烈，如果眞要使得人類生存的奮鬥，回復到對自然去鬥爭，而對於自己同類以互助爲主導的方式，就須消滅私有財產制，實行共產制。因爲共產制度是生產與分配都屬社會化的，且是人人相對而平等的享受，這樣，才能使得大多數人的經濟相調和。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能夠調和，社會才能進化，歷史也才能進化。這也就是民生主義的理論基礎。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

益，社會才有進化。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民生主義第一講）

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能夠調和，這就是互助的結果，不是鬥爭的結果。鬥爭的結果祇是造成人與人的經濟利益有衝突。從而可知人類生存要進化的重要因素，是互助，而非鬥爭。因爲生存的奮鬥，須要分工合作，然後才有社會的組織和其進化。分工合作就是互助的形式呀！所以中山先生說：「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今後如果廢除了私有財產制度，達到新共產社會的境界，那人與人的互助光芒又要四射，而鬥爭的勢燄便將息滅了。

因爲：

「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而最後之十年，又勝於已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乃至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而學者多以爲仁義道德皆屬虛擬，而競爭生存，乃爲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爲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以上矣。」（第四章）

人類對於同類既知誤解以鬥爭爲求生存的主導方式，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呼籲着和平，以求平等的實現。但這必須以仁義道德爲社會組織的原則，人與人的行爲標準才可。因爲「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社會的組織原則，人類行爲的準繩，如果不建立在仁義的道德之上，那

人與人還是不能以互助爲求生存奮鬥的主導方式。因爲仁義的道德哲學，是由於相對的平等的原理而構成其理論的基礎。任何社會的生存奮鬥，必須如此，才能發生互助的力量。就是以爭奪爲主的盜者社會，亦須這樣的。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托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淮南子道應訓）

所謂「聖人之道」，即是仁義。仁義的道德是任何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因爲任何社會必須互助，才能奮鬥，而仁義的作用，就在免去社會內部的鬥爭，愈益發揮其互助的功能。

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謂，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知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淮南子本經訓）

仁是救爭，義是救失，所以要人得到生存發展的滿足，社會國家能以不發生爭鬥，那末，仁義的組織原則，就是必要的了。現在一些帝國主義者雖專以欺詐人類爲能事，但當其與人戰鬥時，對其自己的社會，則仍以仁義的原則求組織健全，各得其平，而增加戰鬥力。

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淮南子主術訓）

智仁義的功用之所以能夠維持人類互助生存的，就在「偏知萬物而不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主術訓）而「義者宜也」，換言之，仁義就是人類應當相愛，同類相助，這也是動物的天性，自然的行爲。不過，祇以人類文化發展的錯誤，以致喪失了天性，反違背了自然的行爲，而相互鬥爭，卒而認爲主張仁義者是迂闊之徒，誠有人不如獸之譏，不禁感慨係之。就是而今一般借言社會革命和改良人類文明者，亦祇着眼於典章制度的興廢，殊不知這些都是舍本逐末，源根本原則，苟失這種精神，法律雖殷，法治雖良，法治精神雖然優良，但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變更者也。（淮南子氾論訓）

法律制度的更動，祇是表面的應變，而社會基於仁義的組織原則，個人基於仁義的行爲道德，那才是人類互助的根源。這個道理，淮南子泰族訓上說得很透闢。

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其

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這就說明了仁義與法度的因果關係，不可倒置，法度是維持社會存在的形式，仁義才是內容。一旦因果倒置，這個社會是不能發展的，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為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日本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現代祇務縱橫捭闔者，皆一時的權術，無補益於世界和平的奠立基礎。何況他們正是「多行不義必自斃」，而不自知呢？惟 中山先生對於人類生活今後改造的方法，獨以恢復我國傳統的王道精神，以救西方霸道的流弊，可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了。王道是由仁義而以互助為生存奮鬥的主導方式，霸道是由侵略而以戰爭為生存奮鬥的主導方式。今日正是西方霸道文化，貽禍於人類，威脅看全人類生存的前途，然這正是西方文化的沒落，人類前途的悲哀。所以他將我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傳統道德，闡揚為全人類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用之於個人與個人間，而成社會道德；用之於個人與國家間，國家與國家間，而成政治原理。從此演出法律制度，卒以造成世界大同。因為這些道德，亦即社會組織的原則，是由於相對的與平等的哲學理論建立的，本此道德，推用至極，而為政治原理，以組織人類社會。其結果不是人與人爭的世界。不是因個人與個人的利害有衝突，從而演成個人與社會的矛盾，轉成階級與階級戰，國與國爭，民族與民族戰的局勢；而是個人與個人的利害相調和，從而演成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不致演變為階級的，民族的，和國家的戰爭，而造成人類互助的基礎。這樣，人類是向着和平的前途邁進。當前人類正又恐懼着戰

神的再臨，追求和平的世界。但和平的實現，則必須根據這種社會組織的原則，政治制度的原理。

一、我們固有的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了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至於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公理的主義，英國話所說的武力就是公理，這就是以打得爲然，以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眞精神。（民族主義第四講）

中西文化的發展，如就人類求生存的方式而論，我國文明尤多。不以一打得爲然，才能得到和平的實現，但這是以互助爲主；不是以鬥爭爲主的。西洋文明尚未到此境界；不論他們提倡的任何樣的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其實，一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

中山先生這一寶貴而正確的遺教，經當前世界大事的教訓，中國人更容易而應當明白了。所以今後世界和平的前途，還須以中國的火炬來照耀着全世界的人向前走去。因此，我們中國人首先要發揚固有的仁義道德，來恢復自己的民族地位，民族地位恢復起來之後，那全人類才能達到世界大同的境界，亦即才能實現眞正的世界主義。

一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須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線是加人國家的，……

所以我們要決定一個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民族主義第六講）

我們決定的「濟弱扶傾」政策，就是本於互助的精神，來盡人類的天職。可是做到濟弱扶傾，也祇有以互助爲人類生存奮鬥的主導方式才可。中華民族既以互助推動社會進化，實現世界和平，這不就是歷史的進化嗎？所以今後人類歷史的前途，是向着分工合作的社會發展，這一進化不是鬥爭可以得來的。人類社會將來祇有相惠的互助，沒有剝削的鬥爭。所以　中山先生認爲知行是社會行動的合一，不能求之於一人之身的合一。

「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爲適當；然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爲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行者也。」（知難行易五章）

現代的社會，事實上就是知行的分工合作，這也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而轉爲社會進化的要素了。由於知行的社會分工，所以有勞心與勞力的不同，而此又是由於人類各自智力的差異，有以致之。

中山先生曾說過：人生三系，其一是先知先覺者，其二是後知後覺者，其三是不知不覺者。這三種人，彼此相需爲用，才能推動人類一切文明的進化，也就是一切的文明

進化皆成於這三系之人的互助合作。人類文明既由此三系之人，互相爲用，協力進行，然後才能發達，才能完成，那末，所有的文明成果，自亦應由這三系之人，均分共享。因爲這三系之人，如果一日失去合作，則人類文明必將因而停滯，不得發展。我們中國社會的落後，可以說就緣於沒有社會的知行分工，所以沒有社會的知行合作之成果。

「乃後世之人，誤於知之非艱之說，雖有先知先覺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則無由爲之倣效推行，且目之爲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者，此也。」（知難行而忽略之，不獨不爲之倣效推行，且目之爲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者，則無由爲之竭力樂成矣。所以秦漢以後之事功，無一能比於大禹之九河，與始皇之長城者，此也。」（知難行易五章）

什麼人是先知先覺者？爲什麼他祇宜於勞心呢？這可引淮南子泰族訓上一段的解說，作爲釋例。

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明知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

人類的英俊豪傑之才的差別，是由於智力的不同。中山先生對於人類三系的分別，也是本於各人的天賦才能。他曾進一步的詳細分析，共有八等，即聖、賢、才、智、平、庸、愚、劣。這八等人都應該使其適當的發展，由彼此的智力不同，各自去努力，這樣人與人的差異，才是眞平等。所以他說：

「說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眞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於原始社會的情況嗎？果眞這樣，「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不退化」。那人類祇能做到立足點的平等，這也才是人類的眞平等。依此可知，我們如果無理性而盲目的反對社會上勞心的領導者，不以分工去諒解他們之所以去食於人的原因，一定要推翻他們，反對他們，也要他們自己去自耕而食，那當不是人類要退化，那人類祇能做到立足點的平等，這也才是人類的眞平等。依此可知，我們如果無理性而盲目的反對社會上勞心的領導者，不以分工去諒解他們之所以去食於人的原因，一定要推翻他們，反對他們，也要他們自己去自耕而食，那當不是人類要退於原始社會的情況嗎？果眞這樣，「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不退化」。

個的結果，各人的成就，還應歸於社會的。

「發明鐵道者爲司的文生（Stephenson），發明機器者爲惟特（Watt），發明鐵道機器既爲二氏所發明，然所以能發明者，其智識豈盡出於天賦乎？以受社會種種之教養，始爲發明機械之機會。使司的文生惟特居於荒島僻地，其智慧將何自啓乎？即其天資極頂聰明，則耕而食，織而衣，以足供其一生之工作，尚何暇從事於機械之發明哉？由此可知，鐵道機械雖二氏發明，實二氏代社會發明也。社會之力發明機械，以社會之教養，原爲社會謀幸福之代價，二氏既藉社會之力，以其勞心勞力按社會經濟分配之原理，予以相當之報酬可矣。」（社會主義的分析）

中山先生雖承認各人的智力，有天賦的不同；但其才能造就的表現，却以爲由於社會環境的輔助。所以凡聰明才智的人，社會都應當使其發展，不論其發展的方向是政治的抑文化的，總之是勞心的。這樣，一則可以發揮智力，協助社會進化，二則可使野無抑鬱之徒，社會得以安寧。所以智力高的人儘可向勞心的工作去努力。相反的，智力低的人，「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那就儘可向勞力的工作去實行。因爲「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的，都在第三種人盡了實行的責任，使文明得以完成，所以他們自亦應當享受文明的成果。今後人類知識愈發達，社會愈進化，組織

的分工亦愈重要，那末，這更顯露了互助的重要。我們爲着這一極樂的生存奮鬥，不再演成自相殘殺的悲劇，那就須利用這互助的社會力量，將鬥爭轉用到對自然界去。換言之，就是從而結束了人與人爭的時代，轉回頭再積極的去同獸爭，去同天爭。人類利用着智慧，發揮已有的知識，一方改善組織，以使社會健全！一方創造新的工具，改良生產方法，增加生產力，擴大生產量，以滿足每個人的生活需要，而使之和諧的發展；同時，應用科學的技術，飼養家畜，改進農業，講求水利，開闢礦產，舉辦工業，以增加生活資料的來源，使人不虞匱乏。這樣，人人祇覺得辛勞的樂趣，沒有戰爭的苦楚。不過，人類現今實際的生活，雖還沒有到達這種境界，但彼此的求生方式，至少應當做到互助與鬥爭並重。待到互助克勝了內部的鬥爭，那時人類彼此相處就應當以互助爲絕對的主導方式，而對自然界則以鬥爭爲絕對的主導方式。亦即人類自身的關係，是絕對的互助，相對的鬥爭；而於自然界的關係則是絕對的鬥爭，相對的互助。

總而言之，人類爲着自己生命的發展，而使其新陳代謝的作用，繼續不斷的綿延。由於須要滿足這種代謝作用的消費，乃有社會的組織，以從事生產生活資料的活動。由於生產的結果，乃有分配的要求，由於要求分配以滿足其消費，乃有奮鬥的活動。奮鬥的方式，一方對內是互助，一方對外是競爭。當初人與獸和天爭，那時，人類自己的生存奮鬥，是以互助爲主導方式。自後由於彼此分配的不均，發生了人與人爭，於是競爭轉而對於同類也演成爲主導的方

戰，這便是由對外作戰了。人類對內作戰，自有史以來，便已存在。不過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因爲達爾文和馬克斯二人，加以理論的系統說明，愈益顯其重要了。畢竟，這是因果倒置，而違反自然的法則，所以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互助的理論即爲人注意，積極研究了。亦即有使對內作戰再變爲對外作戰的趨勢，以求人類的生存發展，更進於至善的境地。爲有使人類達到絕對的互助，所以中山先生一則創造社會價值論，再則提倡服務道德，以此超越人類的獸性，進化到人性，再進而到神性，以打開人類眞正歷史的一頁。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37253)

民生史觀一冊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范任宇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